

AMERICA AND THE WORLD

CONVERSATIONS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大博弈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 著



新华出版社

大博弈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这本书邀请读者参加一场对话。对话的主角是两位最具智慧的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2008年春天的许多个早晨和下午，他们坐在一起，探讨美国当前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一场心灵与智力的旅程，两位全国最好的向导，带你走入下一任美国总统将要面对的多重选择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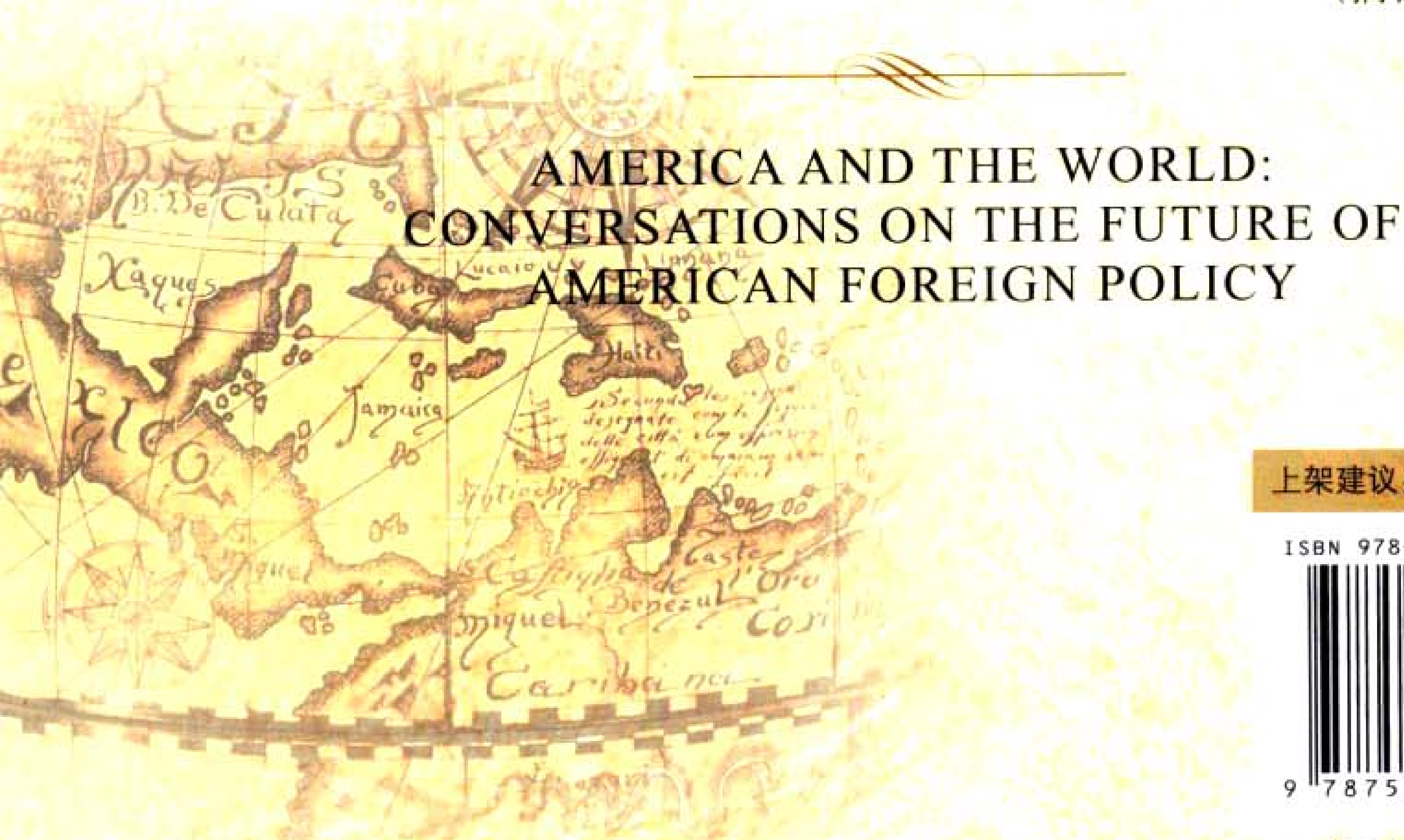
读者打开本书，可以想象自己坐在一张宽大的会议桌前，两位曾经在白宫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份纵横捭阖的人，正坐在桌边侃侃而谈。这张桌子所在的办公楼，能够俯瞰宾夕法尼亚大街，距离他们战斗过的白宫只有几个街区。每次对话，他们总是西装革履前来，好似赴白宫向总统汇报一般。每次对话之前，我们都会倒上一大杯咖啡，或者来点儿汽水，有时加上一小包家中带来的糕点糖，搅入咖啡或汽水之中。然后，我们打开录音机。

现在，我邀请你聆听美国两位最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实践家对于未来的思考。

对话主持人　戴维·伊格纳休斯

（摘自本书前言）

AMERICA AND THE WORLD:
CONVERSATIONS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上架建议：世界政治/美国

ISBN 978-7-5011-8995-3



定价：32.00元



AMERICA AND THE WORLD

CONVERSATIONS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大博弈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 著
姚芸竹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著；姚芸竹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011—8995—3
Ⅰ.大…　Ⅱ.①布…②斯…③姚…　Ⅲ.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Ⅳ.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285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5086

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作　　者：［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
译　　者：姚芸竹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编辑：张　敬　韩　刚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995—3
定　　价：32.00 元

前　言

这本书邀请读者参加一场对话。对话的主角是两位最具智慧的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2008年春天的许多个早晨和下午，他们坐在一起，探讨美国当前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一场心灵与智力的旅程，两位全国最好的向导，带你走入下一任总统将要面对的多重选择的世界。

读者打开本书，可以想象自己坐在一张宽大的会议桌前，两位曾经在白宫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份纵横捭阖的人，正坐在桌边侃侃而谈。这张桌子所在的办公楼，能够俯瞰宾夕法尼亚大街，距离他们战斗过的白宫只有几个街区。每次对话，他们总是西装革履前来，好似赴白宫向总统汇报一般。每次对话之前，我们都会倒上一大杯咖啡，或者来点儿汽水，有时加上一小包家中带来的糕点糖，搅入咖啡或汽水之中。然后，打开录音机。

现在，我邀请你聆听两位美国最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实践家对于未来的思考。

这些谈话从他们的信仰开始。他们深信，世界的基本面正在改变，可是，我们用以理解美国角色的传统模式有些失灵。他们都认为，美国在国际上遇到了困难，不能适应新的现实。他们都在质疑传统的智慧和固有的观念，试着去用全新的眼光打量世界。他们对美国的未来表示基本乐观，这一点你可以在书中看得出来，但是，乐观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必须能够应对当前的世界挑战，而不是生活在自我臆想的世界中。

本书是一次尝试。一位知名的民主党人和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一起摸索美国外交政策新起点的共同基础。这一次，他们只为自己说话，而不是为

两个对立的政党说话。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有这样的共同点，因为他们都极富预见性地最早表达过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早在其他大多数外交政策分析家之前，他们就已经洞察到了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之后面对的危险与困难，而且，当时他们就曾勇敢而决断地大声向公众说出过自己的看法。仅仅出于这个理由，我们也应当仔细聆听他们现在想要说的话。尽管他们在一些细节上有着分歧，特别是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上分歧犹甚，但我发现，在每一次谈话中，他们的思想实际上都在构筑共同的框架。

作为一名过去三十多年内一直撰写外交政策文章的记者，我非常乐意主持这些对话。我相信，他们寻找共同点的努力，会取得成功。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我尽量站在中间立场上写作。我认真倾听其他人说什么，只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启发他们，我试着提一些读者如果在场可能也会提出的问题。在这些对话中，我也努力做到不偏不倚。

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都是重量级的冷战斗士。在本书中，他们描述了一些导致柏林墙最终倒塌和苏联解体的秘密历史。但那个世界已经远离，在本书中，你不会找到对那个时代的庆幸、得意或缅怀。他们两人反倒担心，冷战思维在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中盘踞过久，使我们无法达成世界上新的力量平衡。书中的字里行间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改变。

每位读者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总结这些对话，下面是我作为主持人所发现的一些共同之处：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都从国家利益着手思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人都是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者。但他们相信，美国必须与一个变动中的世界接触，而不是与之为敌。他们的目标是使美国与这些变动力量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避而远之。他们一再强调，美国需要灵活开放，需要拥有主观上能与朋友和敌人坐下来谈判的意愿。

最主要的，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想要重建一个向前看的自信的美国。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在恐怖主义的时代变得太恐慌、太畏缩了，将自己禁锢在实体和思想的墙内。每次当他们必须要在保安面前签名才能获得安全通行证进入大楼时，他们都会对我们缩着脑袋的荒谬思维模式大笑不已。

他们所谓美国是21世纪超级大国的观念，绝非让美国向世界传教，而是

要让美国去接触世界，去聆听并与世界合作，只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他们描述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革命，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全球觉醒，而斯考克罗夫特称之为对尊严的渴求。他们想让美国跟上变化。

在美国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数十年间，两党分歧下的外交政策成为一项传统。20世纪的每一次重大外交决策，总是带点儿神秘色彩，总是伴随着政治角力。但是同时也有共同的战略对话的传统，这个进程将全国最优秀的头脑聚在一起，从他们那里挖掘出有关美国和世界的一些基本理念。

这个过程，将一位生于波兰擅长完美演说的哈佛天才教授，和一位同样具有天才头脑的来自犹他州擅长用简练语言表述复杂问题的空军将军，聚合到了一起。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曾在白宫岁月中，获得极大的成功；离职后，他们继续旅行和争论，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观察和思考。

2008年总统大选前夜，这本书将两人聚合到了一起，作一次广泛的讨论。也许，这类讨论能够激活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所代表的战略思维传统，并能鼓励两党就美国的问题以及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行持续的对话。

戴维·伊格纳休斯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戴维·伊格纳休斯：让我引用乔治·马歇尔将军的话“别和问题纠缠”来开始我们的对话。我一直认为，他的意思是要“理解问题”，先向你自己描述清楚，然后再去解决它。千万别跟问题本身纠缠。所以，让我用描述问题的方式，来向你们每个人提问。问题在于，新总统上任之际，美国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有哪些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是什么。兹比格，请告诉我你对今日世界面对的问题的看法，它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谈如何应对。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布什总统曾在国情咨文中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是本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震惊。我就对自己说：“是不是有点傲慢？”现在是21世纪初，有人却在向我们灌输什么是本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假设我们回到1908年，如果被问及如何定义20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那么在大多数人的答案里，会谈到右翼和左翼，谈到极权主义及类似的政权吗？或者回到1808年，如果被问及19世纪的挑战，会有多少人，在保守分子在维也纳会议取得胜利的前夜，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民族主义情绪将会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以及整个欧洲蔓延呢？

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我认为这包含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

第一，我称之为“全球政治觉醒”。第一次，全人类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

东。这并不是说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年来的统治权。第三，则是全球共同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请继续你的思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如何应对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

布热津斯基：如果我必须将其归结为一点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一点就是美国信心的沦丧。我一生中的主要时间，都生活在冷战的氛围中。这是一场巨大的全球斗争，但我们用自信来消耗它。可最近几年我却发现，美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文化，这种文化让我们故步自封。

当然，“9·11”事件引发了恐惧的弥漫。整个国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它，美国的自信开始摇晃。但是我认为，恐惧被人为宣传所放大，这一点让人十分难过，因为这样于事无补。如果整个国家被恐惧所驱使，美国将不可能合理地应对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变化。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如何评价我们这些问题的本质？我们的哪些反应能力遭到了破坏？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兹比格基本一致。但让我先从历史背景谈起。我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的断层。

冷战将密集的注意力强制转移到某个单一问题上来。它将我们动员起来。它动员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反对某个单独的集团。它影响了我们的思维过程，影响了我们的机制，也影响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想，比起冷战时代，没有哪个时代更能让我们如此集中精力。

突然之间，只是一眨眼的历史瞬间，世界走到了尽头，被一个没有冷战般实体威胁的世界所代替。冷战之中，如果我们犯了一丁点儿错误，都可能会炸毁整个星球，突然之间，这种威胁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大堆

棘手的问题。我们没法只通过一只望远镜去盯着莫斯科，我们现在站在望远镜的另一端，面对成千上万的小麻烦。然而，我们处理小麻烦的机制与思维过程，却只适用于应付莫斯科。

伊格纳休斯：你当年在白宫，当全球都在害怕核毁灭时，是怎样的状态？你们二位，都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坐在那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在坏消息袭来、全球危在旦夕之时，你们身处其位，有什么感想？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总有一种想法挥之不去。如果任何一方犯下严重的错误，那对全人类来说就可能是灾难。我们是不是每分每秒都在这样想呢？倒也不是。但总会想到这些，还有会不停地想，苏联人到底想要什么，他们的能力边缘在哪里，比如很担心，他们的技术发展，是否能够瞬间摧毁我们，是否能将核对峙状态变成核不对称状态？

对我而言，这些想法超乎一切。我们看待冲突，无论是朝鲜、越南，还是其他的小麻烦，我们都会想"怎么才能既证明苏联人背后有一手，又别去傻乎乎地冒险把自己搞得没有退路"。

伊格纳休斯：听起来，好像有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任何小小的弱点被扩大成全球灾难。那正是我们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思维的一部分，甚至，还把它带入到新的环境中来。兹比格，你当年处在决策核心时的感受如何呢？

布热津斯基：哦，我的工作之一，是协调总统在核打击到来时的回应。我想，布兰特，那也是你的职责，是吗？我并没有泄密，不过，大概是这样一种过程：

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 1 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 2 分钟之内，我们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 3 分钟，我们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样是在第 3 分钟，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 3～7 分钟之间，总统会决定如何作出反应。

这件事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这是一次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假设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许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他会如何反应呢？总会有一种不确定性。在任何情况下，这个过程必须在 7 分钟内完成。我想，这个时间，与你们共和党政府的估算应当差不多，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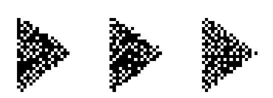
斯考克罗夫特：嗯，差不多。

布热津斯基：到第 7 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是什么样的决策，都必须执行。这并非完全的理论臆想，因为我们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有一次，我被半夜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当然，最后搞清楚这是一场演练，但不知怎么传着传着却被某些人误读成真的核打击了，不过，我们的反应很快。没有什么大事。

大约到第 28 分钟的时候，就会出现后果。也就是说，你和你的家人就已经死去。华盛顿被夷为平地。大量美国军事资源被摧毁。但可以想象，总统同时也会作出反应决策。我们已经回击。6 小时之后，1 亿 5 千万美国人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这就是我们当时与之共存的现实。我们尽可能地使之稳定可控。既不能首先进行核挑衅，又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坚定地执行敌对核政策，这样任何一方都不会心存侥幸。

现在就不一样了。我认为布兰特描述得很好，现在有一大堆棘手的问题。新的现实是一种分散的动荡。我认为，那就要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模式，要求我们对于全球变化的复杂性有着更加纯熟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理解自身责任的明智社会，需要一个不会在恐惧中慌忙作出取悦大众的荒唐决策的社会，需要一个不会使我们与世界隔离，不会让我们变得非常脆弱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领导力。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当冷战结束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冷

战的人来讲，真可谓是突然之间，一切都结束了！可以理解，有一段时间，外交政策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人们好像真的不在乎了。这种观念让人迷糊了很长时间。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9·11”事件唤醒了人们。

伊格纳休斯：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记得世界改变的那一天，当你随之成长的世界、你和你的这一代人都十分熟悉的世界，变得完全不同的那一天。我想说的是，那就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苏联帝国正在崩溃，可能再也无法修复。布兰特，你当时正在白宫。请描述一下那一天，这场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开始终结的时刻。把你的想法描述出来。

斯考克罗夫特：不过，当时，我不会把柏林墙倒塌的日子当成“那一天”。对我而言，那一天是贝克（Jim Baker，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译者注）和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译者注）站在一起，宣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日子。对我而言，那才是真正的冷战结束的时候。苏联人在柏林墙倒塌时受到过沉重的打击吗？整个帝国当时摇摇欲坠吗？是的。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清楚结果会如何。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拼凑一个邦联，以代替老旧的苏联。他努力想修补架构，而不是要摧毁它。所以，一切都仍然处在模糊未定的状态。我们是不是感觉很好？当然是。但在那个时候，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总统的感受，却是“别得意忘形”，我也是同样的想法。即使这就是冷战的终结，我们也千万不能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种“赢者通吃”的错误。恰恰相反，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是赢家。我们胜利了，苏联也胜利了！柏林墙第一次被破坏时，总统就把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美国 CBS 资深记者）就问：“总统先生，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高兴啊！我还以为你会很想在柏林墙的废墟上跳舞呢！”总统回答说：“哦，我不是那种人。”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我并不想幸灾乐祸。因为莫斯科的反应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一切努力。

伊格纳休斯：是非常敏感。但现在坦白地讲，难道你当时不想在柏林墙的废墟上跳舞吗？兹比格，你对冷战终结时的记忆如何？你的一生都在为冷战的结束而战斗。

布热津斯基：嗯，首先，我认为布什总统和布兰特当时的处理方式非常明智和娴熟。那是专家的手法。对我而言，最大的成就感并不是柏林墙的倒塌。我的大部分成年时光，都在就如何削弱苏联集团提供战略建议。我在这方面已经拥有一整套理论，这套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我的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渗入并削弱苏联集团的和平接触来缓解欧洲的分化状态，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使我长久的期待变为现实。

但我个人最感到满足与有成就感的巅峰时刻，却是在1991年的12月25日，那是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落下，整个苏联解体的日子。在那一刻，我知道有一些比苏联集团的消亡还要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历史上最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正在解体，或许是永久性地解体。

那时，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逼迫退位。克拉夫丘克是当时的乌克兰总统，这个共和国的独立只维持了三个星期。舒什克维奇是白俄罗斯的总统，这是原属苏联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国力也很弱。他们一起使苏联解体。

斯考克罗夫特：那是个让人极度伤心的时刻。因为在1991年的圣诞节，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布什总统，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个电话了。旗帜——苏联旗正从克里姆林宫落下。我要离开办公室了。苏联现在只是历史。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叶利钦赢了。

布热津斯基：是的，没错。我也回忆起来了。叶利钦先给布什打电话，然后又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他已经跟布什通过话了。戈尔巴乔夫非常生气："你竟然第一个跟布什通话？比我还早？"

斯考克罗夫特： 兹比格提出了苏联解体的另一项含义。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一系列后果，其中就包括法西斯主义，这类社会运动想要改造社会，却毁了整个世界。它也标志着世界上大型帝国的终结。有两个这样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了，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最后一个轮到苏联。从波罗的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中亚的动荡轴心，恰恰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的疆域。

伊格纳休斯： 好的，让我们谈一谈自那个时刻以来，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你们提到红旗落下，“邪恶帝国”瓦解。我们怎么会从那个时刻走到现在？怎么会从那个骄傲胜利的时刻，走到现在让美国人感到极度脆弱的时刻呢？好像有一种美国力量流失的感觉，好像我们身处一个无比艰难的时代。在冷战结束之后，我们丢失了哪些机会呢？

布热津斯基： 嗯，确实有一些丢失的机会，还有些错误的行动。丢失的机会可能在于，美国没能很好地利用将萨达姆·侯赛因成功赶出科威特的大好时机，去促成一项以巴和平协议。

那时的老布什总统，确实处在一种在全球高视阔步的地位，这种地位史无前例。布兰特比我知道得更多。我怀疑布什总统可能当时想要连任，想把这件事拖后点儿考虑。他的确逼迫沙米尔（Yitzhak Shamir，1988－1992 年期间曾任以色列总理。——译者注），向他放出信号，表明美国实现目标绝不含糊。但是，国内政治纠缠不清，后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另一个丢失的机会，则是在克林顿主政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势力范围。当时，我们能否塑造新建立的俄罗斯联邦，使之与西方开始更富建设性的关系呢？我不知道，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我们国内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顾此失彼，没能采取措施去实现稳定中欧的目标，导致这一地带成为欧盟、北约和新俄罗斯联邦之间争夺的目标。

但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从而创造出某种共享机制，使得俄罗斯更能有一种欧洲归属感，更倾向于成为今天具有全球意义的大欧洲宏伟计划的一

部分。但所有这些丢失的机会，与“9·11”事件之后的致命误判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伊格纳休斯：我们稍后会谈到“9·11”事件。我不想进度太快。不过，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兹比格，因为你一向都是对苏强硬派，你是否认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苏联弱点的方式，最终损害了我们自己？

布热津斯基：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做的事情有何不妥。我们无法阻止波罗的海国家重新获得独立的努力。我们无法阻挡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成为西方世界一部分的愿望。如果我们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那么他们今天将会变成无人区，很可能会与俄罗斯发生激烈的冲突。

看一看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所面临的问题，还有最近爱沙尼亚人与俄罗斯人的冲突。我认为，在欧洲地区缔造稳定和清晰的界线，正是西方世界的首要战略目标。而这个目标是否需要某种足以引诱俄罗斯加入的超国家架构，从而给予俄罗斯人更强烈的融入西方的参与意识？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答案。

伊格纳休斯：俄罗斯当然会把那段时期看作是极大的民族羞耻。他们谈到鲍里斯·叶利钦的时候，将他视为当时国家病态、糊涂、软弱的可耻象征。布兰特，兹比格刚才提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果老布什总统还有连任的机会，他会做些什么呢？这是个我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请你就此谈一谈。

斯考克罗夫特：哦，好。让我先说一说苏联解体前夕的波罗的海国家。由于东欧正酝酿分离，所以，波罗的海国家的话题，恐怕是当时我们和苏联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它们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来不承认它们加入过苏联。所以，这是个让双方都容易冲动的话题。

美国国内有很强的波罗的海游说集团，要求我们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这些国家内部有起义和各种动荡。局势非常微妙。结果，我们并没有逼迫苏联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而是成功做到了让苏联处在一种自己承认波罗的

海国家独立的地位上。现在，这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似乎无关大局。但当时我们在这个特定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

但谈到你的宏观问题，我们本可以继续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果，促进巴勒斯坦和平进程。我们想要的一件事，就是向阿拉伯世界表明，虽然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但我们也准备好了在阿拉伯人受压迫的时候提供帮助。萨达姆不宣而战的入侵，恰好让我们有机会展示这样一种态度。

当萨达姆不断地说："让我们讲和吧。"我们说："不，现在不行。你先撤出科威特。"然后，我们向阿拉伯人承诺，我们会在科威特之后转向和平进程。我们后来开了马德里会议，那是第一步。如果老布什总统能够连任，那将会是他的重要的外交目标。

伊格纳休斯：那你们会回到伊拉克处理萨达姆问题吗？

斯考克罗夫特：你是说当时？

伊格纳休斯：我是说，你们会允许萨达姆继续掌权吗？如果有第二任，你们会回去继续未竟的事业吗？

斯考克罗夫特：不会，不会。那不是什么未竟的事业。我们很早就决定，将萨达姆赶下台的人不应该是我们。而且，正如你所知道的，许多的外交政策，都未必能够达到完全的成功。但是，我们所做的，是让那个野心勃勃的萨达姆留在原位，但是他将没有能力实现其野心。他的军队已经遭到严重打击，制裁使得他无法恢复军队。他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并不算一个威胁。他一向就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战略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威胁。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成功的，即使能够反悔，我也不会作出其他选择。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请注意，我不想听你专门去批判小布什总统。我只是要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以及老布什总统认为，1991 年的时候继续推

翻萨达姆是没有意义的行为。为什么你们不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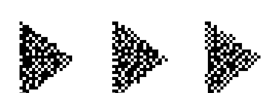
斯考克罗夫特: 有三个理由。首先，我们的联盟，其中的主要成员都是阿拉伯国家，如果我们这样做，联盟就会分裂。阿拉伯军队不会愿意进入伊拉克领土。

其次，我们解放科威特，是有联合国决议授权的。当时，我们整个行动中一直努力做到的，就是为冷战后的世界建立起处理此类入侵案例的行为模式。如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现在能够运作，能够如其创建者所预想的那样，去应对侵略事件，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确保我们自己别乱说话，别说出“哦，是，安理会，很好啊！不过，我们自己想走得更远一点”这样的话。那会破坏我们努力去建构的世界。

但是，最终，也是最根本的理由是，我们知道如何去实现我们计划实现的一切。我们确切地知道，如何将萨达姆赶出科威特。我们知道需要多少军队，如何使用军队。我们如果继续进入巴格达，可能不会遭到反抗。但是，那将改变整个冲突的性质，将我们变成占领者，将土地变成仇恨。我们的军队可能会遭到游击队的骚扰。而且，我们当时没有退出战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认为进入伊拉克将是一场灾难。

伊格纳休斯: 当时你自己对总统提过什么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 句号。一旦我们将他赶出科威特——句号。



伊格纳休斯: 那么，让我们往回看，看看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到 2008 年的。红旗倒下了，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赢得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我们有一个人人称之为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权威无人挑战。

这些在华盛顿圈子里以及决策者的脑海中，留下了什么印象？它以什么

方式衍生出某种态度，并最终导致我们当前的困难呢？布兰特，你认为它创造了一种傲慢，一种认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做成事情的轻信吗？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有一种巨大的解脱感，外交政策不再关系重大了。其次，我们看看四周，比起其他国家来，我们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罗马帝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过我们当时所处的这种地位。那种感觉真是有点儿让人冲昏头脑。

当然，我们忘记了，我们并不习惯于管理世界。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躲在两个大洋的后面，很安全，我们可以决定是否要加入世界，如果需要加入，我们就会思考加入的方式。这是一个可选项。欧洲人制定了战略框架，我们决定去加入哪一方。现在，突然之间，他们全都不在了，我们却站在中间。所以，是的，我们有这个力量，但我们并不习惯于为了世界整体的利益而使用这种力量。

最主要的是，我们仍然受制于冷战的思维，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为冷战而设计的。

伊格纳休斯：我们怎样受制呢？受制于一种什么模式呢？

斯考克罗夫特：除了冷战的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帝国的终结之外，还有其他新的力量正在形成。兹比格前面也提到过，那就是美国无可匹敌的力量，战争本质的变化，以及最重要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含义之一，正如兹比格所提到的，正是全世界人民的政治参与。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人知道他自己村庄里发生的事，也可能是邻近村庄发生的事，但不会更远，他也不在乎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他个人与帝国的战争没什么关系。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很清楚世界上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反应是必然的，有时还很强烈。这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一开始没能很好地想出应对方法，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只是它的一种表现而已。

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它们并不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才开始的。但它们却被冷战结束的胜利感所遮蔽。

当冷战结束时，突然之间，它们来了。我想，有一段时间，我们十分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认为它有什么关系。所以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没有制定新战略的压力和动力，第一是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在改变，要制定新战略非常困难。第二也是因为，我们没觉得自己真的需要新战略。

伊格纳休斯：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有一位著名商人的儿子，名不见经传，个子很高，也很富有，竟然向美国宣战。我们并不太理解这件事。让我来问一下你们二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你们对奥萨马·本·拉登这个名字给予了多少关注？兹比格，你记得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关注过这个名字吗？

布热津斯基：没有。理由很明显。他当时并不那么重要，直到后来他做了一些让世界震惊的事情，他才变得重要起来。他是许多的阴谋家之一，狂热地追求他们自己所谓正义，不断与美国交恶，视美国为挑战其信仰核心的怪物。

但我想再往前说一点，回到布兰特所说的时代，20 世纪 90 年代这段时期，哺育出了一个后来因自以为是、态度极端傲慢而著称的美国。这种态度，在“9·11”事件之后，又变得极度的垂头丧气，在许多方面都士气低落。

事实上，这种自高自大幻化成一种概念，仿佛历史已经停止，仿佛我们正处在历史过程的制高点。

斯考克罗夫特：历史的终结。

布热津斯基：没错，正是历史的终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 1991 年 12 月 25 日赐予我们的新帝国地位。我们确实力量超群，但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里。可是我们傲慢地认为，我们现在就能定义这个体系中游戏规则，我们将运用这些规则，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开始战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阻止战争等问题。我们的傲慢在“9·11”事件之后的反

应中展现无遗。我认为，而且我很难过地说，我们的反应至少让奥萨马·本·拉登取得了某种战术上的胜利。如果没有我们的此种反应，他不会有这样的胜利。

“9·11”事件是一场犯罪。它令人发指。它的破坏力被人为放大，因为如此多的美国人在第一时间看到电视直播，成为这场灾难感同身受的一部分，他们与那些现场受难的人们一同受难。

斯考克罗夫特：一遍又一遍。

布热津斯基：一遍又一遍。但我认为，这里我宁愿冒着被指责为党派主义的风险，我认为我们当时反应的方式，将美国推到了一种境地，使得美国不得不卷入我所说的“冲突圆地区”的无休止的冲突中去。这一点布兰特前面也提到过。你可以画两条交叉的线，一条从西到东，从西奈半岛到印度到中国；一条从北到南，从俄罗斯的南部边疆向下直到印度洋。然后，如果你根据这两条线画一个圆，这个圆的里面大约会有 6 亿人。这是一片动荡的地区，到处都是种族、宗教、领土和社会矛盾。

我们现在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到了一种令我们自己财政紧张的地步。成本高得难以置信。我们的军队负担过重。每天我们都听到更多关于军队伤亡的报告。

美国行为的合法性与可信度，却被极大地削弱了。所有这些反而将本·拉登的行为反衬得十分重要，同时凸显出美国人所陷入的全国性的突发性的歇斯底里。在这样的歇斯底里之中，许多导致负面效应的政策被制定出来。这些政策得到通过。大多数民主党人也表示赞同，包括一些在 2008 年曾经竞选过总统的人。

我认为，那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的转折点。当时犯下的错，我们今天仍在修补。这就是我和布兰特所要说的，怎样去修补它。

▶▶▶

伊格纳休斯：那就是我们的主题。布兰特，为什么你不来谈谈呢？你是否记得“9·11”事件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斯考克罗夫特：我当然记得“9·11”事件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当时是一个国防部审核小组的主席，这个小组叫作“全程审核小组”，审核核武器及其指挥控制的全过程，从实验室直至生产过程，还有部署和应用，直至摧毁。在“9·11”事件的当天早晨，我们正打算飞往奥福特空军基地，我们将要乘坐的，是一架拥有总统空中指挥系统的飞机。我们当时坐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待起飞，第一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我们当时以为这是一场事故。

我们的飞机起飞后，第二架又撞上了。这时，我有机会了解当时的指挥控制系统的运作。总统当时在佛罗里达，副总统在白宫指挥中心。看到“9·11”事件，确实不好受。就这样，我当时并不在指挥一线。

伊格纳休斯：那很可怕，因为在飞机上，你正在想着核武器的使用，可是，带着开罐刀的穆斯林斗士却认为，他们能够开动一架满载航油的飞机，让它撞向建筑物，并将其摧毁。我来问问你，“9·11”事件将美国人的陀螺彻底震翻了。实在太令人震惊了。但是据说，陀螺如果转得足够快的话，还能够回到中心点。你重重地击了一下陀螺，但只要它还在转，它就会笔直地回来。可是，在我看来，我们的陀螺越转越远离中心，再也没有回来。我不知道你是否也这样认为？如果你赞同，原因又是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这是一个有趣的比喻。它被撞倒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战争之类的事情不会在美国发生。我们也打过仗，但那是在别人的地方打仗。我想这对美国人来说确实是震痛。

现在，我怀疑正在发生的，是这种震痛与我们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优越感同时袭来。我们说，我们拥有所有的力量。我们拥有它，我们应当

使用它来改造世界，从中东开始，从这个动荡的地区开始。这就是促使我们走上这条路的基本思路。有人想要利用这种力量优势，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事情正在恶化。“9·11”事件十分令人震惊。全世界都感到忧伤。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们有能力自己做点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去与朋友和盟友们商量。我们可以自己来做。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怎么想？

布热津斯基：我记得，“9·11”事件之后，北约开了会，集体通过了一项决议，第一次为了美国的利益引用第5条条款。我们却很轻视地说：“不，谢谢。”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我们谴责“9·11”事件，这是它应得的，总统确实谴责它，但如果我们那时接受了盟友们的团结行动，并利用这种团结，来进行我们在阿富汗所应作的大胆尝试，那会如何呢？

我们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而这个政权本身却从未共谋过袭击美国。它是一个恶毒的、激进主义的、反动的政权，但却是矛头向内的。但它似乎暗地里释放出恐怖信号，它会去保护那些它曾经对其友好的人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所以，它就在主观上成为基地罪行的同伙。

所以，我们就有推翻它和摧毁基地组织的理由。可是，不幸的是，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假设我们仅止于此，满足于阿富汗，假设我们没有制造出惊慌和怀疑的氛围，假设我们，我很抱歉地说，没有制造出有关伊拉克和萨达姆的谎言。

如果，相反，我们坚持要找到以巴冲突的某种解决方式，那将化解中东阿拉伯反美主义的主要根源，也许就不会为奥萨马·本·拉登之流提供如此肥沃的土壤，用来袭击美国。假设我们与盟友一起采取这条路线。我想我们的处境绝对会更好一点。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兹比格谈及“9·11”事件之后伊拉克威胁被夸大的方式，用了“谎言”一词。你认为这过分吗？

斯考克罗夫特：那取决于你在谈论什么。我认为情报机构弄错了，这是情报机构的致命伤，但我们却忘了，其实这样的错误很容易犯。错误在于他们绝不会自问一个问题：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什么他如此行事？回顾起来，这很清楚。他害怕他的邻国，害怕他自己的人民。

布热津斯基：他在吹牛。

斯考克罗夫特：当时确实让人担心。我们知道他有化学武器。他曾经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我们知道他曾经试图研发核武器。我在 1991 年曾经发现，他走得比我们想的还要远。所以我们有些担心。

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基于假设行动。我们看到的所有模糊信号，我们都用同一种方式来解读，最后的结果就错了。有些人知道它错了吗？很有可能。我不知道。我自己在 2002 年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萨达姆有核武器。但我当时不知道。

伊格纳休斯：你们二位都有勇气和远见，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警告公众，称这是一个错误。你们二位在外交政策圈子里都很特别，因为你们都宁愿放弃与那帮强硬派国家安全专家为伍，而仍要坚持说出“这对美国不利”的话。这是一条基线，美国人民很想了解，为什么在如此多的其他人观点相反时，你们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很重要，所以让我来问问二位，请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挺身而出，你们的信仰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在过去 20 年内一直担心，我们可能被卷入刚才所说的那个“冲突圆地区”的冲突旋涡之中，这种担心有增无减。我担心，我们会成为唯一的主角，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依靠军队去架构一种秩序，可是这种秩序仅靠军队根本无法架构成功。我们想要压缩成本，想要尽快结束，可是其代价高昂，已经高到令我们无法承受甚至压垮我们的地步。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为萨达姆辩护。我甚至在入侵之前就说过，

如果我们能够让整个国际体系都支持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也不持异议。因为如果得到国际体系的支持，我们就能够重复布兰特和老布什总统10年前或更早之前所做的一切。

我非常关注这一概念，我们开始冒险，可是整个冒险却基于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判断，那么这场冒险的结果真是很难预测。5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让我们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主观上、客观上、财政上、经济上、道德上，无论你从哪个方面来看，都难以承受。而其潜在的影响正在日益放大，越来越大。

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目前的局势极度危险。我担心在我们与伊朗人之间，可能会出现某种事件，进一步将伊拉克的战线扩大到伊朗和阿富汗。我担心我们可能不情愿地卷入某件与巴基斯坦有关的事件中去，尽管也许理由很高尚。我担心，我们可能为了打击基地组织，多多少少卷入到巴基斯坦的内部动荡之中去。

但是，我很怕到时我们在这样的冒险中仍是孤军奋战。因为我们最初的反应大多被傲慢的感情所驱使，“我们自己做得来”。于是我们轻蔑地拒绝了欧洲人，甚至对他们说：“如果不和我们站在一边，就是反对我们。”小布什总统使用这种词汇，实在是非常奇怪。结果就是，我确实感觉到“9·11”事件不仅是本·拉登的一场战术胜利，而且是美国自制的一道战略伤痕。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谈到入侵伊拉克的问题，从个人层面上来看，由于你与布什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你的行动显得非常勇敢。你选择在《华尔街日报》上向公众说出你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当时你的脑海中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继续朝这条路走下去，你害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斯考克罗夫特：我最担心我所见到的那种日益匆忙而冲动的决策过程。我已经谈到了核武器。即使萨达姆有他的核计划，他离核武器也依然很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另一个问题是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的关系。有指责说，他支持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可是，这种指责在我听来，

完全是杜撰和臆想。奥萨马·本·拉登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世俗主义者。我认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本·拉登的符咒。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把这一条排除。我的基本观点仍然与1991年时相同。我认为，进入伊拉克是一场十分容易的冒险，但一旦我们进入……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不会被改造成民主国家。如果我们进入，就会惹上大麻烦。

事实上，萨达姆非常容易驯服。我们在"9·11"事件之后，在处理恐怖主义的威胁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想，进入伊拉克将在根本上偏离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所以，我的立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让我们先讨论一下。"

伊格纳休斯：慢慢来。

斯考克罗夫特：对，慢慢来。因为，你知道，战争很少能解决问题。战争有其自身的驱动力。发动战争本身就能创造一个新环境。这个环境可能有利，也很可能不利，但经常是偏离于任何人的预期。因此，除非仔细地分析了后果，否则我们不应诉诸战争。

伊格纳休斯：我想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是否部分在于我们刚刚从你们二位描述的世界中冒出头来，那曾经是一个冷战的世界，我们与之共存亡，你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维持现状。而在"9·11"事件之后，在2001年9月11日到2003年3月之间，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认为这种现状正在消灭我们自己。这个现状导致飞机撞向世贸双塔。我们准备去刨根掘底，从坏蛋中最坏的一个着手，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如果我说，我们正在从一个安于现状的大国转向一个改造世界的大国，你觉得这样说公平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那太宽泛了。我认为我们在进入伊拉克之后，成了一个改造世界的大国。那也是所有民主争论风起云涌的时候。之前，没有这样多的民主争论。

但我认为，政府的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目标。新保守主义者的想法可能与

你的描述最接近。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伊拉克是该地区开创民主的理想场所，并且可以将民主从那里发散开来，扩大到整个中东。要说美国正从一个安于现状的大国变成了一个改造世界的大国，我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或者说战略概念。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想法而已。对外政策可以被称为“观点融合”。新保守主义集团居于核心，因为它拥有这种战略概念。其实，还有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我心目中，如果更准确地称呼他们，他们恐怕应该被称为强硬派现实主义者。可是，他们似乎也借用了大量新保守主义的战略观点，不过，坦白地讲，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然后，还有总统，他可能既不是新保守主义者，也不是强硬派现实主义者，但是，当然，“9·11”事件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惊。甚至从个人感情上讲，这都令人无法忍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倾向于相信他非常易于接受那种建议，既强硬又有战略意义，而且按你的说法，还很有改造世界的意义。

其实沙龙关于如何在“9·11”事件之后处理以巴冲突的建议，也很打动总统。沙龙使用了总统自己的语言来形容恐怖和恐怖主义。这可说是沙龙之罪，他想借这股东风。然后，巴解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引发了一场决定性较量，沙龙在美国的支持下，立场强硬。而巴解组织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沙龙访问圣殿山的行为所激怒而引发的。

布热津斯基：然后那就成了更明显的新战略尝试——如何重建中东。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战略，既使用武力，又喊着民主化的口号，好像意思是说，我们无论如何都会重新洗牌，再来一局。所有这些行动，将美国赶入一条险峻的小路，而伊拉克的军事干涉行动只是这个更大规划的一部分。但是，这项宏大的规划，在概念上却十分模糊，在历史上也无据可查。它完全忽视了一项事实，我们莽撞地一头扎进这个地区，可是这里的人极度仇恨英国殖民主义，他们对当年的殖民历史记忆犹新。我们现在被视为新的殖民侵略者。

我们的战略事实上仿佛在说，唯一让中东稳定的方式，就是先让它不稳定。也就是说，推翻现有政权，创造民主的根基，你就会拥有自由的花朵。我们知道自由的果实多么甜美。

我们坚持在巴勒斯坦进行选举，这导致哈马斯的胜利。我们又教促埃及走向民主，不过行动十分迟缓，反而强化了穆斯林兄弟会在那里的生存机会。今后，穆斯林兄弟会反倒可能崛起为埃及政坛的核心力量。

我们没能在这个地区实现稳定。我认为，这个地区并不喜欢被一个并没有准备好不惜任何代价完成帝国使命的国家来强加帝国统治。我们是一支“半心半意”的帝国力量。我们愿意成为帝国主义者，可是一只胳膊却被绑在背后动弹不得。这行不通。

伊格纳休斯：直到强硬起来，才能成为帝国主义者。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是在猜想。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认为，“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的态度也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某种宗教热情。但我们是在猜想动机何在。

伊格纳休斯：我想给这一段的讨论加一点结论性的注脚。1982 年我是一名中东驻地记者，那时，以色列厌倦了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种种可怕烦人的际遇，于是就下定了决心。

斯考克罗夫特：进攻贝鲁特。

伊格纳休斯：下定决心进攻贝鲁特。他们侵占黎巴嫩，颇有点儿像我们侵占伊拉克，他们想要抓住问题的核心，然后处理它。他们于是进入了。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但是，结果却是，他们并不比我们有更明确的撤出计划。

你可以说，以色列在安全上和战略上，都仍然没有从那次豪赌中恢复过来。我发现，沙龙说服马内察・贝京（Menachem Begin）下决心向黎巴嫩派兵的能力，与小布什的幕僚们说服小布什让他下决心进入伊拉克的方式，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布热津斯基：这与我们早先谈到的观点有关。后帝国时代，整个世界都在政治上动员起来，你不能在这样一个时代追求一种成功的帝国政策。帝国政策行得通，因为你处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中。你可以使用相对较少的更为先进的军队，打击不那么团结的抵抗运动。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今天，你需要处理的是，被激怒的，十分激进的，有时是被宗教狂热驱使的人群，他们会反抗。这正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发现的真理，也是我们在伊拉克，经历痛苦后发现的真理。这也是我所害怕的，我们可能最终会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发现同样的真理。

斯考克罗夫特：以色列人有一条信仰：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反击对手。那在一段时间内行得通。但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

伊格纳休斯：好吧，那么你们都必须有绝对优势兵力留在伊拉克，这一点我们没做到。让我转向其他几个更宽泛的主题。我将首先提一个你们二位都很熟悉的名字，他是冷战时期战略的主要建构人之一，他的名字是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兰德公司的著名核战略家。卡恩在20世纪60年代曾表示，我们在冷战中与苏联一起制造的两极世界相当稳定，而在多极世界中，你会有许多分散的力量中心，那会相当不稳定。而且，从一种世界向另一种世界的转变也会不稳定，而且过程十分艰难。

他的这一论断，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们还没讨论的一件事，就是新的力量极的崛起。最令人惊异的是，中国，还有印度，或者俄罗斯也算是。

我们真的必须面对更复杂的世界。下一任总统将会考虑一个问题，有这么多的"力量极"存在，他应当如何定位美国的力量？所以，我现在请你们谈一谈有关这个新的世界的现状。

斯考克罗夫特：好的，我想这还漏了一件事，那就是全球化带给世界的改变。不再是赫尔曼·卡恩式的旧的均势世界，也不是亨利·基辛格式的多

极平衡。它已经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全球化正在全面侵蚀国家疆界。最重要的是，在信息科技方面，同时也在卫生和环境领域。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已经不是传统上提供的那种服务。

这些力量溢出国家边境，会使弱小国家更加弱小。因为弱小国家控制领土的能力较弱，它们的疆界可能会对毒品集团、恐怖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开放。它们在控制公民以及为公民服务方面的能力也较弱，因此将导致不断增长的内部动荡。

我所说的是，世界正在改变。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如何合作，才能控制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来解决问题。我想说的是，全球化的真正力量，有点儿像200年前的工业化，工业化缔造了现代工业国家，有了这些大工业，你就必然需要管理。你需要控制这些新的力量。那样，就出现了现代国家。

现在，全球化有着同样的影响，但却朝着相反的方向。

全球化正在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所以，中国和印度在当前背景中的崛起，确实是与100年前的那种崛起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我想说，已经大约有一代人的时间了，我们看到，国家间的战争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方式的终止。相反，却有些乱七八糟的冲突，如果大国参与这类冲突，它们是通过代理，或者通过大国联合。用“极”的概念来描述世界，已经越来越不准确。不仅是世界的模样在改变，而且我们如何行动以完成目标的方式，也在改变。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是三边委员会（创立于1973年，北美、欧洲和亚太三个地区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政策协调机构，布热津斯基任第一任主席，后因他担任公职离任后，取消委员会主席一职，只保留各地区主席。——译者注）的缔造人之一。这些不同的极，或者类似极的概念，如何使它们合作和联合。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有着上升性力量的世界之中。我们在整个余生中都将看到中国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想。

布热津斯基：嗯，那当然是对的。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当今的全球体系的存在，主要定型于 1945 年到 1950 年之间，那时有截然不同的力量现实。所以，第一要务是要调整现存全球机制，以适应像中国、印度、日本的崛起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可能崛起这类新的现实。加上宏观的现实背景，那些躁动不安、政治上觉醒的大众，继续给体制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这导致布兰特刚才提到的那些威胁。零散的冲突四处蔓延，有时就像一场森林大火蔓延的方式一样，因为风的力量，它会跳出国界。这种可能性随时存在。

在这样一种世界，对复杂现实的有效政治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不过，我认为，对于美国这种大众民主国家而言，要想真正达到这种管理水平，非常困难。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公众没有理解到这些新现实的含义，不仅是没有理解，而且是褊狭心态下的无知。这是十分可悲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外交圈和领导层都不愿意共同承担起这个新时代所需要的责任。看看那些在气候控制和全球环境问题上的拖延迟疑、相互较劲。看看全球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复杂性将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斯考克罗夫特：哦，我非常赞同。对我而言，这个世界尤其需要一个机制，处理新挑战的机制，而我们却没有做到。是的，你说有国际组织。有联合国。但是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组织。它是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建立的。不过，我认为，即使我们现在并没有联合国，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世界中也没法创造出一个类似的国际组织。

伊格纳休斯：为什么？因为人们分歧过多，争吵不休？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同意吗？

布热津斯基：是的。

斯考克罗夫特：还有一件新事物。举个例子说，现在在联合国内部有一种舆论——让我们称之为发展中世界。这种舆论认为，联合国由发达国家控制，并且为发达国家的利益服务。但是，由于发展中世界控制着预算和人员，他们却不让联合国改变。就像两年前，科菲·安南想要改革联合国，使之更有效率，却没成功（当然，我认为，美国也是个罪魁祸首，在安南的提案被提交前几天竟然加上了700条修正案）。无论如何，我们现有的许多机制都已经过时，很难创造出新的机制。所以我们迟疑不决。

伊格纳休斯：我曾经在德黑兰参加过一次内贾德总统的记者招待会，我听见他对伊朗听众说，联合国是由衰落势力创造的。他指的是1945年的美国及其盟国。联合国今天已是非法。我们需要新的组织代表正在上升的力量。我们，还有中国。那么，这种观点显然已经出现了。

斯考克罗夫特：你还可以走得更远。如果你看一看我们的体制就会发现，其实许多都已经过时了。就从国防部说起吧。我们更适合去打赢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应对现在的世界。中央情报局的建立与构成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苏联。现在它正在挣扎调整，如何才能去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北约现在关注阿富汗，但北约不是为阿富汗这样的国家而设计的。然后还有联合国。所以我们仍然处在冷战的残留影响之中，处理一个新世界，用的却是并非为这个世界而设的旧体制。

伊格纳休斯：我们是在用冷战的机制去处理后冷战的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没错。

▶▶▶

伊格纳休斯： 让我们谈一点儿关于什么是后冷战机制的问题，就从布兰特所说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讲，工业革命创造了组织中的等级与官僚体系。你可以说，有井然秩序的官僚体系的民族国家逐步完善，正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然后民族国家不断壮大，整个19世纪互相交战，20世纪又进行了几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几场战争导致国家组织的创立。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组织其实更加等级森严。无数国家处在一个巨大的等级体系内，一层又一层。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成果，犹如巨大的婚礼蛋糕。正如你们所说，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没有处理当前世界问题的能力。

在我的同事弗里德曼所称的“扁平的世界”中，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已经被压扁了，以至于任何人都能与任何其他人取得联系。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见地的人们说，我们需要能够分享网络科技的国际机制，这有点儿像自发形成的国家、公司、个人的协会或网络，像非政府组织那样能够迅速专注于某个问题。去工作，然后解决问题。

让我问问你们关于从我们现有的非常等级化的官僚性国际组织转向另外一种不同组织的问题。那另外一种组织会是什么样？

布热津斯基： 我想说，如果认为你刚才所描述的组织代表着我们的选择，那么这个命题实在是有点儿太过简单化。大量现存机制可以被转化和改变。内部权威的分配方式需要被改变。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不可能。

改变联合国会更困难一点，尤其是对安理会的改革。目前拥有特殊地位的国家拥有既得利益，很明显，它们将会使任何改变无效化。但即使是在联合国，我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变化仍会发生。否则替代性的影子机制将会出现。

比如说，八国集团不再是一个功能机制了。它已经有点儿不可信了，因

为它的本意是要建立一个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组织，现在却不是。但我们当然也可以有十四国集团或是十六国集团，将全球最重要的国家囊括进来，包括日本、印度和中国等亚洲国家，还有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国家。当然，这并不能取代安理会的地位，但无论如何，经过一段时间，如果它开始负责任地处理问题，比如说，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或某些其他地区性挑战，那么它就可能会获得某种重要性。

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看到自发形成的组织在处理特定问题。但如果这类组织成为世界主流，我倒有点儿担心。因为我认为这样将加剧全球的不稳定。你需要某种全球范围内的连续性，可预测性，需要共同责任。比如说，我仍然认为，一个重新定义的大西洋联盟，作为一种世界稳定因素，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但是，这样一个联盟必须是开放的，愿意接纳其他想要加入的国家。

我认为，我们不想仅靠自发的创造性来应对世界的复杂性，因为那将很容易导致混乱。全球政治觉醒以及冷战世界的中心主义的衰落，犹如一次大范围的撞击，恰恰包含着加剧全球混乱的潜在含义。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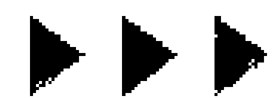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按这种说法，从等级世界到分散化的网络世界，是过于极端了。互联网等新事物所代表的分散化的网络确实美妙，没有人寻求权力，没有人真正行使权力。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绝非如此。非政府组织，先不谈它们自身的机制问题，它们确实反应很快，但是它们要想联合反应，却有很大的困难。你回顾一下几年前面对亚洲海啸时的反应，最佳的反应来自何处？美国海军，他们有组织、有准备，在非政府组织还在迟疑不决的时候就迅速进入，努力找出问题所在。

你需要某种组合。你仍然需要拥有硬实力、软实力或其他什么实力的人来发话："走这条路。"然后再去动员其他人。同时，权力，无论是在美国手中还是其他国家手中，都不能独裁。我认为，我们正在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可能联合国是一个坏的榜样，但它恰恰是目前唯一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组

织。我想要改造它，而不是另起炉灶。

布热津斯基：要另起炉灶，恐怕得先有一场战乱。

斯考克罗夫特：恐怕确实如此。



伊格纳休斯：让我来总结这一段的对话。你们带领我们进入了一场穿越冷战的旅行，这也是对你们自己的事业的回顾，冷战是你们当时每天与之共存的巨大威胁。外交政策的谨慎习惯正是源于这些危险。

然后，我们谈到冷战结束之后的时期，那时有一种放松下来的胜利主义情绪。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担忧多少有些中断。我们没有作出周密的决定。我们有些不太担心。我们创造了许多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是没能阻止这些问题的产生。

所以，我想请你们谈一点儿美国在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中的领导力的本质，以结束这一段的对话。首先，美国的领导十分必要吗？其次，美国的领导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美国的领导非常必要。我所说的领导的含义，首先，它不是独裁，而是一种启发。其次，它能够对于历史和我们的时代有一种开明的洞察力，能够理解 21 世纪新在何处。什么是本世纪的潜力所在，什么是新的全球危险？这样的美国领导力，很可能是一种催化剂。不是对于美国指导下的行动而言，而是对于国际社会准备集体通过的行动而言，或者说，对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国际体系的股东们而言，会是一种催化剂。这样的领导是必需的。但要想这种领导能力出现在美国，我们不仅需要非常特殊的人来担任美国的领袖，这样的人确实有时也会出现，我们还需要一个比现在更加开明的社会去承载它。

我认为美国人是有趣的自相矛盾的集合体，既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

极度无知。我们是一个内向型社会。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不感兴趣。

今天，我们有伊朗问题。有多少美国人知道任何关于伊朗的历史？他们知道伊朗的双重历史吗？曾经有两个伊朗。两个不同的时代，前伊斯兰时代和后伊斯兰时代，辩证地定义了今日伊朗的种种冲突与现实。如果你想要与伊朗打交道，你就必须了解这些。美国人对伊朗滔滔不绝。其实他们一无所知。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有研究表明，美国人不懂地理。绝大部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却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英国的位置。他们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5 年之后，也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伊拉克。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在地图上的什么位置。我们不教全球历史，也不教全球地理。我认为，如果美国真要去做 21 世纪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如果美国真要去启发和领导全球，就必须拥有成熟与老练的思维与心态。可是这一点，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具备。

斯考克罗夫特：我只能说一个词——阿门。但我要重复一点，这又是一个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的一部分。在大部分的美国历史中，我们都躲在两个大洋的后面，相当安全，南北各有一个邻国，都不怎么强大。美国人没必要去学外语。他们能够去全世界旅行，却仿佛从来都没离开过美国。所以，大多数美国人本能地认为，美国自己过得挺好。我认为，他们不想纠缠到世界上的各种问题中去。

布热津斯基：他们想要享受优越的生活。

斯考克罗夫特：他们想要享受优越的生活。而且地方政治也很重要。大部分时间里，连华盛顿发生什么，他们都不想管太多。那就是美国人给人的印象之一。

而且我们的政治结构似乎越来越呵护美国的狭隘利益，而不是促使他们往更广阔的方向思考。除了在冷战开始，或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罗斯福总统想把我们引入正确航道的时候，或者当艾森豪威尔前往欧洲去组织北约的时候，除了这样的危险时刻，我们的领导人很少真正关注国际问题。美国

确实需要你所定义的那种领导力。

一旦美国人被激励起来，我认为，我们会变得相当仁慈。我们并不狭隘，也不贪婪。但我们的政治结构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正如我前面所说，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能够进行开明的领导。不是指导人们怎样做，而是说："集合起来，这是国际社会需要走的路。"

布热津斯基：阿门。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是唯一的能够指引世界的光。

第二章

我们自己制造的危机

戴维·伊格纳休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在伊拉克战争5周年之际，谈一谈中东。过去几天，我们已经读到一些文章，描述5年的战斗之后的伊拉克生活，以及伊拉克人和美国人目睹事情进展时的持续痛苦。

2009年1月份，新总统将要宣誓就职，所以我想请你们二位关注一下新总统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将要面对的斗争。但在那之前，我想将你们和读者的视线带到你们各自在伊战之前写过的一些东西。

我想从你开始，布兰特。你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2002年8月15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距离2003年3月战争爆发可以说是相当近。标题为“不要攻击萨达姆”。这是当时最直白坦率的声明之一。

斯考克罗夫特：标题不是我写的。

伊格纳休斯：我们记者经常说，作者可不一定喜欢这个标题。不过这一次，我宁愿相信，你是愿意采纳这个标题的。我下面要读出这篇文章中的重要一段。你写道，“关键在于，任何对抗伊拉克的运动，无论其战略如何、代价如何、风险如何，都必须要使我们在一段不特定的时期内偏离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目标，更糟的是，目前世界上已经产生出一种反对攻击伊拉克的实质性共识。只要这种情绪挥之不去，就必然会使美国在攻击伊拉克的战略中‘落单’。如果这样，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相对来讲，就会更困难，代价更高。但是，最可怕的代价，还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无视当今世界反对袭击伊拉克的情绪，将会严重侵蚀反恐的国际合作。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

如果没有积极的国际支持，尤其是情报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根本不可能打赢反恐战争。”

所以现在，5年过去了，新的总统将要在2009年1月宣誓就职。布兰特，如果他的日程的第一条就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我写过那篇文章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件。在那个时候，反恐战争，对我而言，就是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毕竟，正是在阿富汗，本·拉登获得喘息，重新组织并且四处活动。

文章中的观点，我丝毫没有改变。变化的是，我们现在在伊拉克，这场战争制造了新的条件。这场战争已经在整个中东地区，包括最远到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燃起了仇恨之火，差异拉得更大，并且将所有的厌恶、憎恨和差异带向了临界点。

无论是什叶派对抗逊尼派，还是阿拉伯人对抗波斯人，反正所有的仇恨都一下子表面化了，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东。而这里也是拥有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地区。

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非常大。这个地区极度不稳定。黎巴嫩、约旦、埃及，你往任何一个国家看，都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伊拉克是一个持续的不稳定之源，因为在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波斯人、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变得非常暴力。我的感觉是，我们没法从伊拉克脱身，我认为，新总统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伊格纳休斯：你说“我们没法从伊拉克脱身”，我想，你不是说永远吧。

斯考克罗夫特：对，我不是说永远。但是那种要在60天内开始撤军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在那儿做什么？我们需要去创造一个稳定的伊拉克，而不是到那里搅浑水。

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将持续多久。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也许它不会很长。我们无法让一个政治体系去做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他们不欠我们的人情。他们并没有邀请我们到那儿去。所以，他们会继续走内部斗争的

路线。那会有什么结果，我认为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法知道。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创造一个能够成为地区稳定力量的伊拉克。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现在轮到你了。我想同样带你回到战前的时光，同样是在 2002 年 8 月，你在《华盛顿邮报》上写过一篇特稿。

这篇文章的标题——当然，不是你自己写的——叫作“如果我们必须战斗”。在文章中，你提到：“战争是一桩过于严肃的生意，其动态结果极度不可预测。尤其是，为了要个人脾气、出于蛊惑人心人为制造恐惧的需要，或者基于模糊的事实论断，就要进入一个高度动荡的地区发动战争，那么，就越发不可预测。”

然后你谈到你所认为的政府应当做的事，包括集中精力去争取国际支持，这一点，布兰特也提到过。你说：“美国应当尽快开始与其盟友以及其他相关力量，包括阿拉伯友国的对话讨论，一起来商讨可能的伊拉克战后的安排，包括可能长期化的集体安全驻军，以及改造伊拉克社会所需要的国际融资计划。”

“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强化美国决心在不可能出台非暴力决议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可信度。”早在 2002 年 8 月，你就已经提出了绝大多数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战后伊拉克会是什么样？如果我们真的开战，我们如何改造它”。

所以，从这一点开始，让我问你与布兰特同样的问题。一位新总统将在 2009 年 1 月末就职，如果他邀请你去总统办公室征求你的建议，你会如何开始？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很明显，那要看我是给一个获胜的共和党候选人，还是给一个获胜的民主党候选人提供建议，两者将有很大的不同。不是因为我会因对象不同而改变观点，而且因为，我会基于该名候选人在竞选时的承诺来运用不同的论证方式。

我前面说过，我仍然会认为，我们在伊拉克的驻军对美国而言过于昂贵，对于伊拉克而言，它具有强大的摧毁力。要想解决因为我们在伊拉克驻军而

产生的问题，就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我们的驻军恰恰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那里，伊拉克就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伊拉克，我们的占领也不可能带来一个稳定、自治、多少能够存活下去的伊拉克。

我们的驻军和半战斗状态的必要性迫使我们追求一种进一步分裂伊拉克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驻军就制造出一种自我延续的不稳定局面。了解到这一事实，再考虑过高的代价和战争对美国在世界上地位所带来的伤害，总统将必须终止把美国继续驻军作为他的目标。

然后，我会证明——当然要取决于总统是谁——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速度去实现这种终止。我个人并不认为，我们应当在 60 天之内开始撤军。

伊格纳休斯：请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认为那将是一个错误。

布热津斯基：因为它过于莽撞，没有留出为这个过程创造一个政治环境的时间。但 16 个月可能就足够长了。

然后，我会对一位民主党总统说："你可以说，你将要撤军。"而对一位共和党总统，我则会说："你可以对伊拉克人说，你想要讨论美国撤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哪位总统，都应当就我们与伊拉克的长期关系以及我们与伊拉克在较短时期内暂时脱离的需要，严肃认真地与伊拉克领导人进行讨论。他应当让伊拉克人关注一个事实——占领不是无限期的，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会自己治理，如果是民主党总统，这个时间点会早些，但如果是共和党总统，这个时间点恐怕会迟一些。

而且，一旦公众都明白我们确实是认真地考虑结束这种毁灭性存在时，我们就应当进入贝克一汉密尔顿委员会曾经谈论过却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的那种状态，我们要同时创造出一种地区框架，在美国脱身之际能够顾及整个地区，也许通过一场涉及伊拉克所有邻国的会议来实现。稳定的伊拉克，会让它的每一个邻国受益，而一个动荡的伊拉克则相反。一旦邻国了解到，我们确实很严肃认真地要去结束战争状态，它们应当都会参加。然后，我们甚至可以扩大会议的讨论范围，处理一些不稳定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认为，那将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我认为，目前盛行的一些关于我们撤出后的最坏结局的描述不可能发生。已经有迹象表明，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事实上的自治状态。

伊格纳休斯：但你也同意，你所提的建议确实有风险，可能会有伊拉克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还指望我们去帮助他们维持国家的完整。

布热津斯基：伊拉克议会已经以压倒多数的投票赞成美国撤军。民众观点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伊拉克人不喜欢我们的占领，不过，我认为，30%的人可能会希望美国撤得不要那么快。而希望美国尽快撤军的比例，则更高一些。

我们必须面对事实，不管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如何高大，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形象截然不同，特别是在伊拉克人心目中。我们基本上被看作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延续人，可是，我们现在处在后殖民时代。美国主要是以驻军的方式在伊拉克存在，这只会使伊拉克无法发展真正的自治式的稳定。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我想知道，如果从兹比格刚才的观点出发，你是否同意我们的驻军正是问题的一部分？你说过，我们无法脱身。但你会同意兹比格的观点，认为我们的驻军长期来看是伊拉克问题的一部分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现在它不是问题的一部分。我认为，它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当前伊拉克暴力活动的减少，部分原因在于，关于立即撤军的论调现在比较少了。要记住，对于伊拉克人和伊拉克政治结构而言，尽管现在很乱，但这是一场零和游戏。只要他们认为我们要撤走了，他们就会在我们离开后互相为地位和权力而争斗。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会在一段时间内提供重要的稳定支持，他们可能就会更愿意相互接触，还可能去尝试一些他们本来不可能去尝试的风险。

所以要说我们是问题的一部分，是的，在占领的时候是。伊拉克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他们憎恨占领。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自身的行为，努力去

说服他们，我们不是占领者，我们只是想来帮助他们，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会提供帮助。

伊拉克的邻国则是问题的另一个因素。伊拉克的长期威胁之一，就在于它可能会分裂成几个部分。对我而言，分裂将会导致该地区的暴力升级。

布热津斯基：好，我们必须预见到那种危险，美国的撤军，如果会在更早的时间内完成的话，就会减少伊拉克分裂的危险。我们的驻军则会加剧伊拉克分裂的危险。

有意思的是，伊拉克大多数稳定而较少发生暴力事件的地区，都是已经自治的地区，包括南部的什叶派地区，中部的逊尼派地区，我们在这里十分依赖部落，还有库尔德人地区。我们驻军的时间越长，我们的离开促成伊拉克统一的概率就越低。

所以，我认为，必须就我们离开的日期，与伊拉克人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这样会促使他们关注需要做的事情。这样的讨论可能还会促进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更为认真的对话。我不太同意，布兰特，伊拉克人会认为我们不想早点儿离开或者我们想推迟。今年秋天，美国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将必然包括伊拉克的未来，而民主党候选人必然会明确地提出撤军的理念。民主党甚至可能会赢得选举。我认为，伊拉克人不可能得出结论，希望我们继续长期驻军。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我也不认为他们希望如此。但是，一年前，民主党的候选人相互之间比谁提的撤军期限更早。现在这已经平息下来。

布热津斯基：但他们现在非常明确。

斯考克罗夫特：但任何微小的关于我们会在伊拉克留下来的暗示，都促成了最近的进展，我想你也会同意这一点。

布热津斯基：我希望再补充一点。我还要说，我们不应当完全拘泥于伊

拉克。伊拉克战争是我们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集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全都相互叠加，制造出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种种动荡、冲突和风险。这包括不断恶化的以巴问题，这个问题引发出大量激进的反美情绪，还有我们与伊朗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我认为，任何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方式，都应当考虑到其他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因素。

斯考克罗夫特：我同意。那是另外一个论点，而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在于撤军问题。该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我们进入伊拉克是件好事。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说："你进来了，你弄得乱七八糟，现在你却留给我们自己解决。"

以埃及为例，埃及是我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最强大的盟友，而现在却完全不在我们这一边。为什么？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我们失去了信心。他们对于我们将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留下来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现在离开，而且把这个地区交给伊拉克周边的相关国家，无疑将导致地区混乱。

布热津斯基：但我并没有倡导"离开"该地区，将伊拉克人抛给其他人掌握。我的观点是，我们应当就终止我们的战斗角色事宜，与伊拉克的各派力量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不仅那些处在"绿区"（Green Zone，自从美军占领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位于市中心的一块占地面积数平方公里的"黄金地段"被划为了所谓"绿色区域"。——译者注）之内的力量，而且"绿区"之外的，也要一起讨论。

不断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人能够担当起更直接的战斗责任，而一旦我们开始撤军，很可能一些起义就会平息下去，因为这些起义，究其本质，是一种民族主义行为，是针对我们的。基地组织为了它自己的恐怖主义目的，利用了伊拉克的这些起义。

但起义很可能在我们明确表示准备结束占领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缓和。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地区努力，表明我们愿意与其他国家一道致力于创造伊拉克周边稳定，那么我们事实上就会转换成一种可持续存在的力量，不再过度依赖军事力量的新角色，采用一种旨在改造、重建、巩固、稳定并保障信心的新方式。如果不能这样做，我们只会在那个泥潭里年复一年地待下去。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如何回应呢？我们今天痛苦地迎来入侵伊拉克5周年。有人读着你的文章，可能会问："好啊，在美国占领1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是不是还会在那里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如果再多待5年，事情就会变好呢？"

斯考克罗夫特：我会这样回应："瞧，我们在那儿。我们所要做的是，制造一个自治而稳定的伊拉克。"我同意我们应当与伊拉克邻国进行这样的讨论。但讨论不应当是关于我们的撤军问题，而应当是关于如何做才能达到自治和稳定。与兹比格所说的正相反，增加军队事实上减少了暴力。暴力已经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了。

布热津斯基：这与我所说的并不矛盾。我承认这一点。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继续说。

布热津斯基：这正是我们把撤军合理化的理由之一。

伊格纳休斯：直接一点，用民主党人不常用的方式说一说，给出你对增加军队的后果的评价。

布热津斯基：哦，我认为，毫无疑问，那会有帮助。但这是另一个我们为什么开始准备离开的理由。如果我们打算等到伊拉克准备好变成一个稳定、世俗或者诸如此类的国家才撤军，那我们就会无限期地待下去。在某个时间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拖延问题，我们的驻军不再那么必要。

库尔德斯坦被库尔德人控制，中央地区现在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部落手中。准确地说，基地组织正在被孤立，因为部落不喜欢他们，与他们对立。南部现在是什叶派军事力量的地盘。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但他们互相开战。

布热津斯基：没错，那是他们的问题。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说到底，绝对如此。那是他们的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我要论证的是，我们不应当就撤军问题谈判，但我们会说，你们越早讨论稳定，你们越努力，那么我们就会撤得越快。目前，我们已经定好了基准，我们威胁他们说，除非他们尽快到位，否则我们不会撤军。

嗯，他们确实没有邀请我们去。为什么他们会不想让我们离开呢？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撤军的程度，要视你们联合行动的程度而定。"然后，我们把因果倒过来，不提撤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努力帮助他们，而不是威胁他们，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机会。

伊格纳休斯：让我试试能否为下一任总统弄出一个"斯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联合备忘录。我想，就我刚才所听到的，二位都同意下一任总统必须与伊拉克人讨论，包括与伊拉克政府及其人民，讨论伊拉克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未来。从定义上来讲，独立主权国家就意味着一个没有大量美国驻军的国家。

我们不应拿美国撤不撤军来说教或威胁伊拉克人。正如兹比格所说，一份快速撤军时间表，实际上限制了双方的对话。

而且还必须有一种新的强大的努力，来做到你们二位在战争开始前就提到的，将整个地区纳入关于地区未来和伊拉克未来的讨论中来。如果上述备忘录放在总统桌上，这是不是你们二位都觉得正确的观点？

布热津斯基：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布兰特和我在关于如何最终解决问题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这既是伊拉克的问题，又是美国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只有在伊拉克人意识到我们不会驻军之后，他们才可能会去真正做他们应该做的事。美国这顶既无能为力又不招他们喜欢的保护伞，盖住他们的时

间越长，他们就越会倾向于维持内部的不合作状态并将这种状态永久化，最糟糕的后果，则可能是伊拉克的分崩离析。

伊格纳休斯：在这场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号召美国撤军，这一定会加深每一位伊拉克人的感受，让他们觉得我们真的快要离开了。这一信息会不会导致伊拉克人着手准备一场争夺伊拉克未来的潜在暴力冲突呢？如果不能鼓励他们采取联合行动达成和解，美国的撤军前景，会不会导致他们开始准备内战，出现我们最害怕出现的灾难呢？

布热津斯基：最终可能会有一场小型的内战。我们多少可以预测势力均衡会走到哪一步。那将会是什叶派与库尔德人联合对抗逊尼派。而逊尼派会失败，败得很惨。准确地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结局，我认为，很有可能在几场小冲突之后，会出现一种内部包容，因为仍然有一种叫作伊拉克民族主义的东西。

最近我看到一些民意调查，绝大部分人——在逊尼派中更多一些，在什叶派中略少一些——明确地认同他们自己是伊拉克人，而且想要一个统一的伊拉克国家。

伊格纳休斯：这听起来好像一场80%占多数的解决方案，政府中的许多人都会叫嚣，他们会说："嘿，我们有库尔德人，我们有什叶派，滚一边去吧，逊尼派。"我们许多人会说，这正是我们如何卷入现在这团乱麻的一大部分原因。为什么现在这就是个好主意呢？

布热津斯基：因为在某个时间点上，伊拉克人必须自治。那种认为我们可以在占领状态中建立某种伊拉克团结的想法简直是幻想。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怎么看？

斯考克罗夫特：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还要加一点。美国的根本利益之一

在于，伊拉克是一个整体，它不会分裂成各个组成部分。

布热津斯基： 我同意。

斯考克罗夫特： 那将会是这个地区的灾难，而我认为，那却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库尔德人并不准备联合什叶派。库尔德人会说："你们自己打去吧。我们乐于旁观。"他们已经得到相当大程度的独立，然后，他们会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当然什叶派的力量要比逊尼派强一些。但逊尼派这一边却有许多逊尼派阿拉伯人资金的支持。一场内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布热津斯基： 也可能。但那真的只是最坏的结局。也有可能认为，如果我们离开，那将会有压力促使他们和解。

斯考克罗夫特： 也可能。

布热津斯基： 也许。而且我想说，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正在付出的代价，你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警告过这一点。如果你认为我们正在付出的代价确实过高，那么，结束这一切就符合美国的利益。

斯考克罗夫特： 没错。但我要说的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可能发生的结局。如果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就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带入类似伊拉克的冲突之中。

那正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我同意兹比格的说法，这不是唯一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地区有一大堆问题，每一个都可能引发灾难。伊拉克只是其中之一，不过，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最好我们担负起全部责任。我们不能仅仅说："你们伊拉克人必须认识到你们的责任。"

布热津斯基： 我认为你作了一个非常公正的判断。我只想就其中一个方面争辩一下。我认为，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

此，使伊拉克人确信，我们的存在会有终止日期，这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一个伊拉克方案，而不是美国方案。

斯考克罗夫特：这正是我们根本的分歧点。我就是认为，撤军是解决问题的障碍。而兹比格认为撤军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布热津斯基：是这样的。

斯考克罗夫特：这是我们分歧的基本点。而且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的政治架构也不一样。

伊格纳休斯：我想回到我认为我们全都视为梦魇的那种可能性上来。当下一任总统准备减少美国驻军时，无论是快速减少还是逐步减少，伊拉克都将会陷入我们最为害怕的灾难，一场血腥的内战。

大约一年前，我曾经问过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穆阿利姆，问他怎样看待一些民主党人提出的快速撤军的提议。而他看着我说："但是，戴维，那是不道德的。"这个回答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觉得这话异常正确。让我们离开这个国家，使之陷入血腥的争斗，如果那真的会发生，确实是不道德的。你们二位都曾在情况分析室待过，都曾位于权力核心。我想问问你们，如果我们看到，在我们逐步撤军之后，伊拉克出现大范围的杀戮，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死于种族冲突，那么你们认为，是否应当允许军队再回到伊拉克？兹比格，如果你需要在这场危机中提供建议，你会怎么做？

布热津斯基：好，首先，这是设想了最坏的场景，我不认为它会出现。

伊格纳休斯：是的。但是，正是由于我们在伊拉克战争前没有作好最坏的打算，才可能出现这种最坏的场景。

布热津斯基：是这样的。

伊格纳休斯：这正是问题的部分原因所在。

布热津斯基：不过，最坏的结局不一定是最有可能的结局。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有时间更改路线。我们不打算一次性撤出所有军队。即使用最快的速度去撤，比如说16个月吧，你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去对形势进行检查和评估。

伊格纳休斯：如果10万人一天被杀死，这是可能的，我不敢肯定你会有足够的时间。

布热津斯基：但关键在于，会有回应的机会，即使会迟一些。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与伊拉克的领导人广泛地商讨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处在“绿区”之内的，还有哈吉姆、西斯塔尼、萨德尔，他们也都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应当能够对于我们按部就班撤军之后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判断。我们的撤军日程本身也是与伊拉克领导人磋商并沟通过的。

所以，重新评估的时间是有的。否则，我们自己制造出来一种令我们害怕的恐怖局势，却让我们自己成为这种恐怖下的囚徒。我们自己首先应当撤军，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等到这样的一天：一切都如此稳定，伊拉克人如此快乐，而我们突然之间觉得可以撤军了。局势不可能明朗到这种程度。

所以有一个突发性判断的问题，这也将取决于我们是在给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出谋划策。一位共和党总统会更仔细地倾听布兰特的建议，总统很可能也会礼貌地听一点儿我的话，不过随后就怒不可遏地告诉我，说我彻底弄错了。一位民主党总统则会更多地听进去我的话，但是，我认为，他会以虚心好学的态度对待布兰特，因为他尊重布兰特此前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斯考克罗夫特：我会说正相反。而我认为，你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不过也不能排除。

布热津斯基：你是说关于总统的设想？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如果我们离开伊拉克，我们的政治形势将使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去平息一场内战。永远不可能。

布热津斯基：嗯，如果我们离开后内战爆发，确实是这样。伊拉克自己不会容忍内战。

斯考克罗夫特：美国也不会容忍这种内战。

伊格纳休斯：下一任总统很明显地将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能够，或者说是否应该，与伊拉克保持持续的关系，使我们既帮助伊拉克人，与其共同努力去实现内部稳定、地区安全，并阻止国家分裂，同时又不会发生被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同时视为美军占领的负面印象？

我想问你们，你们是否认为这种关系是可能的。民主党候选人已经说了，如果伊拉克人需要我们在伊拉克保留一些美军以专门训练伊拉克军队，这应当是可行的。这些美军可以根据恐怖分子行为的恐怖程度，继续承担相应的追踪恐怖分子巢穴的责任，还可以做其他事情。一旦你有了这部分军队，那么其他问题就会相继而来。你需要基地、给养以及部队运转的方式。兹比格，你对我们与这个新的伊拉克保持持久的关系有何想法？你有什么设想？

布热津斯基：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它可以在美国更明确地表明其撤军决心的大背景下更富建设性地进行探讨。在那个大背景下，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安排，首先是与伊拉克人自己，在伊拉克的某个更偏远的地方，有某种意义上的美国驻军。美国军队长期驻扎库尔德斯坦，会有一些作用，这可以稳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以及伊朗人之间的关系，否则这种关系极易产生冲突。

但那与政府现在正在讨论的内容并不一致，政府自身将我们在伊拉克的

驻军与当年在韩国的驻军相比较，政府没有考虑到，韩国人视我们为保卫他们的力量，而且韩国几十年来都受到朝鲜的威胁。大多数伊拉克人却不认为我们是受邀而来的，而且，我感觉到，他们不希望我们无限期地留在那里，而我们在巴格达中部正在兴建的大型军事工事，以及遍布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基地，却都在强化我们的军事存在。

所以，是的，有些军事力量留下来，但不会是很大规模，这取决于我们与伊拉克人的谈判，也许还取决于与科威特的某种安排，这样美军可以在科威特需要时随时驰援。也许还有与约旦的安排，尽管约旦人很可能并不乐意。当然，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在海湾地区存在下去，这种存在通过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协议安排而得到强化。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怎样看待我们的长期角色？

斯考克罗夫特：我觉得，将剩余军队撤到伊拉克境内的某些地区，听起来像是一种永久的军事存在，我想，我们不应作任何这方面的暗示。伊拉克军队作为团结的象征，可以让什叶派和逊尼派肩并肩战斗，他们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就是这样的，还可以而且必然促使伊拉克民族主义得以强化。

美国下一任总统在军事上有两大任务。一是控制暴力水平，伊拉克军队目前还不能单独完成此项任务。我们正在训练他们。他们正在进步。二是，伊拉克军队现在完全依赖我们为其提供后勤和运转保障。他们有战斗单位，但我们为这些战斗单位提供一切：运输、供应、情报，所有的一切。我们需要发展伊拉克军队在这些领域内的能力。我不知道那会有多久。但那正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是否逐步减少？当然是的。

我反对任何永久的军事存在，即使是在中东和伊拉克的一个出于安全考虑的军事基地。我认为那很不利，兹比格刚才已经提及原因。但我认为，我们只有在我们认为伊拉克能够自我管理的时候，才能真正脱身。

▶▶▶

伊格纳休斯：让我抛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不是关于新总统的，而是关于

即将卸任的这位总统。假设在小布什总统即将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的最后一天，他把你叫进去，说："我只想在我离开之前，与你一起参观这个地方。你在战争之前写道，我不应该这样做，攻击萨达姆是一个错误。现在，我将要离开，我想知道你怎么想。你认为它有希望？或者它仍是一个错误？"那么，布兰特，这时你会如何回答小布什总统的这个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我想我会说："总统先生，那是历史学家的问题。它与现在的形势无关。我们现在深深地陷在伊拉克，我们的注意力必须放在如何处理我们的军事存在上来，我们的处理方式，必须让伊拉克成为一支地区稳定的力量，而不是不稳定的力量。"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假如小布什总统将你叫过去，尽管你一直在批评这场战争，但他仍然可能问你，增兵是否让局势更有利一些，是否这样我们就更能争取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结局。你会怎样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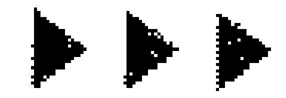
布热津斯基：我会回答说，我同意增兵多少会创造出一些更有利的条件。但这些条件是否持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应当利用它来达到结束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目标。因为我们的驻伊美军正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不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我还会说，这取决于我拜访总统的日期。

斯考克罗夫特：那是他在白宫的最后一天。

布热津斯基：确实是最后一天吗？

斯考克罗夫特：所以你没法谈论未来。

布热津斯基：好吧，那我就不会说："总统先生，你曾许诺在离开白宫之前达成以巴协议，可你的诺言呢？"而且，如果那真的是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我还能够说："非常感谢你，总统先生，谢谢你没在伊朗再打一场战争。"



伊格纳休斯：当下一任总统就任并思考伊拉克怎么办的问题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将是有关伊朗决策的后果。伊朗是该地区内正在崛起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从美国入侵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的行动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当然这一点尚有争议。2006年我在伊朗作过几个星期的报道，当时我不断地从伊朗人那里听到下面这一番话："我们是一个大国，而且正在崛起。现在是我们的时刻。我们正在上升，而美国人正在衰落。我们想被承认为大国，以符合我们的地位。"说这番话的人，不仅有支持伊朗的强硬政权的人，而且也有痛恨现政权和总统内贾德的人。

所以我想问你们，我们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崛起中的伊朗。这个国家会说："这是我们的时刻，与我们打交道。"布兰特，你对美国如何与伊朗交往这样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怎么看呢？

斯考克罗夫特：伊朗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处理恐怖主义、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伊朗东西两边的敌人都给扫清了。所以伊朗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时刻到来了"，这也许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感觉。伊朗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与之有过反差极大的双边关系。在"沙"（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译者注）统治期间，伊朗是我们地区稳定的堡垒。当我们代替英国人成为该地区的外部力量时，我们曾指望"沙"能够维持稳定。可他倒台后，我们的使馆被占领，我们和伊朗人之间形成一种本能的厌恶。我们曾经有过非常不同寻常的关系。

对我而言，我们对待伊朗问题非常感情化。如果我们克服自己的感情，我认为我们能够很好地与伊朗人相处，首先，要与他们对话。我们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从过去不让任何人与伊朗对话，转而亲自与伊朗对话，但对话内容仅限于伊拉克，而不是更广泛的地区形势。

事实是，伊朗处在一个危险的地区之中。它是一个什叶派国家，周围却

是逊尼派国家。它是一个波斯国家，整个地区却总体上是阿拉伯人的天下。我们需要主动与伊朗进行有关地区框架的战略对话，这将使伊朗感到安全，而无须寻求核武器。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没几个美国人曾经经历过你所经历过的伊朗革命动荡。你在伊朗革命时期恰好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你经历了整个可怕的美国使馆被占领事件和人质危机。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怎么看待这些战略事件？

布热津斯基：好，我的出发点多少与布兰特的结论有点相似。没有理由维持孤立伊朗的政策，也没有理由要求伊朗人必须作出重大让步，才能到谈判桌上与我们平起平坐。这种政策注定要失败，政策本身引发了现存的各种难题。

伊格纳休斯：所以你认为小布什政府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并将其作为进入谈判的条件完全是错误的？

布热津斯基：有两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他们停止核计划才能进行谈判，那么我们必须给出某种回报，因为至少根据国际法和《核不扩散条约》，他们都有权利拥有浓缩铀。如果要他们放弃这项权利，我们就应当准备好，用中止某些我们加在伊朗身上的痛苦制裁作为回报。然后，我们才能获得回报。

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提出我们会无条件谈判，这意味着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但我们仍会继续谈判，除非由于谈判毫无进展或者出现某种意料之外的进展，我们中的任何一方脱离谈判。导致目前这种极为不利的僵局的原因，正是我们过于坚持先决条件。要么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要么互相都同意，将中止铀浓缩活动与中止制裁加以对等。

戴维，我还想就你刚才提出的伊朗人对于自己的地区角色的看法，再多说几句。这种看法的绝大部分都是自我幻想。伊朗根本没有那么强大。它是

一个有着无数国内问题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它非常自闭；这个国家里的青年的绝大多数，都对狂热的宗教领导层感到极度不满；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妇女，将土耳其或欧洲作为未来的榜样，觉得目前对《古兰经》的解释毫无前途。

因此，一旦伊朗人感到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不再对他们进行包围的时候，这个国家将会遇到严重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我们放松对伊朗的包围，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那样不仅将出现官方对话，而且也会激起伊朗国内更多的促变呼声。

最后一点，但绝非不重要，虽然伊朗看上去比其邻国要强大一些，但它有非常严重的国内民族问题。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伊朗大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阿泽里人。阿泽里人已经被相对成功地融入了伊朗体系之中。但这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现在，一个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正开始变得富有，并且日益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巴库一杰伊汗石油管道的铺设，使阿塞拜疆与美国人签约，向欧洲人输油，然后再聪明地将石油收入用于国家重建和现代化。

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阿泽里人都会将眼光向北看。时候一到，他们会开始询问："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成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东面的俾路支，已经出现了一些骚乱，邻近伊拉克的地区，还有些残留的阿拉伯人，所以，伊朗自身有许多需要应付的软肋。

因此，那种自信而富有领导力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在中东扮演帝国角色的伊朗形象，未免有些夸大。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风险。但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到，现实要复杂得多，不要忘记伊朗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小段时期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我们能够推翻塔利班政权，伊朗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伊格纳休斯：你提出了什么是外交政策中的最大诱惑的问题。那么，伊朗的这些民族矛盾有没有可能被美国所利用？

布热津斯基：哦，我没有提这样的问题。

伊格纳休斯：美国是不是能通过秘密行动加以利用？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毫无疑问，美国，还有以色列，都有相当多的研究机构在非常仔细地研究伊朗，想要计算出伊朗的哪些弱点可以被利用，如何将伊朗弄得一团糟。我自己的观点是，混乱的中东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如果爆发历史性的持续百年的对抗"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战争，那很可能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就会演化成第四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差点儿引发出第三次世界大战。——译者注）。除非在极端情况之下，否则永远不应把制造混乱当作一种政策来执行。而且，世界非常依赖中东的能源，所以这个地区的混乱极度危险，它将带来难以预测的极度毁灭性的后果。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认为伊朗内部有民族牌可打吗？你认为打民族牌是否明智？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应当尽量鼓励伊朗自由化。伊朗人民的选举模式表明，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权。他们不喜欢现在的这个政权。内贾德是个利用民族主义吸引选民的大师，而我们则在外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伊朗人推到了内贾德怀里。我们反倒使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我们应当更加致力于对话，向伊朗国内更自由的动向献花，并期待激进主义者们的转变。

伊格纳休斯：让我设想美伊关系最黑暗的未来。伊朗是一个革命国家，仍然处在其革命的白热化阶段。我们仍然在等待它自我毁灭，但这却没有发生。就像革命的法国和后革命时期的拿破仑时代，它会继续推动扩张，直到被阻止。拿破仑最终被阻止，是因为他过度扩张侵略了俄罗斯。而拿破仑1812年的失败，使得一系列条约与和平会议成为可能，最终以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作为终结，这些安排可以说使欧洲至少稳定了100年。

但伊朗并没有被阻止，而是相反。它向外推进的每一个方向，似乎都取

得了成功。在黎巴嫩，它通过真主党布置力量。在巴勒斯坦，则通过哈马斯。它越来越成为伊拉克的主导力量。革命的伊朗正在推进，形成持续威胁。如果你看得更黑暗一点，你甚至可以说，伊朗正在持续推进的这一过程，按照该地区许多人的说法，只有在美伊进行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会被阻止。

我想问你们，怎么看这个历史问题，告诉我你们认为伊朗会继续成为一个革命国家吗？我们是否需要在某个时间点上采取军事行动去遏制它？兹比格？我知道，你是历史系出身。

布热津斯基：哦，我一直听着你说，戴维，我有点儿疑惑，我究竟是赞同你所说的法国呢，还是赞同你所说的伊朗？因为我认为，你不可能在关于这个国家的论断上同时正确。你关于法国的分析，我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是准确的。但我没有看出来这与伊朗有什么可比性。伊朗正在做的事情，会与拿破仑扩张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意大利，踏平普鲁士和奥地利，最终挥鞭莫斯科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完全没有。哪里有这样一个气势汹汹又如此高效的伊朗呢？难道在加沙？在真主党？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谈一谈。伊朗怎么会进入加沙？部分原因在于加沙的现有情况。

伊朗支持哈马斯，并提供资金，但哈马斯的兴起，是由于加沙的现有情况，而不是因为拿破仑式的扩张。

提到黎巴嫩真主党，你能想象，如果没有以色列的第一次入侵，真主党会存在吗？黎巴嫩人在侵略面前无能为力，但什叶派不是这样，他们组织成真主党，开始更有效率地抵抗入侵。上一场战争谁获益？一开始，真主党蛮横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然后以色列通过大规模轰炸黎巴嫩平民作为回应，这反倒增强了真主党的力量。

那并不是什么伊朗的征服，所以，拿革命的拿破仑法国作类比站不住脚。伊朗获得进一步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但伊朗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内部非常虚弱，伊朗人越来越不满，美国的过度威胁和有时令人抓狂的宣言反而会帮助伊朗人团结对外。上个星期，总统公开说："伊朗宣称，它想拥有核弹并用它来杀戮人民。"可伊朗人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类似这

样的总统声明，才会增强伊朗的内部凝聚力，使得伊朗在其反美邻国的心目中更有魅力。

伊朗的毛拉（穆斯林的宗教和圣法教师。——译者注）精英正在丧失阵地。它无法处理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也无法应对日益离心的年轻人，而年轻人则向往西方。所以，我并不觉得两者有可比性。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我认为伊朗是个革命国家，想毒化美国，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疯狂了？

斯考克罗夫特：我宁愿不去将其和法国大革命作类比。在意识形态上，两者有一些相似性。

布热津斯基：与其相似的，不是法国大革命。

斯考克罗夫特：嗯，是的。法国大革命向全欧洲传播了民主。

布热津斯基：可那并不是不可忍受的狂热主义。

斯考克罗夫特：但我认为，首先，那正是巴勒斯坦和平进程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你能成功完成和平进程，你至少能够部分击败真主党。还有哈马斯。

阿拉伯人如此害怕这个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新月地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要抛弃他们。逊尼派总是害怕什叶派的兴起。但在大部分国家，他们是无法忽视的少数派。我认为，正如兹比格所说，伊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魅力去领导一场起义。但如果这个地区出现混乱，这也非常有可能，那么伊朗肯定会浑水摸鱼。以巴协议可以改变这个地区的心理状态，能够迫使伊朗处于守势。

布热津斯基：让我加一点注脚，这个注脚将进一步凸显伊朗和法国的不

同。拿破仑的法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它在15年的时间内击败所有的帝国力量。而我们能够摧毁伊朗的军队，很可能都不会损失一兵一卒。我们可以摧毁他们宣称拥有的核武器库和核工业，杀死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而他们能在军事上对我们回击的力量几乎没有。但他们确实会利用该地区混乱的局势。那对我们极为不利。

伊格纳休斯：他们可能会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布热津斯基：非直接地。

伊格纳休斯：在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都造成破坏。

斯考克罗夫特：采取颠覆手段。

布热津斯基：是的，完全正确。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弱点也是他们的强项。

伊格纳休斯：那如果类比毛泽东晚期的革命中国呢？你当然可以说，那只是四人帮，江青和红卫兵们的狂热，他们自取灭亡，唤醒了一代中国人的理性，最终导致邓小平掌权，随后有了一个极度务实的中国领导层。有些人看到伊朗的今天，会有些古怪地认为，也许内贾德今天的疯狂，会酝酿出我们最需要的那一刻。

布热津斯基：这有点儿道理。但也有很重要的不同。有道理在于，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带来如此多的苦难，这使得人们对于邓小平的所作所为非常欢迎。伊朗却不一样。我认为，伊朗人已经为这样一种变化作好了准备。但这也是因特网的功能，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大量联系，特别是与土耳其的联系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某种后毛拉政权的兴起是一种社会趋势，除非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自美国的威胁导致

这种趋势停顿，否则美国的所作所为只能帮助毛拉将狂热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斯考克罗夫特：我持不同意见。我认为伊朗政权不是一个革命政权，伊朗真正的革命在于人民想要更多的开放。那些保守主义者，那些毛拉们，则想倒退。内贾德只是一个三级官员。革命的力量倾向于开放，而我们却在帮助保守势力。

布热津斯基：况且伊朗政权本身也并不是那么专制。我宁愿生活在伊朗而不愿生活在俄罗斯，尽管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

伊格纳休斯：哈，我愿意在伊朗做一名美国记者，因为这样我才不会担心我哪一天就被击毙了。

所以下一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当他 2009 年 2 月，在他上任数星期后，坐在你们曾经坐过的位置上，说："布兰特，兹比格，我要去德黑兰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今晚我将乘坐一架没有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明天我将在德黑兰着陆，开始与伊朗进行秘密对话，希望能与之探讨相互接触的可能性，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建议。"

那么，你们会说些什么？你们会告诉他"哦，那是个疯狂的想法，别这么做"吗？或者如果你们认为这个想法合理可行，你们认为他的日程应当如何安排？兹比格？

布热津斯基：你知道，首先我想对他说："是的，去吧，但是不要秘密前往。那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除非你事先确定知道，你与对方有共同利益，那么才能秘密前往。布兰特曾秘密前往中国，但他事先知道中国人对这场谈话感兴趣。而如果我们突然之间秘密前往伊朗谈判，我们却对将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他们可能同意接待你，但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如果谈话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么富有成果时，他们可能会决定利用当前的局势。所以，公开前往。谈话本身无可指摘。

伊格纳休斯：但他们可能不会公开地见你。

布热津斯基：那么就别去。如果他们不想谈，去就没有意义。

伊格纳休斯：他们可能想谈，但不愿意公开地谈。

布热津斯基：如果他们真有诚意谈判的话，那么就通过第三方谈，不要飞到德黑兰，而是到德黑兰以外的地方去谈。我从伊朗人那里学到一点，就是他们非常善于使用技巧，但他们又是非常迂回的谈判者。在任何特定时刻，你都必须准确确定你自己的地位与形势。

所以我会对一名可能的继任人说，如果你去进行高层谈判，如果你打算代表总统与伊朗人谈判，你就必须确定他们已经准备好对话，然后公开地去谈。没人会指望一场对话就奇迹般地改变一切。但我认为，那会是一次好的开始。

还有布兰特和我提到过的问题，也要被提出来。我们如何以一种严正的态度去谈核问题？我们如何处理地区安全，尤其是伊拉克问题？他们曾经在阿富汗问题上帮助很大，现在他们如何才能帮助我们实现在阿富汗的目标？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会对这位急着要登机的继任人说些什么呢？

斯考克罗夫特：我对于秘密谈判，倒没有那么反感。但我不会在德黑兰进行此类谈判。我会选择一个中立地区。我对伊朗的国内局势非常敏感，与美国人谈判可能会被伊朗内部视作可能的叛国罪。我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会去与谁谈判，因为伊朗的政治局势相当复杂难测。很难知道你真正面对的谈判对手是谁，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是谁。

布热津斯基：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他去与内贾德谈判，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是更高一级的人物。

伊格纳休斯：最高领袖身边的人。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

布热津斯基：是的。

伊格纳休斯：而你的谈判要点也与兹比格的类似吗？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回到老布什执政时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人士，说伊朗要开始谈判了。某一次我就说："好吧，我们可以谈，我们安安静静地见一次面。"我们真的开始安排会面，我相信将会是在瑞士，可他们打了退堂鼓。我想，他们退出，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与美国人谈判而导致的内部压力。

伊格纳休斯：你知道你会与谁对话吗？

斯考克罗夫特：不知道。那是内贾德上台之前很久的事，甚至在哈塔米（Khatami，伊朗前总统。——译者注）之前。

布热津斯基：可那正是你在事前必须知道的事。这正是为什么里根时期著名行动的效果如此之差的原因，他并不知道他的对话人是谁。

斯考克罗夫特：我与前伊朗大使会面。我们一起吃早饭，一起聊天，他说了很多有趣的事。于是我说："你为谁服务？我知道你向谁报告。但我要知道，你为谁服务？"他则给出一长串的回答，说他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说他们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发言权，等等。但在任何谈话中，你都很难搞清楚你究竟是与谁打交道。

布热津斯基：你必须了解你与之打交道的这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是伊朗，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已经提到过，它有令人骄傲的历史，以及其他方面。但还得提一点。如果你看一下各国数据，再比较一下伊朗和土耳其，在教育水平、妇女受教育的程度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美国人认为伊朗妇女完全是受压迫的，那不是事实。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那不是事实。

布热津斯基：伊朗现在有一位女副总统。我敢打赌知道这一事实的美国人不超过10%。伊朗妇女成为律师、医生和议员。伊朗的政治体系当然在任何方面都不能算是民主，但它却比许多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民主得多。它的选举仍然是竞争性的。

伊朗人对未来的期望，来自他们对土耳其和欧洲的观察。很多伊朗人以旅游者的身份出行，主要是到土耳其，有时也会更远。所以，我们正与一个很像土耳其并且越来越像土耳其的国家打交道，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聪明小心地与之打交道。伊斯兰国家的成功现代化，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它们在文化上还是伊斯兰的，但应当用与现在伊朗的毛拉或者类似的人所说教的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其伊斯兰信仰。

伊格纳休斯：事实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在某些特定方面能够略有克制，那么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正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大国伊朗，就是我们的天然盟友。

布热津斯基：也是以色列的盟友。别忘了以色列和伊朗曾经有过非常广泛的接触，有过几十年，后来它们的关系才破裂。

斯考克罗夫特：事实上，两伊战争时，我们与以色列的关系曾经有点儿僵，因为他们给伊朗输送军事装备。

布热津斯基： 没有我们的允许。

斯考克罗夫特： 飞机零部件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是的。

布热津斯基： 看得更远一点，你必须认识到，在某些方面，以色列和伊朗是天然的盟友。在这个地区内，如果我的邻居是我的敌人，那么我的邻居的邻居就是我的朋友。那其实就是伊朗国王被推翻之前的形势。即使是今天，在德黑兰也有大量犹太人聚居的社区，其生存和运作环境相对来说还算正常合理。伊朗也有富有的身居显位的犹太人。除了最近内贾德的所作所为之外，伊朗并没有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反犹主义的影响。

伊格纳休斯： 作为一名记者，我能够顺利地与伊朗官员谈话。他们曾明确表达出对你们二位刚才描述过的那种对话的兴趣，也许这种对话能够找到两个国家可以探讨的共同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伊拉克。我认为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去做的事情。伊朗有一个派别对这种对话特别感兴趣。我认为，你们二位可能都会对下一届政府说："这里面有内容，值得跟进。"

斯考克罗夫特： 我认为这正是伊朗应当选择的正确的战略路线。现在，我们已经与伊朗有核计划之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如果伊朗不受限制地发展其核武器能力，那么我们就会站在核武器扩散的边缘。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我更愿意通过战略途径尝试解决，而不会将之作为更广泛的对话的前提。

伊格纳休斯： 你不会把核问题上的进展作为战略对话的前提条件。

布热津斯基： 那是更大范围的讨论的一部分。

伊格纳休斯： 好，那么新总统将在 1 月就职，他会转向你们二位，然后说："我打算向伊朗派出联合特使，传递新政府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两党

的政策已经统一。但我不太确定该在我的公报中写点什么。”布兰特，你和兹比格都得写下你们要向德黑兰带去的信息。你会说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有好多事情要考虑，比如你会和谁谈话？但主要是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很清楚你们生存在一个危险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安全是你们的利益所在，你们也有合法的安全需求，所以我们准备就地区安全框架与你们进行讨论。第二，无论你们是否想拥有核武器，你们都在走一条在心理上令整个地区陷入不安的路线。这很危险，会带来反作用。让我们一起建构地区安全框架。你们不需要核武器。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会加点什么呢？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布兰特已经说得很好了。我只加一点。因为你们一直说你们并不想拥有核武器，你们并没有想走核武器之路，请帮助我们相信这一论点。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

布热津斯基：而且我们能够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一起坐下来，弄清楚一些机制，在什么地方画线，才能让你们实现你们说过想要实现的目标，也就是和平的核计划，而同时我们也能实现我们需要的目标，也就是你们的核计划不要越界，要实现一种真正的安全感。

伊格纳休斯：让我们来谈谈伊朗核问题。美国及其盟友作出艰难的集体安全努力，出台了三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谴责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认为伊朗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这些努力一点儿都没奏效。伊朗人继续在核计划上向前推进。

我认为，我们的盟友们都将其视作威胁。所以，让我问一问你们，美国应当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布兰特，思考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 努力无法奏效，部分原因在于六个主要的国家不团结，也就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我认为这六国中的每一个都不希望伊朗继续铀浓缩计划。但因为美国是个坏警察，其他每一个国家都会认为，他们可能会成为好警察。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会认为："我们不想让他们搞核武器。但美国人会处理那件事。同时，我们仍然能够继续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与他们进行交易，还能获得他们的石油。"我认为，我们需要运用更多的技巧给其他五国加压。至今俄罗斯人都十分小心。他们没有越界。他们向布什尔核电站提供铀燃料。但那只是租借，他们会在燃烧后收回。所以，他们一直非常小心。

但我们必须向伊朗展示出绝对坚定的国际阵营。即使伊朗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则，《核不扩散条约》仍无法阻止他们进行铀浓缩活动，但是，无论是伊朗，还是其他国家做这样一件事，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更大的计划，我认为，由联合国开始讨论对铀浓缩活动进行规范，是应当做的事情。伊朗很可能不愿意面对一个真正团结的阵营，而现在的问题是，恰恰没有这样一个团结的阵营。

伊格纳休斯： 目前已经算很团结了。我们有三个安理会决议，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投了赞成票。兹比格，有不同的路线可走吗？我们与盟友已经实现了团结，我们正在走这条路线，但它却无法奏效。有其他可选项吗？

布热津斯基： 有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美国不能只是一名看客，怂恿别人去做，自己却拒绝参加游戏。我们一直对伊朗人说："如果你们作出重大让步参与游戏，我们就会谈判。"我们必须愿意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要么无条件地去谈，要么相互各让一步。

我们与朝鲜的长期谈判虽然痛苦艰难，但我们做得相当好。想一想朝鲜的立场。他们的三部曲就是："我们想拥有核武器。我们正在研发核武器。我们有了核武器。"而伊朗的立场却有根本性的不同："我们没有研发核武器。我们并不想拥有核武器。我们的宗教不允许我们拥有核武器。"

他们可能是说一套做一套，但对于我们来讲，这种立场要比朝鲜好。它使我们能够面对伊朗人，并且说："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并没有研制核武器，你们并不想拥有核武器，你们的宗教不允许你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只是有点儿怀疑你们可能在撒谎。所以，让我们坐下来，讨论你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确信。让我们一起努力，作出一些安排。在这种安排下，你们推进全面核计划以及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权利会得到尊重，而你们做的同时，又能够给予美国你们不会偏离铀浓缩活动而去发展核武器的某种安全保障，因为我们确实记得几年前，你们真的让我们嗅出了某种秘密核武器的味道，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无意冒犯，但让我们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当然，我描述这个过程时，用的是过于简化的手法，但这就应当是我们的方式。

最后一点，我认为，暗示使用武力对于我们的谈判立场一点儿帮助都没有。首先，我认为，使用武力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会极大地增大我们在该地区的困难。其次，我认为，它让这个政权更容易动员伊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对抗我们的联合阵线，这反而使他们站稳脚跟。

伊格纳休斯： 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 这不仅仅是一个伊朗问题，还是一个核问题。假设伊朗人让我们相信他们是和平的。如果他们被允许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我们会估计，埃及、沙特、土耳其全都会想要浓缩铀。很快，你就会看到一片浓缩铀计划出台，它们并非全都想要制造核武器，而是想离制造核武器仅一步之遥，这样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制造。那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在关键时刻盯住伊朗。任何允许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的举动，对于无核国家而言，都具有致命的危险性。

伊格纳休斯： 有任何允许他们进行铀浓缩活动的举动吗？甚至在《核不扩散条约》的约束下？

斯考克罗夫特： 嗯，他们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他们并没有完全掌握铀浓

缩技术。一旦他们成功了，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核查人员踢出门外。

布热津斯基：不仅仅是有核查人员。我想，我们可以维持某种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提炼浓缩铀的设备能够被控制在某些参数范围内运行，这些参数将约束该国核计划的整体规模。

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任何情况下，不准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你就可以预测伊朗人的反应，嗯，我估计他们会说，那就没什么可谈判的了，因为你想要剥夺我们的权利。

斯考克罗夫特：但是，这正是为什么我说它不仅仅是伊朗问题的原因。

布热津斯基：是的，它不仅仅是伊朗问题，还是一个国际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说："我们这些核大国，鼓励核能的使用。我们想要支持核能。要想这样做，我们准备以比你们国家自己生产浓缩铀的成本更低的价格，向你们提供浓缩铀。我们愿意在其燃烧后销毁它。我们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程控制，这样如果我们不喜欢你们的行为，美国就能随时切断供应。"

布热津斯基：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

斯考克罗夫特：所有其他国家。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需要追踪伊朗的核计划，但是需要有一个国际机制的大环境，这个环境会鼓励各国使用核能，但不允许有浓缩铀的威胁。

伊格纳休斯：俄罗斯人。

布热津斯基：而且，我们必须主动传达出一种信息，那就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我们与伊朗人一起共同解决，我们并不想强加于他

们，因为那根本行不通。

斯考克罗夫特：没错，是这样的。

伊格纳休斯：假设所有这些好想法都没能实现，而伊朗人做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他们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而且开始像中央情报局所说的那样重新进行2003年曾经搁置的武器化进程。假如他们真的像朝鲜那样进行一场核试验。

问题在于，我们最终全都必须与此作斗争：美国能够与一个有核国家伊朗共存吗？那样的局面可以忍受吗？其他我们不希望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比如说巴基斯坦和朝鲜，已经有了核武器，而我们也与其和平共处。为什么伊朗不一样呢？我们是否应当将伊朗放在不同的类别中？是否应将其列入不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布热津斯基：嗯，首先，我们已经与一个声称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朝鲜共存，它已经测试了一个类似核武器的东西，作为其核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去轰炸朝鲜。我们能够继续就此事进行谈判，而谈判很可能能够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个教训。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我认为人们就应当根据对其政权性质、内部凝聚力、国家稳定性、相对理智性的综合评估，来作出一项判断。这样一个政权，一个有6 000年历史的国家，真的有可能放弃自己的国家权力，却将核武器交给某个恐怖主义组织吗？它会在核计划初期，在它自己根本不具备防御核打击能力的时候这样做吗？

为什么我必须以某种非理性计算为依据来作出判断呢？我们不能排除使用武力。但武力在面对可预测的并非臆想的威胁时，大体上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同时，我还要避免因为重复不断的威胁来毒害谈判进程，这样的武力威胁也会鼓励其他国家行为体，要么会更愿意使用武力，要么会通过使用武力使加在我们头上的政治压力最大化。

伊格纳休斯：但直奔问题的核心——布兰特，我们能与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共存吗？或者我们应当打一仗以阻止其拥有核武器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及伊朗如何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要比引发核扩散热潮的后果小得多。那是国际政治的必然规律，当然这个地区也不例外。伊朗的核弹不会得到土耳其、沙特、埃及的默许，甚至恐怕连阿联酋都不会同意。

拿伊朗与朝鲜作比较是错误的。因为朝鲜独一无二，这种独特性源自于周边国家。伊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但如果用武力来阻止伊朗的话，你必须看一看后果。该地区已经出现了一种怀疑，认为美国是反穆斯林的。一场袭击，即使只针对伊朗的核设施，也会在该地区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它将使我们在该地区的问题极大地复杂化。

布热津斯基：对伊朗的袭击将形成一种局面，似乎美国被牵扯到一场跨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而且越来越热衷于进入巴基斯坦的战争中去，下一步还会挺进波斯湾。这种局面对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于我们使用力量的能力、对于世界经济、对于民众感情、对于伊斯兰世界，也许对于大部分针对美国的全球观点而言，总体上都会是灾难性的，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这样的袭击——最极端的情况。

斯考克罗夫特：对我而言，形势需要娴熟、灵巧和谨慎的外交，能够照顾到复杂局势中的方方面面。我认为，我们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退缩，不能指望别人来给予我们，而我们只坐享清福。我们必须准备好将我们的利益放在谈判桌上，寻找我们非常渴望的解决方案。

布热津斯基：寻找这样的方案，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 第三章

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戴维·伊格纳休斯：让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在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集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阿以争端。我们正处于又一个和平进程——安纳波利斯进程的后期阶段。现在，它又停滞了。

你们二位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有经验。兹比格，你帮助卡特总统实现了第一个重大突破，戴维营协议成为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和平条约。布兰特，你是马德里和平进程的核心角色，最终以色列和约旦达成和平条约。你们二位在当时，都不仅仅是实践家，更是成功的实践家。我想请你们回溯既往，看一看自你们离开白宫后发生的一切。当你们看到国务卿赖斯处理安纳波利斯和平计划时，兹比格，你怎么想？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我再次强化了原先的直觉，以巴之间的问题实在是太深、太大、太感情化、太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靠他们自己去解决。

我对以巴谈判实现和平的前景非常悲观，尽管这类谈判有其独立性与延续性。我在戴维营的经验，以及对你们的观察，布兰特，你们在台上时的所作所为，让我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只有美国能有效地穿梭其间。对我而言，它意味着两件事。一是美国不想成为冲突的任何一方，不想拉一个打一个，而且，美国不想只担当被动角色，而是要就什么事情需要发生，提出并不断推进美国自己的观点。在推进这些观点时要清楚明确，尽量做到公正公平，尊重各方利益，但同时，在讲明立场以及坚持目标方面绝不能羞羞答答。

伊格纳休斯： 兹比格，以色列人若听说美国人这样想，他们可能会害怕我们将和平强加于他们。你说这是“太大、太难、太危险，以致当事双方不能自己解决”，这意味着某种外来的协议强加于他们。可能那就是我们该做的。

布热津斯基： 嗯，你知道，你总能挑出你想要的词。“强加”一词，表示你强迫他们说你的话。而我用“帮助”这个词，因为我认为，双方都没有作好准备，作出我们需要他们作出的让步，双方都不愿意走出第一步，因为谁都怕另一方会浑水摸鱼。

所以你必须有人准备好向前一步，将解决方案做得完美，并且真的准备去这样做。在第一次戴维营谈判中，所有的谈判都基于由美国方面精心准备的详尽文件，里面列出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总统十分清楚这些内容，他非常坚定地要达到其谈判目标，他引导着谈判双方一步步往前走。

如果我今天想要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愿意公开列出至少整个协议的主要决定因素，然后说：“其他内容取决于你们，因为你们要就细节进行谈判。”

这四个决定因素是，第一，巴勒斯坦人没有回归以色列的权利，这对巴勒斯坦而言是一剂苦药，非常苦的药。人们必须理解这一大剂量的苦药的含义，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整个身份的含义，是建立在他们被不公正地驱逐出了以色列的命题基础之上的。

第二，真正分享耶路撒冷，这是给以色列的一剂苦药。如果金顶清真寺、旧城区的一部分和东耶路撒冷，不能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的话，那么和平就不可能存活，就不可能被视为合法。和解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是1967年的边界，双方都需要调整，允许另一边的大量城镇居民点并入以色列，相应地，以色列则出让加利利和内盖夫的相应土地，这样，巴勒斯坦人就不会有土地损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差不多相等。不久之后，巴勒斯坦人就会有更多。以色列人已经占有旧巴勒斯坦面积的78%，而巴勒斯坦人只有22%。

第四，要有一个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我最近提议我们甚至可以让美国军队驻扎在约旦河沿岸以便让以色列提供一种防范任何威胁的战略纵深感。

和平协议的其余部分，就要靠当事双方来解决了，这一点美国也必须坚持。我倾向于相信，小布什总统至今还不愿意施展必要的压力。如果他做不到，那么下一任总统应当做到。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经常与国务卿赖斯讨论关于如何处理以巴问题的话题。告诉我们，你在老布什任期中所作的和平努力，对今天的局势有什么启发？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我不太清楚他们现在进展到了哪一步，部分原因在于，局势有所变化。我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开始了和平进程。战争之前，萨达姆想要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谈判筹码。他想要一场整个地区参与的谈判，但我们说："不行。我们首先要处理你入侵科威特的问题。"

然后我们告诉阿拉伯世界："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一起做，然后我们会开始和平进程。"我想，我们向阿拉伯世界传达了足够的信心，表明我们不偏不倚，我们愿意在一场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中承担责任。整个过程非常困难，但是为马德里进程打下了基础。在马德里，双方第一次正式坐下来说："我们需要努力完成和平进程。"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和老布什总统对以色列挺严厉的。因为你们在以色列定居点和住房问题上很生气，所以你们收回了美国给以色列政府的贷款承诺。你认为，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究竟有多重要，甚至重要到我们需要从盟友那里把钱收回来以显示公平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并不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后来没有发生。

布热津斯基：自那以后再没发生过。

斯考克罗夫特：在过去 60 年内并不经常发生。事实上，我们继续向约旦

河西岸定居点提供贷款保证，这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不知道它是否对以色列产生了影响。

布热津斯基：我想对以色列是有影响的，因为在那之后，沙米尔下台了。拉宾掌权，之后就是整个占领历史上定居点建设最不活跃的一段时期，直到拉宾遇刺。

斯考克罗夫特：你知道，拉宾所带来的整个变化是一个有趣的案例。我见到拉宾的时候，他还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当时与任何强硬派的态度一样，非常强硬。而在担任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军队领袖等所有职务的过程中，他成熟起来了，直到最后他成为总理，他有远大的理想，如果他活着，和平协议就一定能达成。这是一种巨大的演变。

以色列本身也在发生同样的演变，从1948年建国的那天开始，到1967年战争之后，当他们准备支持大以色列概念的时期，如今则又回到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布热津斯基：让我补充一点。当我第一次会见梅纳赫姆·贝京总理的时候，他直接对我说："根本没有巴勒斯坦国。那是幻想。根本没有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全是阿拉伯人。约旦河的那一边是他们天然的家。"这就是"天赐以色列"的概念。

20年后，沙龙接受了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当然，他在领土问题上较为模糊，但他基本上接受了一个位于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这里面有教训。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对话，即使极端的政党也会参与进来。我说这话时，想到的正是哈马斯。哈马斯并不准备接受以色列，但它准备接受一个10年停战协议。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摆平哈马斯，它们就会最终像法塔赫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温和。

伊格纳休斯：让我向你们二位问一个可能困扰下一任总统的问题，那就是美国是否应当鼓励与哈马斯接触和谈判。哈马斯是个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

存权的组织，以色列感到这个组织就是想要以色列国毁灭。但是，毫无疑问，哈马斯已经在加沙深深扎根。以色列摧毁它的军事企图都失败了，有各种理由相信这样的企图今后还会失败。那么，我们应当与这样一个组织接触，并努力将它纳入和平进程中来吗?

斯考克罗夫特：当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首次接触全盘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不能与法塔赫对话，因为它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我们必须通过摩洛哥或其他国家去与它们沟通。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我认为，我们需要准备好与哈马斯对话。哈马斯已经建议停火。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如果我们不与之对话，我们就永远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和平进程中取得进展，当然在这方面，我与兹比格一样悲观。但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进展，哈马斯将会认为，它若被排除在外，那么它最多只能去控制加沙，它不可能自我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代价过于高昂。我想，它们号召停火，这可能是战术性的，而不是真的渴望停火。但我相信，关上与哈马斯的谈话之门，只会让哈马斯更强大，这反而会削弱法塔赫。

布热津斯基：在政治层面上，我完全同意布兰特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抛弃道德层面上的考虑。在道德层面上，不与哈马斯对话，意味着对它们进行封锁，意味着切断一切，意味着惩罚 150 万民众，那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困境：疾病、饥饿、分裂。我认为这将非常麻烦。我认为，除非你在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否则这绝不是一种良好的谈判方式。

如果我们与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我们无疑必须准备好向该国人口增加某种困难。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样做过。但 150 万住在加沙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我们对于这一点，多少有点儿漠视，我觉得甚至不仅是道德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已经有些麻烦了。我们对于这一点的漠视，使得中东产生了一种仇美情绪。这种情绪，我们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在中东有重要的利益。但我们却在创造越来越深的仇美情绪。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将自食其果。

伊格纳休斯：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可能会想在这里插一句："我们怎么办?"美国与以色列有着特殊的关系，一种对于以色列生存十分重要的特殊承诺，你们二位所说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会不会将以色列置于不利地位？如果以色列有 50 个强大的友邦，那没多大关系。可是，它目前只有一个强大的友邦。

布热津斯基：很抱歉。我对这个观点一点也不买账。那种要求我们饿死加沙人民，去证明美国与以色列友谊的观念，我认为，不仅在道德上不可行，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可行。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经常谈论美以特殊关系。我认为，我们与以色列的关系，是一种我们与处在敌对国家之中的弱小而勇敢的民主国家的天然关系。而且，我认为，我们对于巴勒斯坦人有同样的承诺，许多巴勒斯坦人的第三代都在难民营中度日。难民营，正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我认为，我们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证明我们自己，并且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布热津斯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实践中的问题。如果我们被赶出中东，以色列还能支持多久？所以，你知道，我说前面那番话的时候，绝对没有丝毫的犹豫。

最终，我认为，我所说的，也是以色列的最佳利益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公正的和平协议，如果我们必须做一些什么来得到这样一种公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就能够成为中东的永久的一部分，并且在那儿继续繁荣下去。如果我们被赶出了中东，以色列的存活几率你能赌多少？

伊格纳休斯：你们二位与之工作过的两位总统，吉米·卡特和乔治·H·W·布什，都曾经被亲以色列的团体批评过，称他们的支持力度不够。卡特总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在谈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时，用了"种族隔离"这个词，引来了不少批评。

这是一个情绪化的话题。它是国际政治中正在燃烧的导火索之一。布兰

特，你会如何建议新一届政府能够恰到好处，在追求不偏不倚政策的同时，维持传统友谊？

斯考克罗夫特：如果这留给下一届政府来解决，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地区面临又一场危机。我们现在的形势非常不寻常。我同意兹比格的观点，我对于我们是否能够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感到悲观。我们有个较弱的以色列政府。我们有一个较弱的巴勒斯坦机构。而且，真的，第一次，我们有一些准备支持一份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

布热津斯基：还有公众的支持。

斯考克罗夫特：两边的舆论支持。我们不具备的就是双方自主达成协议的能力。他们现在还不能够自主达成协议。他们现在还不够强大。内部还有太多反对力量。他们需要外部来自美国的压力，我们也有这样做的传统。

伊格纳休斯：你所说的“压力”，指的是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必须推动整个进程向前，小心而坚定地推动它，基于塔巴协议的框架，正如兹比格所说，告诉它们：“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提出它，认为这是一份公正的解决方案，是基于2001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共识。只要你们双方同意，你们就可以修改它，我们也乐于看到修改。但我们现在需要往前走。”

如果这一届政府下台，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会让所有人非常失望。这个地区现在已经非常脆弱了。黎巴嫩快要爆炸了。阿巴斯还能留多久？如果我们认为，好吧，要是阿巴斯走了，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人选，那我们就是在愚弄自己。我认为，这里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它非常脆弱。

新的总统上任，总需要花时间去重新评估、重新策划，所以如果这一届政府达不成协议，你又得等一年或18月左右，才能再回到我们目前的状态。

这个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布热津斯基：我想对布兰特所说的再补充一点。希望小布什总统仍然能够做成这件事，尽管对于他，我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的。他不断地带着点神秘感地向大家说，他期待今年之内签署和平协议。可他不能只是重复说这样的话，却没有任何实质含义。如果他真的这样想，他就该去做点什么。

我看不出，除了布兰特和我刚才说的这些，他还能做什么。可能他仍然会做，等到这本书印出来时，我们可能才会知道他做了什么。随他去吧。但如果他不做，我同意布兰特的观点，但我会走得更远。我会说，下一位总统必须立即切入，抓住关键，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存在分歧。

任何总统，无论他是靠压倒性优势还是微弱优势取胜，都至少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从而进入白宫。他在第一年或者说 18 个月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如果他在这段时间内不作为，即使他仍然会去努力，他在接下来的执政岁月中也不会有所作为。这是一项高风险的尝试。

但正如布兰特所说，我们有几个因素是十分有利的。阿拉伯国家最终变得更加理性，准备妥协。以色列公众变得更加灵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要比美国犹太人社团的右翼领导人还要灵活。这些右翼领导人较为强硬的观点，其实并不能代表绝大部分美国犹太人的观点，一般犹太人的观点会更倾向于自由派。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舆论则更加灵活。所以我认为，下一任总统，如果他足够勇敢和坚定，他就应当能够实现目标。如果他不能，那么他的麻烦会很大。

伊格纳休斯：如果以色列国防部的人跑来与我们坐在一起，他可能会说："先生们，你们忘记了，我们单方面撤出加沙。我们这样做，是寄希望于这个善意将得到回报。可是正相反，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导弹落下。随着导弹射程的扩大，我们更多的沿海城市暴露在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我们处理大量此类问题的时候，却没有一个站在我们这边的朋友。有人故意破坏和平进程。"我们如何回应这样的问话？

斯考克罗夫特：只要美国不允许和平进程被阻止，那么敌视和平进程的人，就无法阻止它。从加沙撤军的方式必然导致了后来的混乱。沙龙根本不愿意与巴勒斯坦人对话，他不愿意就土地交接进行任何安排。

布热津斯基：或者甚至是设施的交接。

斯考克罗夫特：或者，设施，一切事物的交接。

布热津斯基：因为他把这些搞得很糟。

斯考克罗夫特：安全是以色列人的真正问题，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恐惧。他们觉得，除非他们自己进行军事干涉，除非他们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弱化巴勒斯坦人使双方对比失衡，否则他们就会成为恐怖主义袭击下的牺牲品。兹比格谈到美国人可以沿着约旦河划一条界，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这一点。

我们也应当考虑像北约这样的维和部队。随着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我们应当让一支北约部队来维持和平，既能够帮助训练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又能够维持稳定，平息以色列人在撤退后对于混乱的恐惧。

伊格纳休斯：让我提一个问题来结束这一部分的讨论。以色列人坦诚相待的时候有时会谈同样的问题到深夜。这个问题就是，从现在开始50年后，中东还会不会有一个名叫“以色列”的国家。我认为，以色列的许多行为在美国人看来是极端，但这个问题才真的是其行为根源。怎样才能使这个犹太国家更加安全，长治久安呢？

布热津斯基：嗯，首先，我理解这种感觉。我第一次去中东推动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与埃及之间达成的戴维营和平协议时，有些阿拉伯人对我说：“你知道，侵占军占领耶路撒冷90年，最终还得走。我们不着急。”所以，以色列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他们也得自问一个问题：“如果和平来临，那将会使这可怕的后果更有可能，还是更不可能？”如果和平多少是合法合理的，那就

是说，双方多少都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和平共处，我这里又要再次强调以巴公众舆论，那么，以色列的安全就有所保障。

而且你知道，以巴和解的那一时刻，他们会有机会共同成为中东的新加坡。如果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就会看着迪拜和卡塔尔，然后对自己说："难道不想和那里一样吗?"一旦和平来临，凭着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智慧，这个地区将会在金融和科技两方面繁荣起来。以色列在科技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他们一直处在这种既不是战争又不是和平的状态中，处在一个我们逐渐失去影响力的越来越激进的中东地区之中，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当然，总会有搞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人，总会有想要报复的以色列人。我们会让这些人主宰我们的未来吗? 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责任才显得非常重大。如果下一任总统真的愿意站出来，成为一名领袖，他将很有可能胜利。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怎么想?

斯考克罗夫特：这不是没有危险的，但我认为以色列签订协议的危险远远小于目前状态下的危险。现在，它在一个极度敌视的地区被继续隔离，安全上只能依赖美国。如果我们能够解开这个死结，诚如兹比格所言，以色列和周边地区之间自然就会得到好处，以巴的经济活力将会点燃整个地区。

伊格纳休斯：这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但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华尔街日报》的凯伦·埃利奥特·豪斯说过一句话："提到中东，悲观必胜。"

斯考克罗夫特：但是让我给你一个反例。黎巴嫩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之一。但很长一段时间，贝鲁特成了该地区的企业中心和小巴黎。黎巴嫩很脆弱，它是一个小心地维持平衡的多元化国家。但黎巴嫩自己没有分裂，而是周边的形势把它撕裂了。我认为，让观点并不完全相同的人们共处并共同繁荣，确实是有可能的。

▶▶▶

伊格纳休斯：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是美国如何开始将紊乱的世界恢复秩序。我们谈到中东，我希望你们二位都回顾从前，想一想你们想要我们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价值观，从阿以和平进程到伊拉克到伊朗问题。

我曾经作为一名记者在贝鲁特工作，我的印象之一是刻在中东许多美国大学的大门上的字，这些大学都是由美国传教士于19世纪中叶建立的。门上刻着的字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丰盛”，这句话来自《圣经》。它表达了美国人对于世界的一种期望，正是这种期望引领传教士们150年前进入中东，并让他们多年如一日地留在那里。

从这里开始，我想请你们二位谈一谈你们想要看到我们带给这场阿以对话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国家今天在中东的形象，使之变得更正面。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和平进程只是个起点。如果我们能够成功，我们将能扭转周边的情绪。我们现在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外部力量，偏袒一方。因为这一点，大部分阿拉伯人都对我们失去了信心，当然，还因为伊拉克。

如果和平进程能够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认为，我们将能够改变阿拉伯人的态度。他们会像20世纪90年代科威特被入侵时那样，加入我们的行列恢复局势，甚至会比当年做得更好。我认为，他们需要准备好在伊拉克扮演他们目前尚未准备好的角色。

而且，那将恢复与伊朗的平衡。伊朗现在认为它连连得手。而阿以条约将会向逊尼派阿拉伯世界传递信心，让他们站稳脚跟。这也将是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重大步骤。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现在有60年的难民营，有人在难民营长大，靠着联合国的救济生存，他们没有希望，没有工作。那就是恐怖主义的可怕温床。我相信，现在正是开始扭转地区局势的时候，我们拉拢温和派，毕竟他们是大多数，而且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

伊格纳休斯：我们需要在支持威权政权时更隐蔽一些吗？小布什政府曾经表示，我们对沙特王权以及对于穆巴拉克独裁政权的支持，削弱了我们与中东人民的联系。你同意这一命题吗？

斯考克罗夫特：不，我对此不同意。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吗？是的。但我们不能一夜之间改造世界。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

给予阿拉伯世界信心，告诉他们我们真的在支持他们，告诉他们我们帮助他们，与现有政权打交道，我们会让事情走上正轨。但如果我们想要一夜之间做完所有的事，那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没人想要居住的地区，这将极大地威胁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在你的书《第二次机会》中，你雄辩地指出，美国正在中东翻开新的一页。请解释一下你的想法，美国如何代表不同的价值观。

布热津斯基：好，让我接着布兰特的话往下讲，讲一讲你刚才提到的那句刻在大门上的话。这句话讲到了我们曾经在中东扮演过的角色，也是我们应当重新扮演的角色。我们被中东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视为一种解放力量。我们被视作促成英法力量消失的大国，而且在阿拉伯意识觉醒之际，我们并没有派出自己的军队进入该地区。不计其数的情报机构与我们分享我们拥有但他们没有的技术情报，这样帮助他们以他们自己的速度、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模式，进入现代世界。这个过程却逐渐改变了，甚至变到了我们成了新的殖民主义者的程度。我们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干涉，我们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一边倒地支持沙龙，而且对于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一切表现出大而化之的冷漠。接下来，我们却又莫名其妙地通过民主化的方式，致力于文化帝国主义，可是，我们在这样民主化的时候，本身就失去了民主。

伊格纳休斯：你指的是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选举，可是后来，当哈马斯赢得选举的时候吧。

布热津斯基：完全正确。如果我们严肃地自问，埃及如果实现自由选举，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清楚地知道穆斯林兄弟会将绝对会以多数票胜出。我们真的想要那样吗？我甚至都认为，埃及社会的高层也未必想要这种结果。没人真正知道沙特大众究竟想要什么，但我可不想看见本·拉登与沙特王室的某位成员同台竞选的场面出现。

我的意思是，我们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影响力和帮助，与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当我们开始派出凯伦·休斯这样的人去向阿拉伯人传播民主时，我们却让自己成了遭人耻笑的对象。所以我认为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给以巴冲突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就能够去除中东反美激进主义的一个主要根源。我们就能够在中东重新成为致力于地区稳定的建设性力量。正如布兰特所说，切除了恐怖主义的部分社会根源。

伊格纳休斯：关于中东的问题和机遇，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叙利亚，这个国家一直在讲，和平谈判符合它的利益，但它却一直没有参与进来。兹比格，你曾经去过那里，也曾经与阿萨德总统谈过话。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布热津斯基：他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向我传递了两大信息。第一，他已经与阿拉伯民族复兴党决裂。在这一点上，他非常雄辩，尽管他的副总统似乎不那么雄辩。但是，在叙利亚内部有证据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理解国家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私人企业，更多地与外国做贸易，更加开放。管理经济的国家部门应当更少一点儿。在那次短暂的旅行中，我的印象是，似乎上述理念已经在国家层面被接受，但有些旧势力仍然表示反对。

第二，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的回应。我对他说："看看你们与以色列的冲突，你愿意在你们的领土要求得到满足，但以巴之间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吗？"换句话说，某种类似萨达特与以色列的和解协议之类的东西。他的回答毫不犹豫："是的，绝对如此，只要我们恢复

1967 年战争之前的所有领土。”

现在，我就在以色列重复这句话，以色列人的答复更加复杂一点。他们说：“是的，那很好。那是好消息。但他必须与黎巴嫩真主党断绝关系。他必须与哈马斯断绝关系。他必须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他必须与伊朗人拉开距离。”所以，我的感觉是，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同一轨道。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老布什的巨大成功之一，就是你与叙利亚接触，促使和平进程向前推进，尽管并没有什么成果。你怎么看待叙利亚带来的机会？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机会是有的。我们必须记住叙利亚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在很多方面都像黎巴嫩，国内分歧林立。这个政权自身有不少敌人，这是一个不安的政权。我认为，他们非常想要安定下来。有一次，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穆阿利姆对我说，他想要美国把叙利亚纳入安纳波利斯和平进程中来，他说，戈兰高地可能被当作一项议题提出来。对我而言，那意味着他们想要参与进来。

“9·11”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叙利亚人在提供情报以及破坏基地行动方面非常合作。但他们模棱两可。正如我所说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内部问题。他们既帮助我们留在伊拉克，又伤害我们，我觉得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国内问题上摇摆，并且想要保护自己。

如果我们不与叙利亚人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那我们就没法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而且，有一件事，戈兰高地问题的解决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不涉及民族感情，最多是一种战略决策，而不像约旦河西岸那样涉及民族感情。

伊格纳休斯：叙利亚人会私下对你说，他们并不想派兵到黎巴嫩，但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不符合叙利亚国家利益的黎巴嫩。兹比格，你觉得叙利亚的这种要求，这种不想卧榻之侧出现一个敌对政府的要求，合理吗？

布热津斯基：这取决于更大的背景。如果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真的有

了进展；如果伊拉克的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而叙利亚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像布兰特所说的那么模棱两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持历史上的叙黎关系，就不会对美国产生任何敌对作用。

所以，这个答案取决于大背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我们真正准备好去推动以巴和平进程的诚意。以巴和平进程才是最终解决上述其他问题的催化剂。这样，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或解散的问题才更容易解决，哈马斯的消亡或是转型才更有可能，叙利亚与伊朗的纽带才可能松弛。特别是，如果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出现和平，接下来，叙利亚就可能会在黎巴嫩扮演一个更加温和的角色。所以，关键中的关键，真的在于我们如何严肃认真地对待中东潜在的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兹比格的话完全正确。1975 年，我们暗地里支持叙利亚进入黎巴嫩，目的是为了制止一场内战。黎巴嫩是地区政治的产物。它是和平进程的另一个理由。如果你能重拾这个进程，你就能与叙利亚人达成交易，黎巴嫩就会重新恢复它传统上的派系中立角色。但这只能在整个地区的大背景下完成。

布热津斯基：请允许我再加一句，那种认为叙利亚在黎巴嫩起到百分之百坏作用的观点，无疑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斯考克罗夫特：当然经不住。否则我们 1975 年就绝不会鼓励他们进入黎巴嫩。

伊格纳休斯：也许如此。但我参加过黎巴嫩《白天报（AnNahar)》主编日布拉内·杜埃尼（Gibran Tueni）的葬礼，我也去过其他被谋杀的黎巴嫩朋友的墓地，相信这些谋杀都叙利亚人干的。

斯考克罗夫特：毫无疑问。

伊格纳休斯：所以，一位理智的人可能会问，我们怎么能够与这些叙利亚人打交道？黎巴嫩人不喜欢叙利亚人，叙利亚的杀手被派来暗杀黎巴嫩的政治家。我们难道不应将凶手绳之以法吗？当黎巴嫩人为所有被杀之人哀悼的时候，我们能对他们说些什么？

布热津斯基：那么，要看我们是要就改变大背景作出回应，还是要就复仇作出回应？

伊格纳休斯：应当是哪一种呢？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应当对改变大背景作出回应。毕竟，你知道，当我们决定让阿拉法特前往马德里时，我们就向和平迈出了一大步。当时，阿拉法特的手上不是没有鲜血的。

斯考克罗夫特：而且黎巴嫩人自己也要对杀害自己的同胞负责。有些最残酷的杀戮恰恰是黎巴嫩人自己干的。

布热津斯基：马龙教派屠杀巴勒斯坦人，就是一例。

伊格纳休斯：我们的军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在中东地区及周边维持大量驻军。我们在卡塔尔和巴林都有基地。我们继续向该地区除了伊朗之外的每一个想买武器的国家贩卖武器。我们的军事存在是否过于明显？你们会建议撤离吗？

布热津斯基：那要取决于哪支部队。我当然建议我们尽快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

伊格纳休斯：我在想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关于部署美国军队，作为一种稳定因素。还有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

布热津斯基：在波斯湾？是的。

伊格纳休斯：每个人都会问："这支军队是为了稳定地区局势，还是相反？"

布热津斯基：如果军队部署在波斯湾，如果它主要是海军，如果这些军队只是为了保护富有但极度脆弱的小国不受包括伊朗在内的邻国的侵犯，那么，我对这样的军队部署毫无异议。制造问题的是更大范围的政治结构，还有这场伊拉克战争。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驻军的多少，而更在于我们想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动荡的地区。我们在冷战时期就向这个地区出售武器。但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兹比格和我前面所说的良好形象，而且我们确实也可以采取行动逐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存在就不会被视作敌意。就拿阿联酋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富有但基本上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

布热津斯基：富得流油。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美国军队的存在，如果能够给予该地区的人民一种稳定的感觉，使他们不至于担心国家的安全，那这种存在就是有效果的。但这一目标必须常存于心，不应在这个地区玩把戏。

伊格纳休斯：2008 年下半年，普通的美国人看到伊拉克战争，看到超过 4 000 个美国人被杀，看到巨大的开销，看到民意测验表明，中东地区的人们普遍不喜欢美国，甚至到了憎恨的地步。普通的美国人就可能会说，这些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却一个劲儿往里砸钱。我们该做的正确的事，就是撤出。我们已经在中东过度投资了。现在该停止了。许许多多的普通美国人感到，我们应当减少我们在中东的存在。

布热津斯基：我对此有不同观点。

伊格纳休斯：不仅是普通大众这样想。外交关系理事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也认为中东的美国时代正在终结，部分因为我们在伊拉克犯下的错误。所以，普通民众，甚至是一些精英分析家都认为，我们真的正在进入一个美国力量将会大量削弱，也应当被大量削弱的时代。从刚才你们二位所说的来看，你们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那么，我就想请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们成为中东的一支强大的力量非常重要呢？

布热津斯基：让我用另一种观点来解释，因为我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像理查德·哈斯这样的人所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与布兰特和我的观点一致，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正在削弱我们存在的可能性。但我并不认为普通民众就会因此赞成我们离开中东。普通民众的感觉基本上如下：如果我们离开，一来将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二来我们将丢了中东的石油。两者都不好。

真正的危险在于，在这个高度动荡的背景下，普通大众必须对越来越浓的军国主义言论和宣传有所反应。这种军国主义言论和宣传，将所有的困难泛化成对伊斯兰世界的全面谴责以及我们必将与"伊斯兰激进组织"进行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极度危险的宿命论——利伯曼参议员就一直在宣传这种论调。

那就是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在中东的解决方式，如果伊拉克战争继续毒化我们的存在，如果我们与伊朗的关系中出现负面事件，那么，这种危险将会变成现实。而那无疑将是对我们现有困难的极端扩大化，这种扩大是致命的。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美国的存在还有一个理由。中东的冲突并不完全是国与国的冲突，而是派系间的冲突。激进主义，或者你也可以说，伊斯兰的一个

派别，正用剑来恐吓大众。我认为，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存在带来一种稳定感。

布热津斯基：如果我们重新定义我们自己。

斯考克罗夫特：如果我们重新定义我们自己。

布热津斯基：重新定义。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在伊拉克学到的，就是你不能随便挑个国家去创造民主，然后却又转身离开。这种方式行不通。所以，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存在变得谨慎温和。我们应当存在下去，但应当鼓励地区内正义力量的发展，打击极端势力，为各国提供防范极端势力的保护，使得温和派与极端势力区分开来，不至于成为那种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传声筒。

布热津斯基：接着布兰特的话说下去，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这两个地方，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文化理解比较褊狭，导致我们一面倒地依赖武力去解决那些深深植根于我们并不理解的历史和文化分歧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他们自己花时间和耐心去找出解决方案。我们的参与是一种激进的外国干涉，这只会导致不受欢迎的结果。

几个星期前，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有一篇精妙的文章，写的是一个排的美军士兵在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荒野中战斗的故事。他们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完全与世隔绝。在军营附近有一个村庄，他们时常去那里打狙击战。

与此同时，他们也想摧毁塔利班基地，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有一次，他们的营地受到袭击。他们最终与村庄里的长老们协商开会，领导这个排的排长直接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打，还是和?”那些长老们说：“我们会考虑你的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内部碰个头，我们会作出决定。”他们确实作了决定。

第二天，他们回来答复说："你知道，你们是外国人。你们在这儿，还拿着枪。继续吧，打吧。"于是就又有了一场冲突，这个排损失惨重。而这个村庄被完全摧毁了。对我而言，如果我们再不谨慎一点儿的话，这类冲突将会遍地开花。

这种冲突与基地组织无关。村民们对基地组织毫无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的村庄。

伊格纳休斯：只关心伊斯兰世界。不过，我们是不是也有一种感觉，觉得所有的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战后灾难，却是源于一场我们并没有发动的战争，是一场被迫强加于我们的战争。

布热津斯基：你说的是哪一场战争？

伊格纳休斯：1996 年，本·拉登发布战争宣言，主要内容是说："如果你重重地打击美国人，他们就会逃跑。"1983 年和 1984 年贝鲁特所发生的一切，恰是如此。在索马里也是一样。通篇战争宣言看下来，你会觉得主题只是一个："美国人会夹着尾巴跑掉。"

现在，当中东的人们读到你们关于中东的想法时，许多人会说："啊哈，你看，美国人能被打败。他们正在撤退。这两位美国最富智慧的外交政策专家正在呼吁政策改变。我们对美国的重击已经成功了。"我要请你们二位对这种态度作出回应，因为这必然会出现在"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网页上。半岛电视台的台长则会说："美国能被打败，这个观点如今又多了一点儿证据。"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说的恰恰相反。我们说的是，我们有必要留在那里。本·拉登说得很清楚，他的袭击不是针对美国，他想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地区，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的政府是腐败的，必须被推翻，而我们却在庇护这样的政府。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阿拉伯人，你会想要我们离开，而把这个地区拱手交给激进主义者吗？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我们需要另一种存在，能够给这个

地区的每一个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普通人信心，无论宗教的权力是大是小，都要让宗教归位。但我们不能用 13 世纪的铁拳方式来教训他们怎样做。

布热津斯基：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有一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本·拉登的大量蛊惑都在贯彻这一名言。他想要美国卷进来，并且用一种所有沙特人都会憎恨的方式卷进来。他认为，通过集中攻击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可能美国人会愚蠢地作出回应，然后就会产生冲突。基地组织说，如果美国和伊朗开战，那真是太好了，因为冲突将进一步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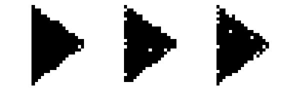
在"9·11"事件中袭击我们的人，很明显地是想激怒我们，使我们用一种绝对笨拙的方式作出回应，这样越来越多的穆斯林都会被动员起来反对我们。不幸的是，在某一个方面，他们成功了，于是我们就跑到伊拉克去打仗。

我认为，我们不应当离开那个地区。但我们用一种政治上有效的方式来制定军事政策。这意味着孤立基地组织，动员穆斯林温和派，为温和派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他们处理激进主义的条件。

如果我们只是施以重手，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些。我们没法向以巴和平迈进，我们会继续纠缠在伊拉克，我们会在阿富汗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我们会毁掉罂粟田却不给农民任何赔偿，我们会袭击普什图人，最后我们会自己制造出更大范围的战争。这不是胜利。这完全是本·拉登为了击败我们而想要我们做的事。

伊格纳休斯： 如果让我来总结这次谈话，我会说，你们二位都认为，美国会留在中东地区，但是要谨慎小心地留下来，要有持久性，要改变现在的处理方式。你们二位都很富有同情心地说，除非我们更认真地处理以巴问题，否则我们面临的形势就会注定越变越糟。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任总统的备忘录头条?

斯考克罗夫特： 我相信会是第一条。



伊格纳休斯：让我们转向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某一个部分可能以危险的方式爆炸，这个部分很可能就是巴基斯坦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地区。我们经常提醒自己，巴基斯坦是一个核国家。它国内有大量而且还在增长的伊斯兰叛乱——巴基斯坦内部的塔利班。在后穆沙拉夫时代，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日益虚弱而分裂。所以，我想请问你们二位，你们对于巴基斯坦摆脱现有的危险处境，走向危险更少、更稳定的未来有何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我很难看清未来之路。我们现在的局势非常危险。巴基斯坦，某种程度上，在 1947 年的印巴分治中态度强硬。他们继承了部落地区，也是派系矛盾多发的地区。他们却并没有类似国大党那样的党派能够给予印度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恰恰是巴基斯坦没有的。而且，他们没法应对民主。总是有动荡，民选政府变得腐败，或是迟钝，或既腐败又迟钝，于是军队把民选政府赶走，在一段时间内掌控国家，然后再将政权交还给民选政府。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巴基斯坦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是它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他们在安全上依赖我们。但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后，我们对双方都进行制裁，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停止武器供应。这对印度人没有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有军事工业。巴基斯坦却不一样。这项制裁使得他们的安全感骤失，并开始寻求核武器。

当他们拥有核能力时，我们加重了制裁，这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直到最终，我们就有了现在的巴基斯坦，军事总统不愿意将国家交还给民选总统，政党间严重敌视。但这些政党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意义上的政党，它们只是大部分在部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政党。

贝·布托能够将党内领导权交给她的儿子和丈夫，这个事实恰恰是这个问题的显现。那正是我们接手的问题。维系巴基斯坦国家团结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军队。并非必然是穆沙拉夫，而是军队。我认为，也许目前困难局

势的最好结果，就是总统党、布托党和谢里夫党之间能够互不干涉。

现在，布托和谢里夫结盟，但这种盟友关系不会长久，因为各党派大体上都互相仇视。穆沙拉夫还会撑下去吗？我不知道。对我而言，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在穆沙拉夫之后军队的分裂。军队中的老人，也就是高层，仍然是当年由英国训练出来的，他们强有力而且公正无私。但在他们之下，在军官层面上，有些人是训练过塔利班，让他们进入阿富汗去与苏联人打仗的。

我认为，防止核问题的爆炸需要高超的技巧。如果军队分裂了，核武器就未必安全。一个混乱的巴基斯坦，可能会构成致命的诱惑，诱使印度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还可能在阿富汗引发连锁反应。

伊格纳休斯：那是一个悲观的预测。兹比格，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布热津斯基：我同意，我倾向于从布兰特所说的话中得出一些教训。我们必须极度小心，不要使我们自己过多地介入巴基斯坦内政。巴基斯坦太大，人口太多，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很难有效处理其内政。

我不太喜欢美国鼓励贝·布托返回巴基斯坦的举动。去年我和布托谈过几次话，我常常感到怀疑和不安。我认为，我们正努力把水和油搅在一起，我确信，要么穆沙拉夫死，要么贝·布托死。我们推动贝·布托回国，说明我们对巴基斯坦政治的理解是多么浅陋。他们极度混乱，部分意义上讲，这是民族与省际政治，而从另一部分意义上讲，诚如布兰特所言，他们是自上而下的，竞争性的政治，而且受到军队的极大影响。

巴基斯坦人有一句口头禅，说巴基斯坦的存在归因于三个A：Allah（阿拉）、America（美国）和Army（军队）。阿拉遥不可及；美国也很远，而且很无知；军队则近在眼前。所以，军队的延续，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将是巴基斯坦政治的核心因素。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用分裂巴基斯坦的方式让我们自己介入进去。

我认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不再进行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真是太糟糕了。我们没有训练这些青年军官的机会了。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普什图地区和边界地区，基地组织的老巢。我们必须拔除基地组织，但我们必须十分谨

慎，不要因此而压垮了巴基斯坦政治，使之变成完全非理性的反美主义。目前，已经有一些蠢蠢欲动的潜流，指向这一可怕的后果。

当我们必须行动的时候，我们应当审慎行动，避免公开此类行动。我猜测，如果我们这样做，巴基斯坦权力层将会同样出于他们的利益，选择不予公开。但如果我们开始炫耀吹嘘，就像我们最近做的那样，那么，任何巴基斯坦政府都会被弄得越来越不可能接受我们的行动。

公众情绪也会被牵扯进来。军队里会仇恨蔓延，结果难以预测。我们或许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控制阿富汗的问题，因为我们曾经帮助阿富汗人反抗苏联，所以我们在那里还有一些残存的同情。但如果阿富汗的乱象波及巴基斯坦，我认为，我们就会面临完全难以控制的局面。难以控制，是因为我们牵扯进去并已经陷入泥潭，难以控制，是因为我们突然中止，断然离开。

所以我要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审慎、审慎、审慎。让巴基斯坦人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停止在民主问题上教训巴基斯坦人，要懂一点他们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利益。要不断强调，他们在阿富汗有某种友谊，这种友谊能够使他们面对印度时拥有战略纵深。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十分小心，不要让阿富汗人认为他们会成为巴基斯坦的附庸。这种平衡很难达到。但除此以外，我不赞成任何涉及巴基斯坦的政治激进主义。

伊格纳休斯：我们与巴基斯坦军队的关系如何？新的巴基斯坦总参谋长基亚尼将军对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上将、中情局局长以及其他人说，他准备与我们合作，在部落地区训练所谓边境部队，与那些偏远山区的居民合作，建立更主动的反恐力量。

布热津斯基：是的。

伊格纳休斯：要发展经济。还要使用主动策略出击，并打击任何隐藏的基地成员。很明显那符合我们的利益，但它也提出了恰恰是你们二位刚才谈及的危险，也就是军队分裂的危险。如此主动进取，可能会引发争议。你们有何建议？

布热津斯基：我要说，巴基斯坦的军队领导人确实真的想要这样做，并且准备担负起领导责任。如果我们能够秘密地做，不要太引人注目，那可能要比不做更好一些。

伊格纳休斯：不顾军队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冒出来的危险？他们会评论这一切："我们的总参谋长到底在和美国人搞些什么？"

布热津斯基：作出判断的是巴基斯坦的将军们，而不是我们。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但我认为，我们被看成是帮助巴基斯坦人，总好过强迫巴基斯坦军队去做这个或那个。

布热津斯基：也比我们撇开巴基斯坦人自己做要好。

斯考克罗夫特：也比我们撇开巴基斯坦人自己做要好。请记住，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分化的地区之一。英国人曾经控制了各个派系有百年之久，却没能使之和解。巴基斯坦人必须在处理地区事务和塔利班卷土重来的影响等事务中有主导权。

如果巴基斯坦军队想要帮助，我们就应当帮助他们。我们应当鼓励巴基斯坦军队。我们应当重新开始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

伊格纳休斯：让更多的军官到美国来接受培训。

布热津斯基：青年军官。

斯考克罗夫特：因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军队是迫使国家凝为一体的胶。

伊格纳休斯：甚至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托拉博拉山区和部落地区还有“掠食者”无人机飞过，我们应当禁止这些飞行吗？这些美国的无人机飞过像巴基斯坦这样的主权国家的领空，这算不算是一种冒犯？它们还能继续飞行吗？

布热津斯基：那取决于这些无人机飞行的效果。如果它们进行轰炸，杀死的当地村民远比基地组织的疑犯要多，那这种效果就很不理想了。你可能会诱发更多的人加入基地组织，比你摧毁的多得多。但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如果我们真的有过硬的证据，证明某些基地组织高级成员在某个地区，而我们真的有机会击毙他们，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应当去做。但我会告诫任何下这条命令并且最终将可能杀死50个当地村民的指挥官，你将为此付出代价。

伊格纳休斯：听起来就是那句古语：“如果你瞄准国王，千万别打偏。”

布热津斯基：是的，而且别去杀太多国王的亲戚。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兹比格说得对。首先，我们不应当对此吹嘘，最好假装无辜：“什么掠食者？”但如果我们仔细地瞄准过，我认为还是值得去做的。这将能够静悄悄地展示美国令人敬畏的力量，并且能在巴基斯坦的军队中激发某种敬仰：“这些人真是不赖。”

伊格纳休斯：那么，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们的处方，有点像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of Kos，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译者注）的誓言：“万事之首，绝不伤害。”在这样一种微妙的环境下，在一个我们并不能完全深入理解的国家里，一定要小心。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别大手大脚的，恐怕我们过去却做了许多这样的

错事。

伊格纳休斯： 兹比格，人们经常将穆沙拉夫政权以及巴基斯坦后穆沙拉夫时代的种种危险，比作你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面对伊朗国王时的危险。我一想到巴基斯坦，就会想起让人害怕的事，我又想起了过去的伊朗革命。我看到这场危机中潜藏着的梦魇现在仍然挥之不去。我看到，这种梦魇很可能从后穆沙拉夫时代的巴基斯坦爆发出来，但直到现在，我也并不清楚什么是当时伊朗正确的道路，或者类比现在的巴基斯坦，什么又是现在的正确道路？你怎么看呢？你必定长时间地思索过这个问题。

布热津斯基： 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因为它需要重新思考现代伊朗的历史，甚至回溯到莫萨德克（Mossadegh）的时代。但让我先讲明一点。国王曾经统治伊朗，但伊朗军队没有。在巴基斯坦，则是军队统治国家，而不是穆沙拉夫。穆沙拉夫甚至无法主导军队。

齐亚·哈克可能比穆沙拉夫更能主导军队。关键在于，军队统治着巴基斯坦，军队是更有持续性的机构。而在伊朗，国王倒台的时候，他的意志力也摔得粉碎，他的军队就四分五裂了。国王的军队自己无法独立起来。根本没有针对军队的政变，它就已经分裂了。

我现在很严肃地看待巴基斯坦军队。我确实害怕，如果我们不太谨慎，我们将使巴基斯坦军队仇视美国，特别是那些青年军官，他们与我们没有联系，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会对我们产生极大的副作用。

伊格纳休斯： 我最近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拜访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基亚尼将军，并与一些巴基斯坦军官谈话，我想说，他正在做正确的事，因为他正将专业精神重新带入军队。兹比格、布兰特，我很好奇，你们在看到他接替穆沙拉夫担任总参谋长之后发生的变化，你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呢？

斯考克罗夫特： 我对他感觉非常好。我认为，他做得对。他正在使军队

重新专业化，而此前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军队的专业精神被人们遗忘了。他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军队的重心。巴基斯坦军队总是针对印度，因为印度是问题之源。他必须使军队重心转向北方领土，不仅因为美国想要这样做，而且因为那里是新的威胁之所在。

伊格纳休斯：我来总结一下，我认为，基亚尼将军聘用巴基斯坦最优秀最勇敢的两名记者的弟弟，作为他的军队的发言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能够这样做的绅士，总不会太坏吧。

布热津斯基：但可能会短视。

斯考克罗夫特：不过，他却是巴基斯坦很长时间以来所出现的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至少看上去有希望。

>>> 第四章

开放的好处：中国和远东

戴维·伊格纳休斯：对于我们这些思考外交政策的人而言，有一条真理不证自明。21 世纪的最大挑战，就是要找到一种增强而不是削弱国际体系凝聚力的稳妥方式，将一个崛起的中国纳入全球国家联合体中来。毫无疑问，中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会更强更大，总体来看，它将会成为国际体系中更有活力的参与者。许多人感到这将威胁美国。兹比格，我们如何将中国的增长转化成我们的利益所在？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嗯，在这一点上，我坦承自己多少比较乐观。首先，美国的关注点在于中国具有竞争性的几个方面，比如在贸易上、商业上，或者潜在地存在于军事领域，这些关注都有其合理性。而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共同的愿望，它们都想将中国吸纳进国际体系之中。

当然，那就意味着美国愿意根据现实作出调整。将中国吸纳进国际体系，与吸纳那些小国完全不同。它要求逐步地改变国际体系，重新定义美国优越性的含义。在这个方面，我认为，美国的态度，要比 1914 年时的主要列强对待崭露头角、流露帝国欲望和殖民野心并想跻身强国之林的德国时的态度，要有远见得多。我们现在的行为方式要聪明许多。

其次，我的乐观主义的部分原因在于，我感觉到，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被意识形态的狂热所主导，他们并不像斯大林的苏联或是希特勒的德国那样，认为本国的未来就在于将自身的价值体系强加于全世界。他们更多地受另一种思想的主导，认为他们必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在理性的范围内，努力弄清楚如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如果双方都能足够理智和敏感，

如果没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这一过程将会持续。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对于这样一个如何将崛起中的中国以平稳的方式带入全球体系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大问题，你又从何说起呢？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我也持乐观态度。从美国方面来看，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们在冷战正酣的时候开始接触中国，我们与中国达成理解，两国将共同反对苏联霸权。这一结合使得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事物，在美国人的眼中，有了一层不一样的色彩。

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以开放体系主导的世界秩序。我们这样做，部分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错误的拨乱反正。不过，我们要求德国和日本首先民主化，然后我们才能允许它们返回世界秩序中去。所以我们建立了一种开放体系。比如，尽管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仍然允许它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

在中国方面，1949年之后，他们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除了苏联之外，他们没有与任何国家主动建立外交关系，甚至与苏联的关系也变得充满敌意。慢慢地，他们才从自我隔绝的壳中钻出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世界。首先，他们越来越依赖原材料的进口。其次，他们的制造业非常依赖外国市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架构，用来保障获得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可靠渠道。

中国人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他们不想推翻现有体系。他们想要加入体系，而恰好这个体系又是相当开放和友善的体系，所以，尽管也有不少紧张不安的气氛存在，尽管你可以在中美两国内部读到不少负面言论，但我认为，我们今后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好的机会使中国融入现有体系。

伊格纳休斯：但当崛起中的中国想要获取原材料以维持经济增长，当它想要确保一个稳定的环境时，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中国仍然不是美国

的天然的竞争对手呢？原材料的供应是有限的。为什么中美两国却不会因此而走上冲突的轨道呢？

斯考克罗夫特：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想要的结构，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贸易体系。如果中国人寻求排他的双边关系，那确实是个问题。但至今，他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一个开放的体系。

现在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头痛的说法。如果美国坚持一种正式的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坚持自己是第一位，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重要，现在我们确实不时听到这种说法，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信号。但至今，我们还没有那样做。比如，在能源问题上，我们已经表明了态度，全球的供应量假设为 X，全球的需求量为 Y，我们愿意支持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能源配额体系。

布热津斯基：让我在布兰特的基础上再加两点。戴维，你把中国称作一个对手。

伊格纳休斯：一个潜在对手。

布热津斯基：是的，你是说一个潜在对手，在追求他们的利益上毫无顾忌。当你说中国在追求他们的利益毫无顾忌时，你是不是也在说美国自己？或者用一句溢美之辞，美国的全球商业运作非常活跃。我们并非不愿意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但是，对手，或者说商业对手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自我克制的潜在含义。它与最终导致冲突的毫无顾忌的帝国的军事竞争绝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认为，这种思想和认识，指引着我们和中国人。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绝不会从一场类似 20 世纪的那种大冲突中得到好处。

另外，我们多少知道我们的领导层如何运作。我们对于中国的领导层如何运作知之甚少。但根据我自己与他们的领导层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们的领导层极度老练，渴望学习，对于现实有深思熟虑的理解。这就是我见到邓小平的第一印象。

同时，我还对中国领导层非常审慎的自我教育举措印象深刻，让我给你举一个特殊的例子，这个例子让我着迷。至今大约有 5 年了，中国领导层一直在最高层举办高层领导研讨会。只给最高层的领导们举办，这有点儿像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种研讨会是全天的活动，由一些专家主讲。所有的最高层领导必须参加，下面就是他们已经举办过的一些主题。其中一次叫作“宪法的重要性和了解法治”。另一次叫作“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全球化趋势”，“军事科技趋势”，还有一次是“从帝国力量兴衰看世界历史概貌”。我希望我们的总统也能花点时间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另一次是，“国际贸易、投资、和中国走向全球化的重要性”，“城市化和经济不平等”，“知识产权”，“科学治国”，“民主和法治”，“如何发扬党内民主”。

这样的领导层表明，中国人理解他们潜在的力量，也理解超出力量极限的危险。所以，除非中国国内出现动荡，否则我愿意认为，尽管面对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中国，我们的调整有时比较痛苦，但它并不困难。不过，如果中国国内出现动荡，那么所有的观点都会被推翻。

伊格纳休斯：让我更详细地询问这一观点。中国领导层确实有这种儒家传统，明智的人们聚在一起，用你刚才提到的方式努力更新知识，成为合格的现代官方精英。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却有越来越多的不安。

我的朋友们认真研究过中国，他们告诉我，从农村地区来到这些城市的人们问题越来越多，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工作。他们要么在城市里过着贫穷的日子，要么怀着怒气与不快回老家。

布兰特，有人看到这些现象会说：“中国的凝聚力将面临考验。儒家的精英文化无法加于全国。这个国家潜藏着不稳定。”这就是危险。

斯考克罗夫特：如果你回顾中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中国总是从高度中央集权的紧密有序的国家走向混乱，这样的过程反复出现。我的感觉是，中国领导层非常害怕不稳定。我认为，那种害怕是他们前进的动力之一。比如，他们害怕在政治上开放体系，因为他们害怕不稳定。我理解为什么不稳定是

一个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城乡之间关系紧张，整个国家快速增长的财富和低端人口的极度贫穷之间同样关系紧张。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如何处理环境恶化的问题。这些都是极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比以前更令领导层操心。我不想预测会发生什么，但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但我认为，中国最不可能发生的不稳定情况，是对外侵略。中国的历史表明，汉族历来没有过度的侵略性。当中国变得气势汹汹的时候，往往是在他们被外部力量征服并且受“外族”统治的时候。

布热津斯基：或者是被羞辱的时候。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或者是被羞辱的时候。中国人确实对西方有一种心结，就是因为19世纪时曾经受过西方的羞辱。这段羞辱已经深深烙进中国人的心里，形成他们的历史意识。

伊格纳休斯：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如何出牌，兹比格？我们应当对中国领导层温和一些吗？是否不应当鼓励可能导致动荡，以及在长期可能改变中国使之更民主的各类事件，避免加重中国的问题呢？或者，我们是否应保持压力，对中国人说“你们的体制在现代世界中运转不灵”呢？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呢？

布热津斯基：我想先给布兰特刚才所说的加一点注脚，然后再回答你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流动失业人口大约有2亿，这些人随时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新的城市正在扩张，大型省际高速公路网非常棒，就像美国的公路。

伊格纳休斯：但还没建好。

布热津斯基：还没建好，是的。但这个公路网已经建了4万英里了。我

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时，建的高速公路是 6.5 万英里。俄罗斯人正在建他们第一条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超级高速公路，这是他们的第一条。你要是从莫斯科驾车是去海参崴，还会经过石子路。

但关于我们如何应对中国人的大问题。首先，要尊重。这是一种不会轻易接纳我们的恐吓或说教的文明。中国人十分清楚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这种认识很合理。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和文化之一，就是中国。如果我们去向他们说教如何行事，我想，他们绝不会有反应。

其次，他们很聪明。中国领导层十分有智慧。中国领导层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进行更多民主的公众讨论。当然，这里的民主也许与我们所指的民主并不一致。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回应公众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的愿望。我想，我们可以见缝插针，在这一点上能够与他们像朋友一样进行讨论。但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过于傲慢，我们只会自取其辱，而且所有意见甚至都不会被考虑一下。

上一次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曾经十分担心台湾可能会干扰奥运会。我说："我认为台湾不会，西藏倒有可能。"我还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是中国的朋友。你们应当就这事与达赖喇嘛谈一谈。"

现在，我们在这儿谈话的时候，局势已经失控。也许当时我告诉其他人，而不是直接说教，可能更明智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就西藏人的问题教训中国人，并告诉他们怎样做，那么，如果他们作出反应的话，他们则很有可能对我们说："你们的黑人问题呢？美国的不公正问题呢？你们的贫富差距这么大，而且还在拉大，你有什么可说的？"

我认为，我们没法教中国如何行为处事。但是，只要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去将经济和社会摩擦激化成地缘政治冲突，只要与此同时，我们努力为我们的对华关系以及我们与日、韩、印以及其他中国邻国的关系，创造一种稳定的框架，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与中国共同生存的方式。一项多元化的美国政策，能够编织国家关系之网，能够防止中国将美国隔绝在大陆之外，这是我们完全能够成功运用的政策。所以，我要再次重申，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的原因所在。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认为，比如说，从现在开始10年之后，中国会更加民主吗？或者我们应当向前看，指望现在的一切会有持续性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会有一场持续增强的斗争。1978年，当中国人开始经济发展计划时，邓小平说“致富光荣”，还有“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我认为当时开始经济发展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稳定的关键，就在于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拥有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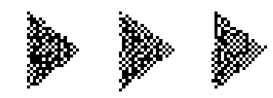
他们确实在经济发展计划上做得相当出色。他们的政治结构没能跟上。我的感觉是，他们知道政治结构滞后了，但他们却不清楚该怎么做。他们在一些乡村尝试基层民主。有些人说，民主也许应当首先存在于共产党内。在2007年秋天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我想，他们的候选人比要竞争的371个席位多出29个。所以，确实有一点儿竞争。

伊格纳休斯：一点儿竞争。

斯考克罗夫特：有一点儿竞争。但正如你前面所说，我认为，他们开放政治体系的步伐比较慢，因为这个过程令他们害怕。

伊格纳休斯：而我们不应当去做背后的推手。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不能。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可以说，冷战使得基辛格开始了与中国的合作，也使得你帮助构建了中美的共同努力以在阿富汗阻止苏联的行动。但在整个冷战时期，台湾仍是冲突的焦点。

在过去几个月里，出现了紧张局势缓和的可能性，台湾选出国民党（Na-

tionalist）上台，一位新的台湾领导人称，他想与北京就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你认为这现实吗？美国如何促进这个过程？

布热津斯基：纠正一个小小的技术名词。当你说 nationalist 这个词时，你指的是国民党。你不是说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台湾人。

伊格纳休斯：我不是说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台湾人。那不是国民党所代表的。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台湾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了他们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微妙性。他们准备提升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鼓励家庭和社会往来，促进跨海峡投资，增加航班——简而言之，促进关系正常化。

我有一次去中国访问时，邓小平就借这个场合利用我来宣传其"一国两制"的概念。在一个中国里，会有多样性。人们一般认为，"一国两制"指的是，香港实行一种政府形式，而大陆采用另一种。我不断地向中国人建议说，该是修改这一概念的时候了，应当是"一国多制"。因为台湾又是一种不同的体制。台湾可以增加与中国大陆的亲密接触、跨海峡投资，人员、学生和商人的往来，这些大部分已经发生。事实上，创造出了一种中国包容多种体制的形势。

西藏是个更棘手的问题，因为西藏有其真正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这里是中国佛教的摇篮。中国人仍然需要想出一种真正能够包容截然不同的民族和宗教实体的方法，那是一个重要然而十分艰难的挑战。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如果台湾真的与中国大陆成功进行了关系正常化，那么我们几代人关注的焦点就会烟消云散。如果这样的结局发生了，这是不是为我们重新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威胁，打开了另一扇门？

斯考克罗夫特：可能是。但台湾已经从最可能的冲突焦点，转向较低可能的冲突焦点。相反，倒是大背景中的中美力量竞争在不断增长。台湾可能

会卷入冲突，但它却未必是冲突的根源。

我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不太可能解决台湾问题。但可能会大量减少台湾作为冲突点的可能性。台湾的前领导人，那位外向型的陈水扁，曾经非常努力地走向独立，他是个真正的危险，他可能真会将我们带入与北京的直接冲突中去。而这种可能性现在小多了。

布热津斯基：即使台湾问题没有一种法理上的解决方式，但也可能会出现一种具有开拓意义的事实上的包容。

斯考克罗夫特：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10年前，中国大陆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时间并不在他们那一边。他们害怕台湾人越来越独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曾经有过剧烈的努力要推动统一。逐渐地，他们意识到，时间很可能在他们这一边。台湾的主要工业都大量迁往大陆，而且两岸的文化纽带越来越紧密。台湾人却转而认为，时间不在台湾人这一边。我认为，他们确实可能走向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可能会有某种兹比格刚才提到的形式，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大陆是一部分，台湾是一部分。

布热津斯基：甚至某一天，某些亚洲国家也会有兴趣。

斯考克罗夫特：某种非直接的亲缘关系。但那不会一夜发生。

伊格纳休斯：对有些人来讲，又会想起“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日本炮制出来的词，让人想起亚洲帝国主义。那会把人吓倒。即使中国与邻国一起解决问题，但中国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地区超级大国。我们应该为此担忧吗？

布热津斯基：我们应该为此担忧，因为这表明，美国在远东大陆上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甚至可能是被排除在外。而且，在某种方式上，我们已经与中国就远东自由贸易区的构成各执一词，应该是亚洲和中国，或者应当

是亚洲、中国、日本和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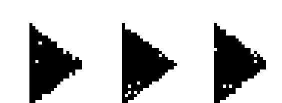
但重要的是，这样的争论不太可能导致一场因政治原因发起的战争或是类似的冲突。只要中国自身仍然想要融入新体制，只要我们能够聪明地加以应对，能够留住其他国家参与进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多元中心的远东，以保护我们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争论最多只会是一种持续的讨价还价和调整。正因为如此，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仍然非常重要。

印度也能在其中扮演角色。印度并不能完全算是一个远东国家，但它当然处在远东地区的边缘。既要让这盘复杂的大棋局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又要摒弃那种源于 20 世纪的天降大任于美国的唯我独尊四处传教的观点，这对我们的外交和商业都是一种挑战。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确实必须考虑。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但我们必须冷静观察。有几件事情，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吸纳了几个亚洲国家，而美国没有被邀请加入，我们必须盯着这件事。

中国联络其他国家的华裔，那可能是个危险。但这样做本身对中国也是个危险，因为它会激发这些国家的反华情绪。他们可能害怕华裔成为他们中间可能的破坏分子，或者引发像西藏那样的直接针对汉族人的骚乱。这是一个复杂的局势，需要中国和美国加以关注。



伊格纳休斯：你们二位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提到，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讲，这是一场“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目前形势下，双方真的会从合作中受益良多。如果双方合作失败，那就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那么问题就变成，美国已经是主导性的超级大国，中国正在崛起，这样两个大国，如何在相关问题上找到相互合作的正确方式呢？

让我举出现在最棘手的地区问题做例子，那就是朝鲜问题。朝鲜是个鲁

莽地追求核道路的国家，它不顾多次警告，而且已经进行过一次核试验。六方会谈中，美国和中国十分努力地寻找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努力至今有多成功？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种努力能否就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高效伙伴向我们透露点什么？作为观察家，我似乎觉得，中国并不愿意太冒险去解决这个问题。兹比格，我错了吗？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你部分错了，至少你的措词错了。我确信，中国人并没有做所有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他们没有与我们一起向朝鲜发出明确的威胁以换取朝鲜的妥协。但事实在于，没有中国人，我们也不可能取得我们现有的进展。即使不能让朝鲜完全妥协，但至少能够让它部分妥协，中国便是获得这种妥协的重要一环。

伊格纳休斯：中国做了什么可能并非立竿见影的事吗？

布热津斯基：他们主要是告诉朝鲜人，到了最后关头，不能指望中国的保护，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朝鲜国内有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们通往世界的贸易窗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人非常有帮助。他们是能够使形势变得不同的人，不像其他人。日本人与我们站在一起，但日本人的对朝杠杆有限。俄罗斯人一路走过来，但并不是很坚定。还是中国人在起关键作用。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完全妥协，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正与一个不可预测的政权打交道，它的态度变化极大。我们现在谈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向韩国发出严重的威胁警告。所以，朝鲜人是一个棘手的客户。但我们和中国人是促使他们作出现有让步的主要力量。

现在，为什么中国这样做？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在他们的邻国出现一场热战。而且很可能是因为，正如布兰特所说，他们感到时间在他们一边。如果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就很可能最终剑指中国，而不是朝向日本和美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长期利益在于确保谈判成果富有建设性并指向和平。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怎样评价六方谈判中的美中合作？

斯考克罗夫特：双方都有演变。我认为，中国与我们一样，不想让朝鲜拥有核能力。10 年前，如果你问中国关于朝鲜的问题，他们会说，两国各自发展，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所以，他们与朝鲜人很少打交道了。而我当时正是这样问的，中国人也正是这样回答的。

布热津斯基：他们还会大笑。

斯考克罗夫特：他们还会说，这不是他们的问题。然后，逐渐地，他们说，他们愿意主办六方会谈，愿意装饰房间，提供茶点。但我们必须进行谈判。但随着我们这一方的立场从政权改变调整为整个战略框架的讨论，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愿意帮忙。对于他们而言，政权改变意味着中朝边界的混乱，那是他们最不想要的事情。现在他们则积极投身于谈判之中。

他们还能做更多吗？当然他们能够，因为他们是朝鲜的生命线，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以及百分百的能源来源。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合作得相当好。朝鲜人就是朝鲜人。我们现在还没找到他们的底线。

他们会认为他们必须拥有核武器以捍卫他们的独立吗？或者他们准备好了拿这些武器交换一个令他们感到更舒服的安全保障吗？我们就快要找到答案了。现在，我们要求朝鲜承认其犯下的所有错误。而他们说“我们不认罪，但我们可以保证以后不再犯。”所以，还有艰难的谈判工作要做。但我们和中国人在朝鲜问题上已经接近于共同的立场了。

伊格纳休斯：我想起了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es），你不断地接近你的目标，但你永远无法到达。朝鲜已经测试核武器了，拥有核武器，拥有大约 30 千克到 40 千克的裂变材料。美国人应当在可预见的未来，调整对朝鲜的观念吗？应当承认它将要拥有一件或几件核武器吗？要求他们放弃核武器，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呢？

斯考克罗夫特：不，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他们所拥有的那种核武器——当然，这很深奥——但是，他们拥有的那种，用的是经过处理后的燃料。那是钚。钚制成的核武器，要比浓缩铀制成的核武器更难控制，更难使之爆炸。制作铀弹相对简单。而钚弹不同。

伊格纳休斯：他们的测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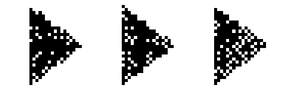
布热津斯基：是的，完全正确。

斯考克罗夫特：所以，他们还不可能十分自信地说，能够制造出有用的核武器。他们自己一定也心存怀疑。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下一届政府是否应考虑完成这项工作，并将这些核武器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下一届政府应当坚持此项努力。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仅是中国人如何与我们合作，还有韩国人如何与我们合作。新的韩国政府比上一届政府更不愿意包容朝鲜。

如果朝韩关系恶化下去，可能很难获得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妥协。但是，当然，下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应当让这个进程继续下去，因为这样的谈判要比其他的选择更好。除非我们准备与朝鲜打一仗，那么我们最好拥有目前这种谈判安排而让他们仍然拥有武器。而由于他们极度不可预测，如果让我们主动去向他们开战，那显然是疯狂之举。那么，核武器可能会成为他们孤注一掷的防卫武器。但如果是他们策划一场主动进攻，那目前这种核武器显然没法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耐心等待要比做任何其他事更富有成果。等待朝鲜可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伊格纳休斯：让我将镜头拉远一点，来谈谈日本，这个亚洲超级经济大

国，正从长期的低迷中恢复过来。你可以说，小布什政府最大的外交成功，是设法同时提升了对华与对日关系。日本人曾经觉得不再被关爱了，觉得被排斥了。他们担心我们如此急于容纳崛起中的中国，而将他们甩开了。现在，他们则对美日关系更有信心。

布兰特，你一直密切关注这一进程。这种努力始于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们在小布什第一任期内将此作为头等大事，而且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延续。今后如何继续这一势头呢？美国能够设法同时保持对华和对日的良好关系，而不使整体结构坍塌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这种势头能够延续，因为我们已经向中国人保证，日本人不是一种威胁，因为美日安全条约表明，日本不会发展军事力量保卫自己防范外部威胁。对于中国人而言，那是一项真正的保障。对于日本人而言，我们给予了他们信心，告诉他们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将伙伴重心移向海峡的另一边，告诉他们，日本是我们在亚洲堡垒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平衡术，我们要想偏向任何一方也都很容易。但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平衡，就不仅能够对中国保证日本不是威胁，也不仅能够告诉日本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站在他们一边，而且还能够给予亚洲其他国家喘息的空间。如果没有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存在与平衡作用，亚洲其他国家就会感觉，他们似乎必须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选择一方。那是他们不愿意去作的一个选择。

这种平衡是小心翼翼维持住的。这种平衡的一部分可能是在冷战结束末期偶然形成的。但是，它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平衡体系，它现在运作得很好。我没有看到任何使之停止的理由。安全联盟对中国和日本都非常非常重要。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至少已经写了两本书，书中都提到你担心我们对日本的关注不够。你担心我们放任日本游离。你现在仍然有这种担心吗？

布热津斯基：没有了，我认为这种状况近几年来已经改变。在这届政府执政期内，已经出现了一种美日联合捍卫全球安全的新苗头，这一举措弥补

了此前的一些过失。我非常赞同布兰特刚才所说的观点，我们不需要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选择一方作为我们在远东的主要支点。

中国很明显是我们最重要的亚洲大陆的伙伴。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太平洋伙伴。日本在国际安全方面与我们的联系更紧密一些，但它在安全活动方面十分小心地扩张，并没有心急冒进。中国人开始做同样的事情。现在，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非洲行动和其他地方的行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我看来，从历史角度来讲，确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中国和日本都在避免 20 世纪欧洲列强自我毁灭的那种以军事竞赛形式进行的政治竞争，因为这样的竞争最终只会走向冲突。

中国现在拥有核能力已经有 44 年了。到今天，它只实施了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我们有几千件核武器对准中国。而它只有一点核武器对准我们，可能还在私下里有核武器对准日本。

中国人同时也忍受了日本小心翼翼保持模糊的军事姿态。从常规力量上看，日本人已经有一定限度的军事能力，而且日本也是一个半地下的核大国，因为他们有能力在最短时间内将核能武器化，他们也已经拥有核运输系统和导航系统。

所以中日两大国都在聪明地相互应对，互相确保安全，同时小心地避免相互直接冲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与中国发展亚洲大陆型的伙伴关系，而与日本进一步发展更加全球化的伙伴关系。这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开始修改国际体系中的某些安排，以使中日两国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承认：中国获得一系列经济和金融组织中更多的投票权和领导权；日本最大的希望是进入安理会。

这里有一个主要问题仍处在未解决的阶段，这就是中俄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我们对华关系恶化，那么复兴旧“中苏联盟”的动力将必然增多。我个人认为，这在表面上来看不太可能。但另一种可能性却需要我们仔细思考，那就是，中俄关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会保持稳定吗？看一看中俄边界，人口和自然资源的需求都表明，世界上这一部分的地图显然很不自然。在边界的一边，是大面积的空地，几乎和空地以外的亚洲一样大，却只有 3 500 万人居住。而边界的另一边，亚洲的其余部分，却住着 35 亿人，其中 15 亿

人正在迅速扩张，更富有、更有钱、更有力量、更现代化。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吗？

伊格纳休斯：不过，俄罗斯可以成为亚洲的沙特阿拉伯。他们能够卖能源，驱动30亿辆汽车。

布热津斯基：但如果像某些石油公司所担心的那样，能源在20年内消耗完了呢？

伊格纳休斯：那会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世界。

我对你们二位谈论亚洲的言论印象深刻，你们分别描述了一种美国政策，用布兰特的话说，是开放的政策和一个开放的世界。用兹比格的概述则是，我们在安全方面努力避免过紧的联系。我们努力避免像"不是日本，就是中国"的单边选择。我对此印象深刻，因为它与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在中东，我们总是在作单边选择，而一个公开的体系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忍受的。

布热津斯基：这不是偶然的。

伊格纳休斯：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维持这种开放性，维持这种你们二位所说的，已经十分成功的对亚洲的政策？

布热津斯基：哦，让我跳开一点儿说，因为你这里触及一个软肋。远东最神奇的一件事，在于我们有能力按照国家利益的宏观分析来界定我们的政策。而在中东，我们的政策受制于国内压力集团和政治分歧。看看这种政策让今天我们在中东所遇到的麻烦。

伊格纳休斯：对，不过台湾也是一个有着非常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的外部力量，台湾游说集团曾经非常努力地要将其喜好强加给美国政府。

布热津斯基： 它还不够强大。

伊格纳休斯： 而且它失败了。

布热津斯基： 是的，完全正确。

伊格纳休斯： 但不是因为它没有努力。

布热津斯基： 如果美国出现一支庞大的中国院外游说集团，不是代表台湾而是代表大陆，那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件。出于某种原因，日本游说集团似乎并没有形成。但目前已经有潜在的中国游说集团。而且，巧合的是，还有一个力量不断增长的俄罗斯游说集团，目前这个集团的运作基础不是选举权，而是完全依赖金钱的力量。

伊格纳休斯： 布兰特，你对我们维持在亚洲的开放体系持乐观态度吗？

斯考克罗夫特： 是的，我持乐观态度。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和日本，不过亚洲还有其他参与者。东盟就很珍视其独立地位以及它与其他国家谈判的能力。再远一点儿向南有澳大利亚，这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向西有印度，这是东亚政治的新的参与者。但所有这些参与者，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都愿意维持一种开放和灵活的相互关系。

它们相互之间也有许多疑虑。但同样，这些疑虑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得到了缓解，因为在亚洲，不像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不是被视为只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目标。我们是一支地区稳定力量。我认为，这样的状态才是整个世界未来的方向，我们应当摒弃过去那种狭隘的支持或反对特定国家的联盟。

布热津斯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我看来，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亚洲，我们有占主导地位的三个大国的互动，美国、

日本和中国。尤其可贵的是，三国都有一种稳定化的趋向。如果你回顾一下我们前几章所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称之为“全球巴尔干”的那个地区内，美国扮演的却是不稳定的角色。印度整天想着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即使它并不想主动地引发混乱，它也必然没有余力去维持地区稳定。还有伊朗，这是一种不安分的力量。整个地区的形势完全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远东太平洋地区，总体而言，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能够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而其他行为体能够与我们互动。世界的其他部分为潜在的全球冲突埋下导火索。而如果我们在亚洲也犯下同样的大错，那么我们将会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这多少有点像我们已经在伊拉克所付出的那样。

伊格纳休斯：我们假设中国人将会按照我们的方向改变，变得更加民主。但世界上许多人仍然会看着中国，评论说，这里还是有许多威权主义。俄罗斯拥抱民主，却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在叶利钦统治下的混乱和经济灾难，全世界都不想要那一幕再现。而我去伊朗旅行的时候，我发现伊朗人说：“我们想要稳定，我们想要经济发展。”这里有一种对民主的怀疑。如果全世界说：“我们认为一定剂量的威权主义有好处”，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斯考克罗夫特：我并不担心那种危险。首先，我认为，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因为经济发展而转变成独裁。如果你看天今天中国的发展，毫无疑问，他们有强大的威权政府，他们在经济现代化上做得很好。

俄罗斯首先进行政治体制现代化，使自己变得民主，结果是他们没有足够的中央权力去促成经济转型。印度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印度正成为全球经济动力，但他们这样做其实违背了他们自己的信仰。早期，许多印度统治阶级精英在英格兰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他们都有一种社会主义倾向。所以，印度政府至今仍然持有一些残存的对企业精神的怀疑。但是，他们做得相当好。而中国模式，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布热津斯基：那是一个重要论点。我对于那些想要模仿中国模式的国家，并没有感到特别不安。如果人们看看所有自上而下在高度威权的环境中进行

经济发展的国家的集体经验，那么有一点一定会令人印象深刻，经济发展成功，必然会创造出民主化的压力。看一看韩国的经验。直到 20 年前，它才能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它的经济成功为其建立民主铺平了道路。

换个方式来看，这甚至也是日本的经验。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它为战后我们在日本的作为创造了前提条件，然后又制造出了当今日本宪法规定的民主。

台湾也始于一种威权体制，事实上，它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大同小异。政府大力提倡农村地区的自由企业、小规模商业，然后是自由化。经济发展起步，民主随之而来。

看看中国自身。如何不经历大型动荡而使体制民主化，这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大挑战。你不能过多地挤压它，但你也不能一下子太放松。我不知道中国是否能够避免震荡，但毫无疑问，目前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当然会提高民主化的压力。而在当今互动的时代中，我认为，压力也很可能由于外部力量而增强。

伊格纳休斯：你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还有许多以羡慕的眼光看待中国成功的其他国家，在自由和秩序之间选择了不同的平衡方式，那么，美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会觉得舒心吗？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中国人更加重视秩序。

斯考克罗夫特：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代表了什么方向呢？我想说的是，它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你可以想想任何此类模式。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模式。津巴布韦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模式。各个国家和文化都在寻找它们自己的方式，并利用它们特殊的智慧。

伊格纳休斯：那么我们是否不应当将这种更倾向于权威和秩序的中国模式视作对我们的威胁？或者，这个模式是否可能将全球的期待从我们所乐于看到的方向转移走呢？

布热津斯基：嗯，如果一些国家选择中国的模式，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效仿中国的国家，就必然会比那些效仿美国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我认为这不可能。

许多国家的选择并不是非极权即民主。而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之下的稳定发展与完全破坏经济的混乱式自由之间的选择。而我并不确定后者就是好的选择。

看看埃及及其治理下的人口，还有穆斯林兄弟会。如果埃及现在一头扎进美国式的民主中去，它在政治上还会稳定吗？它在经济上还会稳定吗？

伊格纳休斯：我认为，任何了解埃及的人都会说不，它会出现混乱。几年前，我读过一篇很棒的论文叫作《尼罗河的水政治》，里面提到一个基于每年河水涨潮灌溉的社会，必须极度有序，它需要中央权威，而我们正在推动建立的社会模式，却是一个本应建在拥有无边旷野和可耕地基础上的社会模式，与埃及现有状况正相反。所以，我确信，埃及不会像美国这样。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可能酿成大错的行事方式之一，就是想要去发展民主社区的概念，将世界人为地划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这会比国际政治的自然发展方式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我认为，那也是非常危险的方向。

伊格纳休斯：但是，布兰特，那不正是小布什政府正在执行的路线吗？他的一些关于民主的言论让威尔逊主义听起来好像很荒谬。而且他好像是在将我们特定的美国式民主全球化。我估计，你们二位可能都对这类词令十分反感，正像布兰特所说的，将世界划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这是一个错误。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世界讲清楚，我们相信民主是前进的方向，我们准备去帮助任何想要朝那个方向走的国家。但我们不应当强加于人。我们应当鼓励这种趋势，帮助那些想要效仿我们民主制度精华的其他

国家。

我们曾经努力想要出口美国式的民主，有时也很成功。在菲律宾，就是成功的。在伊拉克，目前为止，显然不成功。而民主曾经是我们进入伊拉克的一个高调的理由。我认为，我们应当站在民主一边捍卫它。我们不应将民主强加于人。

伊格纳休斯：中国人确实与我们共享着更加开放的梦想。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对双方非常重要。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认为，如果你作出不同的选择，你是否有可能打击共产主义体系致其无法复原呢？我们说不定能够看到在苏联和东欧见到的那种转变呢？

斯考克罗夫特：不，我认为那样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在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我们给予支持的渐进演变。它演变的速度是渐进的，因而不会招致苏联的镇压。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这些孩子们在政府的镇压下走上街头时，你会怎样做？

布热津斯基：我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视我所见的走上街头的人们。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亲民主运动成功的关键，只是一个词，一个全世界周知的词。

这个词就是团结。波兰反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工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大学里的孩子们走上街头。大学里的孩子们已经有许多次走上街头。1968年在墨西哥城，他们被镇压下来。但社会的其他部分在哪儿呢？有些人持同情态度，有些人漠不关心，有些人持敌对态度。

波兰民主运动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精诚团结。他们所

有人都洋溢着民主理念，他们使这种理念本土化。他们下决心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想要和平转变，而这种和平的转变，又以其他的形式，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或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重现。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民主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仅仅依靠相对封闭的社会力量，民主就不可能被机制化。它必须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很明显，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人们完全不在一个知识水平上。瓦文萨（Lech Walesa）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直观的领袖。但同时也有像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教授这样的老于世故、精通民主的人。

这就是民主如何在和平中诞生。但我也会仔细看待整个事件，看看工人和农民是否也参与到抗议人群中来。他们是否有能够引领他们建立民主的统一理念？

伊格纳休斯：考量民主运动是否可能成功的标志之一，是在运动发起时军队是否准备好开枪。

布热津斯基：军队瞄准谁，总是很关键。

伊格纳休斯：军队瞄准谁，总是很关键。如果军队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社会力量在抗议，它就会开枪。

布热津斯基：尤其是，如果这只是享受特权的一小部分。

伊格纳休斯：但有许多案例表明，那些成功进行了团结革命的国家，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军队被要求开火，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布热津斯基：完全正确。而且我认为，他们正在向全社会开火，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军队来自全体人民，他们不会愿意攻击全体人民。

斯考克罗夫特：它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成熟度。

▶▶▶

伊格纳休斯：我们还没怎么讨论印度，通常外交政策的讨论都会忽略印度。这个庞大的、日益富裕的民主国家，位于南亚的心脏地带，通常美国在外交审视时都会忽略它。我们担心中东，我们担心中国和日本，我们通常忘了印度。

小布什政府已经非常努力地想要与印度建立一种战略关系，真正包容一个核大国印度，事实上是使印度的核武器计划成为《核不扩散条约》的例外。你们二位认为，这种做法是否明智？你们认为这种做法成功吗？

令我吃惊的是，直到我们现在谈论的时候，印度人，仍然没能同意这项交易。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一项交易。但他们民族主义性格中的某些东西使他们不愿意做这项交易。兹比格，为什么会是这样？印度怎么了？

布热津斯基：哦，印度人是非常难伺候的客户。他们这个样子已经 50 年了。他们在冷战中一点帮助都没有。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中也没有帮助。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多大帮助，因为他们现在显然对于减少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影响感兴趣。而那会驱使巴基斯坦人采取更莽撞的行动。所以那是令人担心的。

另外，我对我们与印度达成的核协议感到很不舒服。我认为，我们正在使所谓有核扩散优先权以及有选择的核扩散合法化。将印度的 14 个核反应堆排除在国家控制之外，损害了我们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可信度。

这 14 个反应堆正在制造武器。将这些反应堆排除在国际控制之外，传递出一种潜在的重要信息，这甚至会破坏远东的军事平衡。如果印度人大幅提升他们的核武器库，那么中国人还会遵守他们最低核威慑的姿态吗？我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举措的战略后果。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小布什政府将此视为一项真正的突破性协议。

布热津斯基： 但为什么呢？

斯考克罗夫特： 他们确实这样认为。

伊格纳休斯：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与一个正在上升的实行民主制度的亚洲经济大国结成战略联盟的机会。

布热津斯基： 去对抗谁呢？

伊格纳休斯： 它不针对任何人。这又是一场"正和游戏"。它的前提是，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进行共同的事业，排除相互的分歧。你们认为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兹比格对此表示怀疑。

斯考克罗夫特： 我认为它没有成功。它最多算是个不成熟的举措。我不知道，在这个情绪化的对印决策的背后，还有什么深思熟虑。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不再支持印度，所以印度人对我们来说可以利用。也许还要考虑到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力量予以制衡。我不知道。不过，很明显，我们非常热情地拥抱印度。结果是，这对巴基斯坦有副作用。我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布热津斯基： 这也会给人以反穆斯林的感觉，尤其是那些本来就相信美国是反穆斯林的人，更会有这样的感觉。

斯考克罗夫特： 我不知道。确实可能。我被它迷惑住了。但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他们明显感到，他们需要俄罗斯之外的伙伴。但他们没有完全欢迎这样一种亲密关系，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印度人不想成为美国巨浪之上漂浮的一只小船，因为他们的另一种选择，是领导发展中国家。而正如我们已经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看到的那样，他们正在相当认真地履行这种领导角色。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了这种变化的局势。我自己的感觉是，这项核协议被搁置是件好事。我认为，它至少是不成熟的。但印度发生的事件，可能会

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

伊格纳休斯：你们二位都认为印度大体上是一种温和的力量吗？我们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有些人认为，我们看错了地方。真正将逐步主导技术领域，并将真正与我们竞争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你们认为，印度增长的传奇，会有其恶意的一面吗？

布热津斯基：可能有其脆弱性，而不是恶意的现实。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欺骗性的成功。印度的社会不平等比中国还要严重得多。较低阶层人口的贫穷，也比中国更严重。那是印度仍然需要克服的。印度在建设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都市，甚至在建设交通体系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国。

第二个方面是文盲率，印度女性中的文盲率远远高于中国，大约是50%。印度男性略低一些，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成为科技先锋的国家，这个数字仍然偏高。

而且还有第三个方面，这也与中国不同，而且也是印度的劣势。中国90%的人口是汉族。印度的民族非常多元化，有1.8亿穆斯林。我认为，印度的穆斯林比巴基斯坦还要多。

想想如果大众受到教育并在政治上动员起来，那会发生什么。当然那还没有发生。整个体制运转的基础，是几个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留传下来的统治政党，这些政党有民主的传统，但大众的方向相对来说容易摆布。一旦大众开始被他们的个人或集体偏好、民族好恶、宗教感情以及社会憎恨所驱动，印度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

▶▶▶

伊格纳休斯：让我们转向我们曾经为东亚的暗色涂抹上明亮而乐观色彩的领域吧。我的论点基于简单的经济学。正在上升的中国和已经上升而且非常强大的日本都越来越多地支撑着美国人的消费。我们的花费已经远远超出

我们的生产。中国人和日本人正在不断地写支票，覆盖我们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而且两国已经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如果中国决定他们必须在某些事务上与我们发生根本冲突，那将使我们非常脆弱。

我们的债务达到 1 万亿美元，他们则处在可以动用某种杠杆的位置上。随着美国经济进入非常困难的年份，我确实怀疑，美国人是否会以负面的方式意识到我们对这些东亚经济大国的负债已经多么严重？而在我们摆脱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势，作出调整重新走向某种平衡之时，会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摩擦呢？

不久以前，美国人还在密歇根州的城镇里砸日本汽车，因为大型的汽车工业面临着国外的竞争。美国人对欠债以及对中国超级经济力量的依赖而产生的愤怒，这会成为很大的令人痛苦的问题，我们是否正走向这样一个时代呢？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太认为那会发生，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人固然拥有超过 1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他们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对美武器使用，那就必然会毁掉他们自己的财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而使中美成为伙伴。我们互相依赖。

其次，国际商业正从我们砸日本车的垂直模式，转向一种所谓水平模式。日本车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制造，这根本没有什么美国车或日本车的概念。

我们也用恐惧的心态看待主权基金，但在某种方式上，主权基金是一种方式，能够令世界经济重新找回平衡而不至于走向更深的衰退灾难。主权基金使得世界经济呈流动状态。我不确信我们是否理解如何与这些新的力量打交道，但对我而言，它们是令世界稳定的力量，能够抹平国家经济中的波动。不过，我可不是个经济学家。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美国对于日益负债以及日益依赖东亚的反应，在你看来，有何危险之处？这会不会在国内引发强烈的反对？

布热津斯基：我想会的。在象征层面上，局势甚至会更糟，因为我们正

在向亚洲人借钱来打伊拉克战争。这是我们第一场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来打的战争，而不是花我们自己的钱。

斯考克罗夫特：这是第二场了。

布热津斯基：第二场？那第一场是？

斯考克罗夫特：第一场是海湾战争。

伊格纳休斯：哦，当时我们并没有借钱啊。他们直接给支票。

斯考克罗夫特：他们捐钱。

布热津斯基：你们这些家伙很聪明。

伊格纳休斯：你们让我们的盟友为打仗出钱。

布热津斯基：你们创造了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他们是参与者。现在在伊拉克，我们却是孤军作战。但未来如何主要取决于下一任总统如何出牌。我认为，下一任总统的重要职责之一，就在于必须教育民众认知新的全球形势。

我的感觉是，美国公众正生活在某种虚幻之中。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金融、经济和政治关系都在变化，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对于与远东关系，特别是对华和对日关系有多么依赖。我能理解工人们的愤怒，他们丢了工作，因为有外国竞争者。但那种愤怒真的不是反亚洲的。在某个时期，它还表现出反墨西哥的倾向。

但是，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怒火，部分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没能让这个国家为这些变化作好准备，同时也没真正努力去制订计划，去提升劳工技能以使之从事新的职业，更没有通过这些计划来应对全球变化给我们社会的

某些部分所带来的后果。换句话说，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科技创新的社会后果，也没有真正去思考如何让科技来捍卫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

而这些都是下一任总统必须真正行使总统力量的所在。今天，美国理论上的全球盟友是欧洲和几个远东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还有几个小国。但欧洲同时也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中、日、韩则正在经济上成为全球的动力。新的韩国总统已经公开地谈论韩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是一个有 5 000 万左右人口的国家，它确实正在变得重要起来。我们现在与韩国人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议。这很重要，因为这样的关系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国内情绪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很容易被恐惧和无知所主宰。所以，这正是需要领导力的地方。

斯考克罗夫特：我必须说，目前没有什么富有建设性的领导力，举个例子来说，国内对于美国当前困难的反应，主要就是要求对中国人的商品征税。那只会加剧问题。

伊格纳休斯：如果美国不改变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同时又迁怒于那些帮美国走出债务危机的国家，那这种状况就是不可持续的。

斯考克罗夫特：这就是我的意思。兹比格谈到教育美国人民，那是现实的必需。对于当前形势，政府并没有努力让民众去了解。

伊格纳休斯：让我们转向我们开始的主题，以中国崛起为主导的亚洲崛起带来的后果。如果说，对于这种格局演变的调整对应措施，将必然改变美国，这种说法是否公平？我们是否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人们有时会简单地预测，未来人们都说汉语。那可能有点夸张，但它是一种未来，我们的地位将必然会有一些不同，是这样吗，兹比格？

布热津斯基：是的，但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能力作出回应。我们从一个工业前沿、工业创新、工业主导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我

们的转型非常成功。我认为，下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成为科技前沿。我们能否将经济的基础建立在创造和革新之上？如果我们能这样做，我们就能够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就会逐渐变成英国在撒切尔所鼓励的创新高潮到来之前的样子。反之，我们将成为一个逐渐颓废的工业荒地。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兹比格已经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它今后还会更加地相互依赖。我们必须将自身的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我们将在某些事务上更多地依赖其他国家。我们国家的特殊技能，则是将科技转化成生产的能力。正如兹比格所说，创新能力。现在，我们正努力自我消化，并施加出口控制。我们认为，我们是一切的中心，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保持领先。我认为，如果我们释放出我们的能量，那我们拥有创造理念，并将理念转化成实际产品的优势就正是我们的长处。

布热津斯基：而且，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在互动时代，仇外是一种封闭落后的精神现象。

伊格纳休斯：你的意思是？

布热津斯基：缺乏创新精神的人，会制造有缺陷的汽车，会因此无法与制造优良汽车的人竞争，会躲在指责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的幌子底下。如果你在同一领域内做得不如其他人，你就想办法在其他领域超越。如果我们真的想做第一，那我们在这方面强调得还不够。

伊格纳休斯：我又一次被我们亚洲讨论中不断浮现的主题所震撼，那就是对开放的需求，开放也是对我们灵活而柔软的应对方式的需求。布兰特，今后几年中，一大堆麻烦事会转而在国内孵化增长，而且整个国家也会倍感压力，在这样的混乱情况下，你能否确信有一种政治领导力能够让美国人民变得柔软、灵活、开放呢？人们当然首先会有一种冲动，会去追究应该谴责

谁。我们的领袖们如何帮助我们维持这种基本的灵活性呢？

斯考克罗夫特：我从来不认为美国完蛋了或者我们成了一种下降中的力量。我们仍然充满活力，饱含乐观，但领导力是关键。目前的争论集中在细枝末节，而没有关注主要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全面而且更加深思熟虑的讨论，就像我们前面谈论的那样。世界上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如何应对它，如何超越它，如何与之合作，而不是抗拒它，或者假装它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深层次的大讨论还没有出现。

我相信，美国人能够作出反应。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但我们必须站出来，做一些必须做的事，去帮助那些科技和经济发展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有这样做的资源，而且我们能够保持领导地位。但如果我们不去迎接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努力通过关税和其他限制性手段去阻止变化到来，那么我们自己就会落后。

布热津斯基：对我们而言，20 世纪的欧洲已经向我们提出过战争与和平的大挑战，是那正是我们当时必须集中精力应对的。对我们而言，21 世纪的亚洲向我们提出了竞争还是衰退的大挑战。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挑战，而且我认为，布兰特和我都同意，我们与中国之间不会发生类似 20 世纪的那种军事冲突。但是，问题仍然相当复杂，但他们在本质上又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在应对亚洲挑战方面足够聪明，我们就完全能够做好。但如果我们缩在仇外主义的龟壳中，用栅栏简单地罩住自己的恐惧，我们将必输无疑。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在最近的一本书《第二次机会》中写到，这个世界正经历着你所称的全球觉醒，而你害怕美国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够聪明，不够先进。这样的状况大多发生在亚洲，那里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机会和梦想都大幅提升。你还表达了对我们的教育体制以及我们的领导人对民众谈话方式的担心，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已经开始落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直接说，在某些方面，美国人必须提高他们的技能。他们还没准备好，但他们必须去迎接一个变化的充满挑战性的世界。

布热津斯基：这里有一个悖论。我们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具有全球性的国家，但是，我们却拥有全球视野最狭隘的公众。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很自信，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给自足，部分原因在于直到“9·11”事件之前，我们还没有被其他国家侵略过。

结果就是，我认为美国人对于电视剧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世界大事的敏感度。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如果我们对于什么是外部世界的挑战一头雾水，我们怎么能够针对外部挑战作出相应的内部改革呢？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对于美国民众的感觉怎样呢？先不谈领导者，我们的民众真的能够应对挑战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要说这话为时尚早，但现在看来，并不乐观。我们过安逸日子的时间太久了，除了在重大危机时刻，普通美国人根本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现在并没有重大的危机，普通美国人更担心他所在的城市和州，而不太关注华盛顿发生了什么，更不会去关注美国以外的世界。

许多美国人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一个外国人，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一个与美国人想法不一致的人。我们以为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思考。那使得我们用一种聪明的方式去应对这个新鲜的世界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正在被源自于其他地方的多重浪潮吞没。

伊格纳休斯：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我对美国人能够多元化生存，而且能够真正利用多元化的能力印象深刻。即使我们称之为巨大成功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会在使外国人感到受欢迎的方面遭遇巨大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美国人所擅长的。

而且，尽管我们提到了一些悲观的理由，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向多元化开放，保持那种使得其他人都能聚集于此寻找机会而不觉排斥的能力，我觉得我们就必然能够作出反应和改变。你会有同样的感受吗，兹比格？

布热津斯基：是的，希望如此。但是，这只是一种希望。美国的许多人倾向于驱逐1 100万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因为这些人是非法入境的。即使他们中许多人到美国已经许多年，已经有了孩子。而且，还有所有那些关于外国人、科学家、学生等人员入境的限制，那些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智力投资与创新能力？大规模的美国创新的高潮，主要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欧洲知识分子移民来到美国。

伊格纳休斯：你去过硅谷。看一看帕罗奥多或圣何塞有多少印度裔美国人。

布热津斯基：一点儿没错。

伊格纳休斯：还有华裔美国人，越南裔美国人，在美国致富。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是在美国发大财。

布热津斯基：我们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持续。而且，如果它能够持续下去，是的，它将成为美国跟上来自东亚经济竞争的步伐，保持领先的关键。但我们必须愿意让这些人感到他们是美国的一部分。而且那不应当只是在硅谷这样的层面实现，而且应当在这个国家日益受到攻击的贫困的拉美裔层面上也得到实现。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的历史就是一种多元化的历史。我们是由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会聚而来，美国总是能够容纳他们。所以，举个例子，我们不太会像欧洲人那样斜着眼睛看待不同肤色或有着不同口音的人。

如果你在法国、德国、荷兰，你就会发现异质人群很难融入其中。因为每个你认识的人在文化或种族感上都与你一样。我们在这方面就会随和很多。但现在，我们却提高了警惕，几乎形成了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这在我们的传统上是没有的。

你能在我们的签证体系中看出来。你能在我们对待移民的态度中看出来。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不让其他人进来。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大体上来说，我们还并不像大多数文化那样陷在精致的种族中心主义中不能自拔。

布热津斯基：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让一个像我这样拥有一个怪异名字的人，与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上。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美国对像我这样的人有多么好。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第五章

没有天然疆界的国家

戴维·伊格纳休斯：当我们想到俄罗斯，我们有时会忘记我们正在与一个新国家打交道，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国家，但它骄傲易怒，它努力想弄清楚自己的政府怎样才能运作得更好，以及它与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想在开始这场关于新俄罗斯的讨论之时，请你们二位分别谈一谈俄罗斯是如何建立的。就像其他每个国家一样，它受制于它创建时的国际环境。你们二位都是在长期冷战斗争中诱导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

布兰特，让我请你先开始，因为你在苏联消失以及俄罗斯诞生的时候正在白宫。告诉我们你对这个国家如何形成的一些看法。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当老布什上台时，东欧正出现一种狂热，我们评估了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过去，在铁幕落下之后，每次东欧的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出现示威，苏联都会冲进来镇压运动，射杀异见人士，施以铁腕统治。过一段时间，骚乱又会再次出现。1953 年在德国发生，1956 年是在匈牙利，1968 年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而这时又开始发生了。

我们决定改变传统的美国对东欧政策。美国一直鼓励卫星国给苏联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所以罗马尼亚和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就位于美国的“好名单”之首。而我们却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应当是从内部鼓励运动本身，扩大政治体系，并使之更开放。所以齐奥塞斯库从我们的名单之首降至名单之尾，波兰则升至首位。我们从波兰团结工会的所作所为之中看到了真正的可能性。

我们十分注重方式，尽量不引发东欧新一轮起义和镇压的恶性循环。我

们想要向自由化迈进一步，但是仍然保持在苏联的容忍度之内。当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个速度该是多快。但我们努力避免招致苏联镇压，避免引发苏联内部动荡，以免强硬派因为戈尔巴乔夫不够强硬而推翻他。

那就是我们的政策。当然这并没有完全回答你关于新俄罗斯如何诞生的问题，但我们对待演变的态度就是，我们想要呵护东欧的自由主义，鼓励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和新思维。我们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努力培养东欧的同类领导人，而我们则鼓励这个进程。

伊格纳休斯：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戈尔巴乔夫的年代，克格勃意识到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多么虚弱，他们曾经想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小型的起义，以颠覆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官僚体制。他们感到，除非发生某种内部的革命，否则他们就会有大麻烦。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将新思维视作导向民主之路，而是视为一种提高苏联效率和有效性的方法。从勃列日涅夫开始，苏联经历了一系列年老多病的领导人，它已经停滞了好多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将他自己看作是重新振兴体制，而不是要推翻体制的人。重新振兴体制的方法之一，就是去除恐怖政治和镇压的负担。问题在于，他不能让苏联共产党同意他想要做的事，所以他就威胁说要举行党内选举以清除那些坏家伙。那就是整个崩溃的开始。戈尔巴乔夫种下了令他自己毁灭的种子，而他在自我毁灭过程中的应对方式，则同时种了下整个苏联灭亡的种子。

伊格纳休斯：当你开始在老布什的任期内工作时，你曾经想象过，你会看到苏联这个共和国联盟的终结吗？

斯考克罗夫特：没有想象过，我真的没有想过。当我上任的时候，我就忙于做一件事，就是打消过度的期望所带来的危险。因为我第一次进入白宫是在美苏关系缓和时期。我认为，我们愚弄了自己，以为这种缓和能够在根本上改变国际形势。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极佳的战术运作。到兹比格进入

白宫的时候，苏联则大谈特谈，世界力量的演变正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而我就想，这一次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被自己的舆论迷惑住。所以我对戈尔巴乔夫非常强硬。他谈得很好，但在老布什上任之时，却没有相应的实实在在的措施来暗示冷战的终结。对我而言，冷战从根本上来说是集中在东欧，而苏联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控制的力量仍然在那里。

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当时就认为这个体制会倒台吗？最终，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当时？不，没有。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也许因为你的波兰裔背景，我有一种感觉，几十年来，当人们嘲笑那些关于苏联力量卷土重来的言论时，你却相信这是可能的。我还记得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你谈话，讲到苏联内部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们希望不留在苏联而是成为真正的国家的那种感情。而且我有一种感觉，你从来都认为苏联帝国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对此你一直信心百倍。你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苏联解体真的要发生，而美国或许可以诱导其发生呢？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写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内容是关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帝国主义。我的论文的观点是，以苏联名义统治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帝国，它的历史包括 400 年的领土扩张，到 1945 年达到其顶峰，这个帝国的疆界从易北河一直到堪察加半岛。

但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我感到，帝国不会持久，而且，其中有一点自相矛盾。苏联推翻了一个建在莫斯科的王朝帝国，代之以一个争端迭出的民族国家邦联，其口号是形式上民族主义，实质上社会主义，但是，苏联这样做，其实是在鼓励非俄罗斯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更大范围的苏联集团中，当曾经有过独立历史的国家被迫屈服时，这就更加明显了。我曾经表示，在民族主义时代的某个阶段，苏联将会有一场危机。在苏联 1968 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我于是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耗尽，民族感情变得越

来越强烈，这应当是我们政策的指导。

布兰特说在老布什任期内，美国的传统关注点被改变了，而在他就职之前，齐奥塞斯库曾经是美国青睐的对象。我多少对这一观点有些不太认同。里根时期可能如此，但在卡特和我在白宫的时期显然不是。早在卡特政府初期，我们就作了详细的决策，支持那些尽管仍然忠于苏联，但其内部正在进行自由化的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或匈牙利，还有那些反对苏联统治的国家，比如铁托的南斯拉夫或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

我们并不青睐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缓和的大背景下，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我们希望将缓和视为一种能够促进苏联解体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安排。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原因。团结工会并不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兴起的，而是在 70 年代后期。它确实动摇了苏联集团的完整性，因为它瓦解了波兰共产主义，然后又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复制出同样的结局，导致东德的孤立和柏林墙的倒塌。

对我而言，那段历史简而言之就是，整个过程代表了某种定义俄罗斯 400 年的东西终结了，从一个明确的中心向外进行创造多民族国家的帝国式扩张终结了。随后，突然之间，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布兰特在白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其疆界和民族定性都非常模糊，全都需要理清。那将带我们进入普京所面对的困境，带到现在。

▶▶▶

伊格纳休斯：让我们转而谈谈现在。布兰特，我想请你透过俄罗斯人的眼睛看一看这个新俄罗斯的诞生。我们美国人将其视作我们的外交政策和价值观的一大胜利，就像里根所说“邪恶帝国”的终结。但在俄罗斯人眼中，却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在羞辱与解体中重建的国家。请就这个国家诞生的过程以及俄罗斯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俄罗斯领导人如何制定他们的外交政策谈两句。

斯考克罗夫特：假如，苏共政治局没有推出戈尔巴乔夫，而是又推出一个勃列日涅夫，那么这些事件不会以同样的时间顺序出现。苏联将会继续。最终它可能在政治上、种族上和经济上都无法支持。但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行事风格与整个苏联的解体的时机有很大关系。

布热津斯基：他是一个加速器。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绝对如此。而且，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竞选总统时，他只得到 1%的选票。他是俄罗斯最受憎恨的人之一。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了我们俄罗斯人对这场转型的看法。

伊格纳休斯：为什么他们会恨他？俄罗斯人有什么感受？

斯考克罗夫特：因为他摧毁了俄罗斯的荣耀。

布热津斯基：这是一种建立在帝国理念、帝国传统和帝国骄傲基础之上的荣耀。

斯考克罗夫特：然后就来了叶利钦。我不知道叶利钦算不算一个小民主派。他是一个民粹派，把握着运动的脉搏，他主导了这场运动。他不是一个经理人，也不是一个治理者。在政治上，他简单地告诉省级政府，去享用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掌握的权力。

他解体了国家经济，放开经济控制，这样寡头统治集团得以用最廉价的成本发家。我想，普京一定对此非常震惊。无论普京的动机如何，他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人物，他努力将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力量收回并聚集起来，保留了他能保留的苏联时期的残余。可能他的动机是重建苏联，不过我也不知道。我怀疑这并非他的动机。但他确实想使俄罗斯的权力归于中央。

我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我想对于普京而言也是一样的，整个过程是一场巨大的羞辱。老布什总统就特别想避免那种“我们赢

了冷战，苏联输了冷战”的概念。

伊格纳休斯： 老布什，也就是你的老板。

斯考克罗夫特： 老布什不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综合征卷土重来。所以他说的是，每个人都在冷战的结束中获胜了。当柏林墙倒塌时，人们批评他没有亲自前往柏林并在废墟上庆祝。

伊格纳休斯： 还有著名的“懦弱的基辅（Chicken Kiev)”演讲，人们认为他不够强硬。

斯考克罗夫特： 那次事件完全是你们媒体人掀起的。那次演讲并非是关于乌克兰留在苏联。它讲的是，乌克兰自身不要再分裂成几个部分，不要像南斯拉夫那样。这是对于分裂的一项警告，所以他才会在基辅演讲，而不是在莫斯科。

伊格纳休斯： 兹比格，当我与俄罗斯人谈话时，他们通常会表达一种感觉，认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想利用俄罗斯的虚弱占便宜。正如布兰特所说，那时，俄罗斯正处在混乱之中，再加上一个弱势的总统，正准备分散权力，把莫斯科的权力下放到省级政府和寡头手里。他们感到我们在后面推动，因为我们可以在俄罗斯虚弱的时候攫取好处。而俄罗斯人似乎仍然对此感到愤怒。你认为这种论点有其合理性吗？我们当时确实利用了他们的虚弱吗？

布热津斯基： 我认为，我们没有故意那样做。尽管事件的发展，随着整个过程的展开，确实可以被俄罗斯人这样解读，但首先，我要用更宏观的观点讲一讲叶利钦的历史地位。别忘了苏联解体，权力分化都是高度动态、不可预测的过程，任何节点上都有全盘倒退的可能性。

但是，当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主要是由有军队和苏共官僚支持的秘密警察发动的。谁阻止了这场政变的成功？不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

的地位有一点儿模糊。他拒绝退位，但他真的无能为力。是叶利钦阻止了这场政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叶利钦拯救了整个转型过程，使得这个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的倒退，也没有出现可能的大规模暴力。

伊格纳休斯：你认为旧的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很可能被逆转，而旧势力会重新掌权吗？

布热津斯基：由于那场政变的企图失败了，事后人们很容易说成它必然会失败。但事实上，有几天，在莫斯科以及许多其他仍然属于苏联的地方，人们都认为它已经成功了。而当时是叶利钦在莫斯科动员了反对派力量，强行组成了一种对抗，导致了这种联盟的解体，扭转了政变的走向，但同时也加速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台。

要记住，在戈尔巴乔夫“胜利”返回莫斯科不久，苏联电视台就有一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共同露面的节目。叶利钦当时已经是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这是一个新的职位。他非常戏剧化地拔出他的笔，宣布他正签署一项法令解散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表示反对，而叶利钦说要签署。同一天，军队包围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所有的共产党官员都慌张地离开了这座大楼。有些政变分子自杀了。那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后来在叶利钦任总统的时候也有过一次摊牌，但这才是最关键的时刻。

结果十分混乱，但除了混乱，还有什么结果可能出现呢？这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突然之间，政治集权化终结了。经济开始解体，然后大量的西方顾问鱼贯而入，提出建议的同时疯狂敛财，同时俄罗斯人也加入了这个过程。这些财富突然地聚敛起来。一无所有的人突然之间变成百万甚至亿万富翁。那当然会在俄罗斯的公众中引发憎恨，特别是在相对安全但不十分富有的苏联中产阶级被劫掠之后。这些人是受难最深的。

所以憎恨四处弥漫。当叶利钦变得越来越糊涂，越来越不能胜任之时，就出现了一种推翻他的压力，于是普京担任了总统。我们知道普京统治下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并不太清楚是什么动力推动着他。但我们有一些间接的线

索。

首先，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暗示。他说苏联的终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要知道，20世纪有过两场成千上万人被杀的世界大战，有过希特勒主义和大屠杀，还有过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但对他而言，相对和平的苏联解体却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其次，在他执政早期，有过一场访谈，他谈到他的家族的先人。他最崇拜自己家族里的一个人，是他的祖父。他的祖父是谁？西方媒体并没有过多涉及这个话题。他的祖父是列宁的一个安全警卫，后来又成为斯大林的安全警卫，事实上，是为斯大林预尝食物。这就是普京最为崇拜的人。

再次，在他担任总统一年之后，他去参加克格勃所有高级将领的年度聚会，其中既包括在职的高级将领，也包括退休的。他走进去，站在他们中间，敬礼之后说："同志们，第一项任务完成了。"也许这是一个笑话。但要记住，他来自克格勃精英层，来自曾经驻外的克格勃间谍群体。这些人是苏联的宠儿。他们能够接触西方书籍，他们能够出国旅行，他们受到信任，他们担负特殊使命。我完全能够想象，他们在目睹苏联解体时的那种情绪。而且我完全能够想象，他们这群人，精力充沛、年富力强、雄心勃勃，他们说："我们必须重新控制。"所以，我对普京的感觉就是，他正在对已经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我想，他还没有完全消化当前的事实，旧的帝国体系没法被重建。他用一种怀旧情绪动员了许多人。

他也非常理性，而且他不会去试着创建一个新的苏联。但他会去做两件事。第一，他会去努力将中亚与外界隔开，将西方隔得越远越好。通过使中亚的油气管道经过俄罗斯，他正在高效地实现这个目标。第二，他会努力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屈服，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中十分重要。乌克兰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乌克兰离开，就不再有任何"斯拉夫联盟"的可能，那俄罗斯就真的只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了。格鲁吉亚的重要性在于，它在高加索地区非常关键，巴库—杰伊汗（Baku—Ceyhan）输油管道使我们有了通向里海的通道，而俄罗斯人想要切断它。

斯考克罗夫特：让我来为兹比格刚才所说的加几个注脚，我就从试图推

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说起。那场政变令我们吃惊。我们正努力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真实的局势是怎样的。比如，我们想要找到当时谁拥有苏联导弹发射的密码。我们没法找到。

前一两天疑惑特别多。我们试了好几次，想要接通戈尔巴乔夫，却联系不上他。我不知道当时是总统、我，还是其他什么人，说了一句“让我们给叶利钦打电话”。很奇怪，电话一打就通。而叶利钦当时正位于莫斯科中心，站在那辆著名的坦克上。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那场政变中，我们最害怕的人——克格勃的首脑、军队首脑，还有其他人，他们是如此笨拙，竟然都不能组织一场政变。

布热津斯基：而且他们还开始自杀。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他们甚至都没法开出两辆车的车队。他们实在很笨。但当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米亚的拘留地回来时，正如兹比格所说，他们开了这次联合会议。叶利钦羞辱了戈尔巴乔夫，就这样羞辱了他。这两个人之间发展起来的仇恨，也是后面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做过同事，然后，在 1987 年，叶利钦选择了决裂。他逐渐非常坚决地要除掉戈尔巴乔夫。我有一种预感，他除掉戈尔巴乔夫的日子，就是苏联消失的日子，因为这正是叶利钦能够除掉戈尔巴乔夫的方式。

伊格纳休斯：老布什总统什么时候决定叶利钦可以加以利用?

斯考克罗夫特：有一件事，戈尔巴乔夫永远没有理解，这与兹比格刚才提到的民族主义的地位有一定的关联。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低估了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中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他有一种用邦联形式重建苏联的想法。他实际上发展出一个框架，让各个共和国投票。当乌克兰投票反对时，那就是戈尔巴乔夫玩儿完了的标志。这是一项纸上谈兵的计划。它根本没法处理正在苏联各处发生着的事实。

伊格纳休斯：而俄罗斯人自己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我认为，他们也厌倦了老是把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都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你不赞同这种观点，兹比格？

布热津斯基：一点儿也不赞同。一点儿也不。

伊格纳休斯：我确实从俄罗斯人那里听到过这种观点。你看到过那些苏联电视上的可笑的各民族的游行队伍。俄罗斯人就会坐在电视机前嘲笑它。

布热津斯基：是的，但他们从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这是他们身份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如果你开始一层层地剥开这些国家，他们就不会这样大了。这种领土感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加以理解和思考的神秘感之一。而且，这正是为什么整个过程会很痛苦的原因所在：今天的俄罗斯的疆界被视为是非自然的疆界。事实上，俄罗斯人一直有意地抵制划界，以使疆界继续处于模糊状态。倒是那些从苏联独立的新国家不断要求清晰划界。

你并不了解苏联解体时带来的那种创痛。我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到了那里，拜访了各个不同的共和国的总统们。在这些访问结束时，我被带往机场。总统向我说再见，当时有许多飞机停在那里。而他们正在往飞机上喷涂新的名字。它们不再是“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而是，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航空”，或是“吉尔吉斯斯坦航空”。我问总统：“你们是怎么瓜分苏联民用航空总局飞机的呢?”而他说：“很简单。苏联解体的那一天，任何在我们领土内的飞机，就是我们的。”这是一个混乱的、令人困惑的、痛苦的过程。

对于非俄罗斯人而言，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解放，因为这个过程发展之迅速，超出了他们的历史预期，而在东欧，它则发展得过慢，慢得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那就是根本的不同。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让我们回到普京的话题。兹比格说，普京形容苏

联帝国的崩溃是一场大灾难。那么他想要什么？他这一代人想要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我并不是不同意兹比格的描述，但我不认为普京是一个单一思维的人。他在克格勃内部受到重用，很可能因为他有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他也在索布恰克（Sobchak，曾任圣彼得堡市市长）时期当过圣彼得堡市的副市长。索布恰克是第一位公开有民主倾向的市长，他努力想建立一种民主秩序。现在，他身上的什么东西被磨掉了？我不知道。

布热津斯基：但不幸的是，索布恰克同时也非常腐败。

斯考克罗夫特：哦，民主与腐败并非完全排斥。

布热津斯基：对，不排斥。但问题在于，不仅民主正在被磨掉，还包括这种腐败的手段。

斯考克罗夫特：我并非不同意这一点。在普京的传记中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瞬间，他说他一生中最令人感动的时刻，是他的妈妈偷偷地带他到教堂接受洗礼。现在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但这是一个脑袋里同时盘旋着许多事物的家伙。他最拿手的一件事，就是诉诸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他很受欢迎。俄罗斯人喜欢他。至于那种苏联解体大灾难的说法，大多数俄罗斯人恰恰有完全一样的感受。

布热津斯基：但我认为，一个人也必须面对一项事实，普京将俄罗斯定义为非常骄傲的民族国家，正如他所宣称的，从 20 世纪最大的灾难中觉醒过来的国家。这种定义会使俄罗斯更难认识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负面影响。德国人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纳粹的所作所为当作一种邪恶的东西清除掉了。普京则创造了一种环境，使得人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十分模糊、犹豫、不彻底。

而且还有一种对一切真正的、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国家的重新定义的阻

挠，而且将民族主义弄成仇外的带有帝国复活的色彩。而且这种阻挠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居然有种半合法性，或者说好像是在隐藏某种尴尬的事。这不仅阻碍了俄罗斯的转型，它还用一种用带菌的定义污染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知道，那些穿着脏衬衫的年轻人，那些反西方、反亚洲、带有种族主义印迹的年轻人。但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矛盾和模糊的阶段，普京一方面巩固了俄罗斯，重建了秩序；另一方面，他又阻碍了某些我认为将最终使俄罗斯开放“对欧大门”以使欧洲开放“对俄大门”的自我定义。

斯考克罗夫特：那种自我定义可能需要一代人来完成。我认为，在俄罗斯人安定下来找到他们是谁以及什么是适合他们的政治架构的过程中，必定会有更多的叶利钦，更多的普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戈尔巴乔夫。我所说的是，我不知道普京的行为，有多少是来源于一种重建苏联的愿望，有多少，正如他自己所看到的，是来源于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诉求。

2007 年，我听到了普京在慕尼黑的演讲。演讲有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被广泛传播，第三个部分却鲜有媒体提及。他说了大概如下的话：“当我们虚弱的时候，当我们趴在地上站不起来时，你们西方”——他面对的是北约的听众——“你们从我们身上跨过去”，而且他还具体描述了一番。然后他说道：“现在，我们已经重新获得了力量，我们不会再被人跨过去。我们将要自己站立起来。”

之后，他说道：“但是，现在是合作的时候。我们应当在核武器上进行合作，我们应当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进行合作，我们应当在核能上进行合作，这样就不会有哪个国家想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铀浓缩计划了。”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

普京之所以受到欢迎，正因为他踢中了我们的脚踝。这是在吸引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注意。我并不确定我们现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触他，也不确定他是否准备好作出回应。俄罗斯人喜欢力量、权威和自信。如果我们以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们是否能够努力制造出合作的氛围，我并不知道。

伊格纳休斯：让我们转向下一个问题，美国如何应对这个新俄罗斯及其

烦人的民族主义，还有它对已经解体的旧帝国的缅怀。从一届美国政府到下一届美国政府，总是有一种将北约推在前面，将苏联从前的共和国纳人进来的愿望。而最令普京恼怒的一件事，就是北约扩张的步伐，直接到达俄罗斯心腹地带的边缘。将北约扩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建议特别令俄罗斯人不安。

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使我们吃惊。如果美国的一个潜在敌手正将其联盟扩大至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也会高度关注的。

斯考克罗夫特： 我会引用“门罗主义”。

伊格纳休斯： 嗯，是的，我们有一项著名的国家政策，它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这条政策说，这种扩张不能进来。所以，兹比格，让我来问你，什么是美国向前推进的最明智的政策呢?

布热津斯基： 让我试着理清它。假设我正负责制定这项政策，假设我正向一位总统提建议，我会说，首先，我们必须界定共同利益的范围，努力找出我们是否能够提升共同利益。比如，武器控制是一个共同关心的领域。不让军事竞赛像冷战时期那样变得疯狂，这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所以我们愿意开始这样的合作。

我认为，从武器控制合作走向核不扩散合作，也很合理。我又认为，在这一领域，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如何执行核不扩散政策的问题，可能会有争执，特别是，举个例子，在伊朗问题上，我们总有动武的冲动。我不确定俄罗斯人是否会正式地谈这个问题，尽管我怀疑他们会将我们与伊朗的冲突看作是他们攫取某种好处的机会。他们会评估对我们的好处与风险，而且我认为，他们会得出结论，要么我们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要么是其他的结局，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这里面都会有共同利益。

我认为，总体而言，俄罗斯人不想让我们早先谈过的中东地区，也就是全球最易爆发冲突的地区，变得大面积不稳定，因为那会对俄罗斯有溢出效应。我们现在称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国家，事实上，大约有20%～25%的俄罗

斯公民不是俄罗斯族，包括大约 3 000 万穆斯林。因为有潜在的溢出效应，所以俄罗斯也希望中东地区的稳定，这是它的利益所在。

俄罗斯人还很关注中美结成盟友，因为这会给中国更大的杠杆来对抗俄罗斯。那也会给我们一些能够加以积极运用的外交机会。

但我们绝不能自欺欺人，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在个人层面的善意，就必定代表着国家战略。赞扬并尊重个别领导人，却使人们产生对俄罗斯本质的误解，比如说当俄罗斯并未成为民主国家时，却为其贴上民主标签，我认为，这都是毫无益处的。真正重要的是，创造一种地缘政治氛围，减少企图重新获取大帝国力量的欲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并且，假以时日，给予俄罗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紧密结合的选择权，使其放弃另起炉灶自建一套帝国体系的打算。

在实践层面中，这有好几层含义。首先，我们必须周密地部署，与出口能源的中亚国家建立更直接、更多的经济联系，不允许它们被封闭起来。正因为如此，巴库—杰伊汗石油管道确实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成就。我们正在考虑用纳布科管道（Nabucco Pipeline，把里海天然气通过土耳其和巴尔干输送到奥地利。——译者注）加强这种联系。我们应当坚持这样做。到一定时候，也许不会太远，从中亚穿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印度洋的石油管道就会变成现实。这是好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这样，我们再回到你所说的北约扩张的问题。只要想想如果波罗的海国家没有加入北约它们今天会处于什么状况，就可以知道答案。很可能就是目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面临的悲观局面。当爱沙尼亚人决定，将苏联人侵占爱沙尼亚的纪念碑从城市中心搬入一座公墓时，瞧瞧俄罗斯人的反应。事实是，北约向东扩张首先包括那些不想留在苏联集团内部而想成为北约成员的国家。而且，总体而言，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来说比以前还好，尤其是波兰。所以我认为，北约的扩张不会带来动荡，结果应该是恰恰相反。

这使我想起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困难处境。我认为这些国家不应当被诅咒在莫斯科的阴影中。相反，如果乌克兰靠向西方，首先是走向欧盟，最终可能是北约，俄罗斯亲近欧洲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增加。反之，如果乌克兰被事先告知，它永远不可能成为欧盟和北约的一部分，因为俄罗斯不想让它这

样做，那么俄罗斯亲近欧洲的可能性则会大大降低。后者反而会激活俄罗斯的一种观念，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可能还有中亚国家将再次成为某个俄罗斯主导的国家实体的一部分。

我要说，在所有这些事务中，最主要是寻求合作领域，避免特殊冲突，尤其是避免公开的中美反俄同盟。但也要创造一种地缘政治环境，促使俄罗斯人最终会说："只要我们与西方联系，只要有一种大西洋共同体从里斯本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么我们的未来是最安全的，我们对远东领土的控制是有所保证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持续这样一种较为复杂的战略，那么，越来越多年轻的俄罗斯人，在普京的那一代之后，诚如布兰特所说，将会被这一前景所吸引。

伊格纳休斯： 如果我听明白了，我想你的意思是，别逼得太紧，特别是在我们听到俄罗斯对北约扩张至乌克兰的速度大声抗议的时候。

布热津斯基： 是的，但千万别作出排除这种扩张的任何决策。比如，现在的问题不是给予格鲁吉亚或乌克兰北约成员国地位。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是否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拥有加入与否的选择权。乌克兰有一项计划，没有被其总统尤先科接受，但却被其亲俄罗斯的竞争对手雅努科维奇接受了。雅努科维奇制定了以下两个目标日期：2006 年，要获得成员国行动计划，今天这是一个大问题；2008 年，加入北约。而那是雅努科维奇，不是尤先科。

伊格纳休斯： 布兰特，我们应当如何努力地推动北约向外扩张，还有，我们应当如何暗中推动俄罗斯呢？

斯考克罗夫特： 我们这个讨论中没有提到的内容是欧盟。我觉得，我们正在把北约与欧盟等同起来。我们确实想让这些地区聚合成一个更大范围的欧洲。对我们而言，欧盟正是被分配承担这一责任的完美实体。欧盟需要重新界定国家的内部结构，使之能够加入联盟，而它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

当我们用北约代替欧盟的时候，我们使用的却是一种为另一种完全不同

的目标而设计的完全不同的工具。我认为，我们已经完全搞混了两个组织。现在，我同意兹比格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但我们想就两点作出评论。第一，我们与俄罗斯人大体上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很可能要比我们有根本冲突的领域要多。“近邻国家（Near Abroad）”是俄罗斯的一个紧张区域，也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民主问题。俄罗斯人并不打算变得民主，因为我们总是威吓他们这样做。那反而会使进程慢下来。他们将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应当弄清楚我们自己的立场，但是，惩罚与威吓，只会加重他们的悲壮感。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不太热衷于北约向东欧扩张，因为我害怕它会淡化北约的目的统一性。但我认为，它目前做得不错。波罗的海国家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最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特殊案例。它们对于苏联和我们都是最敏感的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它们被苏联吞并。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它们则与东欧不同，它们是苏联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出现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问题，它们明显是苏联的一部分。它们不是卫星国。谈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它们曾经有深深的历史纽带。基辅曾是俄罗斯的核心，直到蒙古人在13世纪入侵，俄罗斯人向北逃入森林，蒙古人才没有再追。

所以，这中间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而且我的观点，与兹比格的观点相反，将乌克兰纳入北约会被俄罗斯人视作西方企图进一步羞辱他们的举动。我们应当谨慎推进，应当鼓励欧盟向前推进。如果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北约的本质以及它的目标，那么届时一个与欧盟平行的北约接触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计划才会更合理。现在强行推进北约成员国地位将会引发问题，尤其是，我认为，在乌克兰的东部，其主体是俄罗斯人的地区，更会引发问题。

布热津斯基：这些人是俄罗斯人，但并不是整个俄罗斯。

斯考克罗夫特：乌克兰西部的历史就完全不同了。而乌克兰内部，就我的理解，也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当大的分歧。

伊格纳休斯：有些民意测试表明，大部分乌克兰人反对加入北约，这里显然有一个明显的分歧。

布热津斯基：那绝对是正确的。而乌克兰政府，一直想获得所谓成员国地位行动计划，这不是一个加入北约与否的决定，而只是为今后的永久成员国地位作准备。乌克兰政府采取了主动，他们去了布鲁塞尔，寻找这种安排，部分原因在于，由东乌克兰所支持的前政府几年前曾经采取过这些步骤。但乌克兰政府也声明，除非大部分人在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否则乌克兰不会寻求北约成员国地位。所以这个阶段的问题并不是成员国地位。问题在于，最终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是否被排除。如果没有任何成员国地位计划，那么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就被排除了。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伊格纳休斯：不过那并不能让俄罗斯人放心。

斯考克罗夫特：这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布热津斯基：最终，乌克兰人才有权决定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俄罗斯人。否则你就会使一个拥有 4 500 万人口的国家处在其邻国的附属地位，由邻国来决定其是否应当加入北约。

斯考克罗夫特：哦，不。

布热津斯基：或者应当采取某一决定。

斯考克罗夫特：不。你的意思是说，北约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俄罗斯不让我们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必要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如果我们不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任何行动，那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将其排除在成员国地位之外。它没有任何含义。

布热津斯基：但问题在于——

斯考克罗夫特：但成员国地位计划就像乘上扶手电梯。它并不必然意味着你想要上二楼，但它是一个好的暗示。

伊格纳休斯：那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布热津斯基：但那是乌克兰人已经提出要求的目标。我们没有跑到他们那里说："寻求它，然后我们会支持你。"顺序是倒过来的。乌克兰总统、总理，还有议会议长写了联名信说："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加入这个成员国地位行动计划。我们想要加入。但除非有一项全民公决，否则我们并不打算加入北约。"

伊格纳休斯：但是，兹比格，你能在俄罗斯人眼睛里放多少刺而确保他们不回击呢？我们已经习惯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软弱，似乎刺它几下就走也没什么大不了。但那个时代不是终结了吗？在俄罗斯人说"这是在严重违反我们的利益，我们将要反击"时，难道我们不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吗？

布热津斯基：我相信，如果乌克兰不是被放置在从属于俄罗斯的位置上，而是逐渐地移向欧盟和北约，事实上那将会增加俄罗斯采取同样步骤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为那种对俄罗斯主权的恐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必须以牺牲其他国家主权利益的代价来尊重俄罗斯主权，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加重俄罗斯人的帝国怀旧情绪。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其实并没有面临这样的选择。我非常赞成欧盟向乌克兰推进。欧洲人并不热心。

布热津斯基：欧洲人内部的观点不一致。

斯考克罗夫特： 他们观点不一致。但我当然倾向于乌克兰获得欧盟成员国地位，那将能够实现你所说的所有目标，而不会激怒俄罗斯人。北约是一个不同的机构。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它代表了冷战中的那个致命的敌人，虽然我们自己已经不那么想了。但为什么我们偏要去激怒俄罗斯呢？不如让欧盟到这些地区做扩张的事，让局势平稳渐进地发展。

布热津斯基： 我对于欧盟扩张不持异议。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像乌克兰这么重要的国家想要成为北约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想要拥有这种选择权。人们应当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他们想要这种选择？"我们并没有鼓动乌克兰人的兴趣，让他们成为北约一部分。乌克兰自己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伊格纳休斯： 某些乌克兰人。

布热津斯基： 包括代表乌克兰东部的党派领袖，他还通过了正式批准的时间表。为什么乌克兰人会有这种感觉？我认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是西方组织的一般成员，他们自身的安全将得以加强。

他们因此必须捍卫自己的独立，而他们的思维深处，总是感到莫斯科的领导人并不想放手让他们做事。就在 3 年之前，俄罗斯外交部的官方宣传机构还出版了一系列由历史学家写的文章，旨在表明乌克兰人确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而本质上只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分支。

正是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乌克兰人说："我们至少想要拥有未来的选择权，一旦我们全国同意时，你们就会批准我们的成员国地位。"我并不急于实现这一愿望。但如果仅仅因为俄罗斯宣布这样做是对他们权利的某种侵犯，就去否决这一愿望，我当然会对此感到不安。

伊格纳休斯： 如果我没理解错，你们二位的共同主题在于，美国的目标是吸引俄罗斯走向欧洲，让俄罗斯拥有欧洲的身份和未来，一个欧洲的乌克兰是那一目标的必要前提。因为乌克兰走向欧洲，俄罗斯也很可能同样做。

所以我们想要将乌克兰吸引到欧洲，但用一种不会招致危机和冲突的方式进行。我这样总结对吗?

斯考克罗夫特: 我认为，不对。

布热津斯基: 对，也不对。我认为你创造了某种仍存在分歧的大概念共识。

斯考克罗夫特: 那根本不是我的感觉。我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应当被分开来考虑。而且我们不相信将乌克兰吸引到欧洲，俄罗斯就必然跟从。事实应该是相反。俄罗斯的地缘骄傲以及他们认为乌克兰是个小兄弟的认识，将会使局势向反方向运作。我宁愿将两个国家放在单独的轨道上。

伊格纳休斯: 所以你认为一个欧洲的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在未来成为欧盟一员，是一种不现实的前景?

斯考克罗夫特: 不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不会排除俄罗斯在北约演化成另一种组织的时候，最终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我也不会排除俄罗斯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但这相当复杂，我认为现在谈论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布热津斯基: 是的，我也不会将这种可能性排除。但我认为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排除了乌克兰，那么就变得完全不可能了，因为那会极大地激活俄罗斯人关于某种超国家实体的概念，比如，首先出现一个斯拉夫联盟。这会促使俄罗斯将中亚地区封闭起来，而他们已经在卖力地这样做了。

他们至今还没有将他们自己容纳到苏联解体后的新现实中来，他们可能会尽最大可能，创造出某种新的安排，让中亚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但我认为，长期来看，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手段和实力。

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足够聪明的话，如果我们不逼出冲突而是创造出可选择性的话，俄罗斯将会面对事实，会认识到它根本不可能无限期地控制住这样一块儿巨大的有潜在大量矿产资源的区域，不可能阻止这一区域成为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我所说的那种更大的共同体，正是欧洲—大西洋共同体。我认为，俄罗斯不会成为中国的小兄弟。如果它真的成为中国的小兄弟，那么它有一天就会丢失远东，可能还会有连锁反应。

这是一个困难的调整过程，短期内，这会使俄罗斯人陷入高度担忧的状态中。他们担心中国，害怕我们会利用他们，他们不确定是否真的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是俄罗斯人自己私下所讨论的两难困境的大背景。但曾经在西方待过的头脑更聪明、更清晰的俄罗斯人，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亲近西方的概念。但他们至今还没有达到破釜沉舟的地步。

斯考克罗夫特：俄中关系确实十分有意思，它贯穿了几个时期。俄罗斯人仍然向中国出售任何中国人想要的军事设备。但在我看来，如果俄罗斯有一个地缘政治敌人，那就是中国。西伯利亚是大国间最可能发生国家冲突的地方之一。

我认为，俄中两国无法长期保持伙伴关系。但是，他们现在结成伙伴关系，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这个包括俄中两国以及几个中亚国家的组织，很明显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还包括双方武器上的合作。我认为，在俄罗斯方面看来，这种合作关系是非常短视的。他们想要自己的武器制造业继续运转，所以他们准备向任何买家出售任何武器。

布热津斯基：上海合作组织对俄罗斯而言，确实是一把双刃剑。起初，俄罗斯人很喜欢它，事实上，俄罗斯人热衷于建成这样一个组织，想用它来扼制中国。但从它运作的方式来看，它事实上已经让中国在中亚的存在有了合法性。

斯考克罗夫特：已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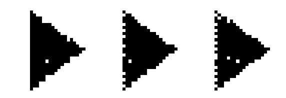
布热津斯基： 自蒙古人入侵之后，第一次，中国军队能够进入哈萨克斯坦西部，并通过这里进入俄罗斯领土，参加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一个重大的象征，象征着新的现实。

伊格纳休斯： 俄罗斯人出局了。

斯考克罗夫特： 真是难以置信。

布热津斯基： 如果你去中亚的市场，就会看见到处都是中国货和中国商人。如果你去俄中边界的阿穆尔河（中国称黑龙江。——译者注），你会看见在俄罗斯一边，漂亮的老旧的村庄，砂石铺成的街道，还有用木头铺成的人行道。与此同时，就在河对岸，中国人建了好几座城镇，有二三十层高的铝合金玻璃大厦，在夜晚闪着光，大厦旁的街道，小汽车穿梭往来。你只要看一看边界，就会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意为之。有更多的中国人非法进入河对岸的俄罗斯，从俄罗斯农民那里租借农场或森林，或是做些小本生意。那些俄罗斯农民要么太懒，要么喝得大醉，根本没法干活。

如果你去中国东北的哈尔滨，这里过去是俄罗斯人的城市，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量白俄罗斯人逃到这里，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区专门从事对俄贸易。所有的街道名都用俄文和中文标志。你会看见什么？你看见中国人卖汽车、电视和 iPod，而俄罗斯人卖套娃和其他木头玩偶。这会告诉你太多信息。然后你在晚上找一家餐厅吃饭，所有的中国人在大口吃饭，你四顾餐厅，就会注意到墙边的几排椅子上，相当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坐在那儿等着客人。



伊格纳休斯： 让我们谈一谈中亚。到中亚这些国名里有个"斯坦"的国家旅行，你会对他们的领导层产生强烈的不安感，他们很渴望与美国有更多

的接触，他们又对莫斯科想要使之臣服并将其纳入联合能源和安全政策的企图表示担忧。你现在会在中亚的每一个首都城市找到这种情绪。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这是美国的机会吗？我们应当努力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其他中亚国家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吗？

布热津斯基：那取决于我们做什么。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努力去与他们建立某种政治军事联系，除非也许在战术基础上让他们帮助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我们真正应当做的，就是我们已经努力去做的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事方式十分笨拙，而且政府高层没什么真正的作为。我们就是应当获得更直接的贸易通道，特别是能源出口通道。而那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斯考克罗夫特：那正是我们真的需要集中精力做的事。不要太政治化，而要多做些经济方面的事。让他们有机会通往外部世界。

布热津斯基：比如，我们应当计划穿越阿富汗的输油管道，向下穿过印度或巴基斯坦，直达印度洋。

伊格纳休斯：我在中亚地区旅行时，我总是在想，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类似田纳西河流管理局这样的能够分配资源的机构。

布热津斯基：在吉尔吉斯斯坦。

伊格纳休斯：那里有大量的雪山融水，有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储量，那里还有对电力的迫切渴求，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类似田纳西河流管理局的机构，连接中亚国家和阿富汗。你认为 2008 年左右的大棋局，是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我确信是这样的。

布热津斯基：是的，因为能源是他们的主要资产。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想要。如果他们能够直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他们就能够巩固自身的

独立。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施加如此巨大的压力阻止格鲁吉亚建设我们刚才谈论的里海管道。这不是萨卡什维利，不是“玫瑰革命”，而是巴库一杰伊汗管道。看看它经过的地区。它从阿塞拜疆和里海，穿越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直到西方。

伊格纳休斯：未来人们可能会因为管道政治而打仗吗？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获得能源将成为政治角力的主要因素。毫无疑问，欧盟和俄罗斯会在能源的买卖方面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俄罗斯需要西方投资。但能源被切断后有一个时间差。西方无能源的后果会立即显现，而俄罗斯的财政后果则会在三至五年之后才会显现，这就给予了俄罗斯一种施加压力的短期利益。

伊格纳休斯：但他们也可能很容易就伤着自己。

布热津斯基：长期来看，假设西方不会在俄罗斯伤着自己的时候陷入衰落。所以这有一点儿不平衡。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坚持控制能源上游的通道，购买油田，成为平等的共同投资者的原因，现在在俄罗斯还不可能做到，甚至能够参与能源分配，正像俄罗斯卢克（Lukoil）石油公司做的那样。就在这个办公室楼下这条街的街角，就有一个卢克公司的加油站。而我们在俄罗斯却没有德士古公司（Taxaco）的加油站。

斯考克罗夫特：能源领域需要我们注入更多的地缘政治理念。我们应当坐下来，核查全球供求，努力发展出一种世界能源构想，从而减少所有这些麻烦可能打击我们的机会。

伊格纳休斯：哦，下一任总统会有不少事要做：要与俄罗斯对话，还要与许多国家一起进行一场关于能源和能源安全的全球对话。

斯考克罗夫特：绝对需要。就拿中国和伊朗做例子。中国人说他们不想伊朗拥有核能力，但他们必须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伊朗的石油。我们应当说的是，让我们创造一个体系，这样如果你在某个地方被中断能源供应，我们会分担这种短缺，这样没有人会在比例上有所减少，也没人会因为依赖石油而成为某个国家的人质。

▶▶▶

伊格纳休斯：让我们谈谈俄罗斯的政治未来。他们有一位新总统梅德韦杰夫。当我与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谈话时，他们告诉我，如果仅仅将梅德韦杰夫看作是普京的傀儡，那就错了，他真的是第一位能够代表新一代俄罗斯人的领袖，普京则是一位有克格勃经验的过渡型人物。从他们的话中，我觉得，普京非常像一位冷战的孩子，而梅德韦杰夫不是。他是俄罗斯第一位冷战后的领导人，我与克里姆林宫官员们的谈话也告诉我，我们应当视之为新领导人，抓住机会与一位代表新一代人的领袖共事。布兰特，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机会见到他或是他手下的人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还没有机会见到他。所有我知道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是从媒体上读到的。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并不是因为听话才坐到总统位置上的。他明显是一个强硬的角色。他似乎比普京有更多的国际视角。

我猜测，我们会与俄罗斯共度一段很有意思的时光。从普京走过的路以及他挑选梅德韦杰夫——而不是，比如说伊万诺夫——的事实，人们似乎能够推断，他认为梅德韦杰夫更好控制一些。但一旦梅德韦杰夫成为总统，他就可能有一天清醒过来说："我是总统。"梅德韦杰夫这种被视为普京傀儡的形象应当不会是恒久不变的。

布热津斯基：无论如何，既然我们不太肯定幕后是什么，我们就应当视梅德韦杰夫为总统并这样对待他。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

布热津斯基：而且我们应当努力在与他打交道的同时，实实在在地鼓励他。确实，他的履历与普京完全不同。他接受的是一种不同职业的训练，两者都是积极的。但是，我对于视梅德韦杰夫为总统是否会很快产生效果，并不那么乐观，因为他毕竟是普京的选择。他在圣彼得堡曾长期担任普京的随从。事实上，当普京坐在索布恰克身边办公时，他就坐在外面的办公室里，他实际上曾经是普京的办公室助理。

我认为布兰特说得很对。普京选择他而不是伊万诺夫，因为他知道伊万诺夫如果成为总统，将会利用力量来强化总统权力，也就是说，形成某种小集团，控制权力工具，包括联邦安全部队、军队以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梅德韦杰夫则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他自己的权力集团。我认为，普京还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导政局。他同意担任总理绝非巧合。而且他已经谈到要将行政大权交予总理。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但是概率很低。比如说，在某个时间点上，梅德韦杰夫可能生病或辞职。根据俄罗斯宪法，普京届时将行使总统职权。

伊格纳休斯：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布热津斯基：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我们将必须去接受它。但问题是，直到梅德韦杰夫能够将表面优势转化成真实力量之前，普京都会处在作决定的位置。梅德韦杰夫的力量并不像美国总统那样来自宪法所赋予的力量，而是来自真实的力量布局。

伊格纳休斯：是的，普京非常努力地想被视为遵守俄罗斯宪法，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

布热津斯基：是这样的，而且这是个好现象。

斯考克罗夫特：他不想违犯法律，我们也不想他违犯。所以他也很有可能会在意再次成为总统。

布热津斯基：而在俄罗斯宪法之下这并没有违法。

斯考克罗夫特：这并不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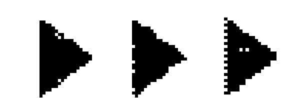
布热津斯基：因此，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梅德韦杰夫可能抱病。

伊格纳休斯：是的，他可能有一天会被公共汽车撞一下，或者钋元素中毒。

布热津斯基：是这样的。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关键在于他是普京一手挑选出来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普京会选他，而不是那些在克里姆林宫追随他，在他当政期间与他更亲近的人呢？

伊格纳休斯：克里姆林宫里应对媒体的人告诉我，普京意识到权力应当传给新一代人。他是一个过渡型人物。我并不是盲从，我只是说，那是俄罗斯的官方观点。

斯考克罗夫特：但我们全都不知道。普京是叶利钦一手挑选出来的，我猜后来的发展路线并不是叶利钦想要走的。



伊格纳休斯：让我请你们二位转向美国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所面临的更

宏观的问题。我们在与这个国家打交道时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兹比格，美国面对俄罗斯时的国家利益和目标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思考的方式不一样，布兰特和我至少已经提到过我们认为俄罗斯应当达到的目标。我们乐于见到一个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与西方更亲近的俄罗斯。我认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更倾向于欧洲而不是亚洲。在某些方面，人们可能将其形容为欧亚大国。但它主导的生活方式，也是俄罗斯向往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将自身命运相连接的主要文化传统，基本上是欧洲的、西方的、基督教的传统。所以，即使它很遥远，这样的一个使俄罗斯日益走向民主的目标也是合理的。我认为下一代的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之后的领导人，将会比现在这一代，当然也比过去的那一代更加民主，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欧洲化。

我期待有一天，俄罗斯总统，可能是梅德韦杰夫之后的那一位，前提是梅德韦杰夫的执政时间足够长，而普京不会卷土重来，那一位总统甚至可能是哈佛商学院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毕业。那并不是一种虚幻的猜想。年复一年，俄罗斯精英阶层会越来越多地将孩子们送往英美学校，而不是去东京或北京。到一定时间，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一个横跨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形象将广受欢迎，因为它能够使俄罗斯继续保持对其所珍视的远东领土的有效控制。

而另一种欧洲止于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形象，是戴高乐将军曾经作为将俄罗斯拉进欧洲的诱饵提出来的概念。如果俄罗斯想要封闭自己，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概念反倒可能成为现实。届时俄罗斯会发现它越来越难控制东方的广袤领土，因为这片土地上既有人口短缺的危机，又有酗酒，世界上最高的死亡率，还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和压力。然后，你就真的能看到一个止于乌拉尔山脉的欧洲，但那将会是俄罗斯的灾难。很明显，那是一个很遥远的猜想，但我认为，那也是俄罗斯人的灾难前景。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需要创造一个能够将俄罗斯吸引到西方的地缘政治大环境，即使会经历一些痛苦的过程，即使会经历漫长的过程，但这个目标也绝非不合理。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如何定义美国在这一关系中的目标？

斯考克罗夫特：美国的目标应当是一个国内安定，并且与欧洲邻国关系和睦的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人就一直在争论着他们的灵魂在哪里，他们究竟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或者是有着欧洲人外表的亚洲人。我同意兹比格的观点。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发现自己的灵魂安栖之所，使他们在那里感到安心舒适。不要收复失地运动、不要敌对、不要仇恨。那可能意味着多付出点儿努力，使他们感到自己被平等相待。我认为，这可能会是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同时，我不会同意过多的让步。比如说，兹比格谈到了管道。我认为，我们应当非常努力地推动从哈萨克斯坦经过里海到阿塞拜疆的石油管道建设。那不会伤害俄罗斯，它只是摧毁了针对欧洲的石油垄断的可能性。

伊格纳休斯：如果那些是我们的目标，那你们认为我们去推动捷克和波兰安装导弹防御系统是否明智呢？这是小布什政府提议的计划，真的让普京和俄罗斯领导层非常不安。这一进程会推进你们所定义的目标，还是会伤害它？

斯考克罗夫特：我对这一计划感到迷惑不解。总统已经宣布我们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明显在建立一套防御体系来防范核武器，这明摆着是在假设他们无论如何都已经有了核武器。所以，我对这项部署的目标感到迷惑。同时，对我而言，其目标是否能够捍卫欧洲或美国，我觉得也不甚清晰。而且，除非技术有所不同，否则我并不确定你能同时既保卫欧洲又保卫美国。

最近的一些进展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美国努力让俄罗斯参与进来，一起处理导弹防御问题。我知道的不够多，但我觉得，这似乎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的看法呢？

布热津斯基：好，我有种两头受气的感觉。因为一方面，华盛顿这里的决策机构想要我向波兰人和捷克人宣传导弹防御的理念，而另一方面，波兰人和捷克人又到我这里寻求如何处理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议。所以，首先，我对波兰人和捷克人说的话大体如下：你们成为美国的亲密盟友，这是你们的利益所在。如果美国真的强烈要求你们这样做，你就应当努力去容纳这样一个体系。但你必须在如何做这个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做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大环境。如果北约赞成这个系统，而且俄罗斯也同意，那么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与美国达成交易安排，获得某种补偿，很可能是军队的现代化。

如果北约不太热情，西欧国家都反对它，而俄罗斯人强烈反对甚至作出威胁，那就比较棘手了。如果美国真的想要这样做，你们也应当跟进。但届时你们真的必须从美国那里获得补偿承诺。一旦俄罗斯的威胁变成现实，或者如果俄罗斯人实施政治或经济制裁，你就能够获得补偿。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这就使局势变得相当复杂了，因为美国通常对于给予双边保障都不怎么热心。

所以那就是我的正式谈判立场。现在，我顶着美国政策战略分析家的头衔，就像布兰特一样，我觉得有点儿迷惑不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最新版本，这个体系的建议，旨在保卫欧洲人。但欧洲人并没有要求我们实施这种保护。其次，我们想要部署的这种体系根本不存在。所以我并没有看出来，有什么急着要推进的必要。我猜测，如果民主党人赢得选举，他们必然会慢慢来，减少对这个体系的投资。简而言之，这个问题取决于欧洲的现实环境，以及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承担部署的后果和责任，还取决于我们的选举进程。

伊格纳休斯：如果美国不顾俄罗斯人的强烈反对，还有一些欧洲人的断然拒绝，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继续推进该计划的话，你们是不是都看到了一种危险，我们自己创造出一种环境，迫使俄罗斯作出我们本想避免的反应？也就是说，自讨苦吃，美国制造出一种情绪，让俄罗斯人认为无论美国怎么

说，都是想要在他们的边界部署威胁性导弹系统。布兰特，从你刚才谈到的目标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继续推进，我们可能制造出最坏的结局的可能性有多大？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可能性存在，但我不确定那一定会发生。威胁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事实上，俄罗斯人根本没必要害怕这样一个系统。

伊格纳休斯：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个系统不会很容易地转化成一种旨在防止俄罗斯人使用核武器的导弹防御系统吗？

斯考克罗夫特：这个系统在对抗俄罗斯导弹攻击方面是无效的。它的设计是用来拦截几种初级导弹的。它的设计不是用来对抗俄罗斯的武器库的。如果要将它改装成对俄罗斯的真正威胁，那得大动干戈，变化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但很明显，普京认为这深深伤害了他，我认为他决定，或者可能是感觉到，这与我们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推动北约东扩对抗俄罗斯有关。我不知道他的这种观念有多强烈。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乌克兰和北约东扩的重要性没法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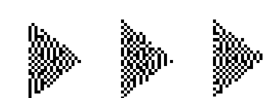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我们应当顶着俄罗斯的反对努力推进吗？

布热津斯基：首先，我对部署这样一个系统的紧迫性表示怀疑。同时，我们不能完全忽略俄罗斯的反应。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因此可能激怒他们。我们应当非常清楚地向俄罗斯人表明，如果他们把威胁作为一种谈判风格，那将会有反作用。

同时，我对这项计划本身深表怀疑，我确实认为，白宫努力想与俄罗斯人进行严肃认真的对话，也正在努力使他们确信这个系统并非针对他们。我认为这样做是善意的。我想，俄罗斯的反应也会比较适当，不会当头就说：“我们会去部署导弹，对准这些国家，对准这些设施。”这无益于严肃认真的

探讨。最低限度的威胁，这也会制造对立。你没法用威胁来解决问题。

这恰巧使我想到了有关乌克兰讨论中的一些因素。如果俄罗斯基于邻国的理由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而像普京那样在与尤先科的共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如果你们向北约靠近，我们就会用核武器对准你们。"那又是另一回事。这在所谓兄弟国家之间，是相当强硬的言论。我认为，如果俄罗斯想成为伙伴，那种谈话方式只会起到反作用。



伊格纳休斯： 让我们最后讨论一下每每谈及俄罗斯时都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有关俄罗斯灵魂。

布热津斯基： 有些总统很乐于承认的那种灵魂吗？

伊格纳休斯： 我们全都读过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巨著，我们三个人都曾经在苏联时代去过古老的莫斯科。苏联时代的莫斯科的悖论之一在于，它是全球最具知识性的城市。到那里犹如参观格林威治村。你会走进异见知识分子的公寓，他们如此有文化，如此博学多闻，秘密地写出著作，你会整夜与他们讨论他们拥有的远大理念与梦想。你今天参观莫斯科，它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它比拉斯维加斯的霓虹灯还多。它有一种毫无灵魂的感觉。你看见穿着最昂贵外套的美丽女人，走进酒吧和饭店大笔撒钱的家伙，但如果你努力想找到有价值的新俄罗斯文学，却会无果而终。

所以我想问，从广义的文化角度，你们看到俄罗斯会往哪里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文化。兹比格，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在那种俄罗斯文化的阴影中长大的。

布热津斯基： 毫无疑问，在俄罗斯社会的人文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令人感到非常温暖的深度与厚度。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有一种团体的感觉，很容易让人融入进去。当然，不是指克格勃或是古拉格（Gulag）的管理者的那种俄

罗斯人，而是那些本身也是压迫体制牺牲品的俄罗斯人，他们的仇恨与被剥夺感滋润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成为更纯粹的人类。

所以，我对于你刚才所说的话有强烈的同感。这正是为什么我喜欢俄罗斯人的原因。我喜欢处于俄罗斯人中间。你可能会觉得惊讶，我在他们中间相当自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也非常热情，因为我憎恨的东西，与他们在本国所憎恨的东西，通常是一样的。

据说，有时俄罗斯人能够将最圣洁与最邪恶的品质集于一体。有些俄罗斯人权活动家无疑准备要将所有的东西献出来，牺牲他们的一切。他们这样做，因为有一种超越个人能力的承诺，一种努力达到哪怕是最低限度平等的承诺。还有那种对于苦难几乎无知无觉的传统，还有那种凌辱人民的倾向。看看俄罗斯军队里发生的一切。那简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丑闻，看看他们如何对待他们自己的年轻人。所幸，还有一种崛起的浪潮在反对它。我常常在想，那样的暴行是农民生活中半动物性层次的产物，它滋生出一种感觉，认为你可以虐待动物，而人类也不例外。你甚至还能从虐待中得到快感，因为你自己也曾经这样被虐待和剥夺。

所以俄罗斯灵魂还在那里。它现在被玷污了吗？恐怕你是正确的。你所形容的繁华表象恰恰折射了美国最坏的特征。而我确实认为，我们美国人的个人生活中，并没有同等的空间去容纳你在俄罗斯所看到的如今正在下降的那种温暖、亲密和共同的哲学信念。这可能就是一个科技和利润主导的社会的典型特征，获取物质财富是成功的首要定义。这正是我有时担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的原因。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认为俄罗斯人正在丢失俄罗斯灵魂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要预测这样重大的问题可能为时过早。我同意你们二位关于俄罗斯灵魂的说法。有一种对人性的敏感与热情，真的非常感人。你能够在他们的文学与音乐中看出来。但俄罗斯也有残暴的历史。这是一个没有太多自然疆界的国家，它曾经许多次被征服。它曾经出于安全的考虑被专横的统治者统治。所以这种不安全感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残暴斗争是

与生俱来的。他们已经在扩张中寻求生存，将疆界尽量向外推，这样才能有防范侵略者的呼吸空间。

俄罗斯灵魂是上述这些经历的混合物。他们有非常多的优点。但在他们强大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极度富有侵略性，还会凌辱其他人。而当他们虚弱的时候，有时又会奉承讨好。

我并不是说，这种灵魂的好的部分无法最终控制其坏的部分。但我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俄罗斯的渐进演变。我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最终也会演变。如果俄罗斯发展成一个让人感到舒适、安全、不再受到内部或外部威胁的社会，那么届时，俄罗斯灵魂中的好的部分将会遍地开花。

第六章

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

戴维·伊格纳休斯：当我们谈及美国与世界时，我们一般会以为欧洲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区域，以为我们了解欧洲。其实我们忘记了，在过去20年内，欧洲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样，它的变化非常大。

欧盟已经创立了，而且扩张到西欧以外的区域，纳入多元化的新成员。欧洲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货币，实现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期待。在很多方面，欧洲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新欧洲是什么？它有什么不同？它又给美国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兹比格？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欧洲新在什么地方，很明显，新在高度机制化的超越传统国家主权的努力。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美国是“一个更完美的联盟”。但谈到美国的建立，它是一个主要由盎格鲁一萨克逊人加上奴隶和一些残存的印第安人组成的更完美的联盟。欧盟的建立则是基于如此多的不同的民族和语言，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会说，其一，欧洲变得更大；其二，它在政治上更加清晰地自我定义；其三，它拥有自身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其四，它与美国结盟。这四点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下面让我逐条来作简单的解释。

欧洲应当更大，因为创建一个历史和文化定义中的欧洲，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非常希望土耳其能够成为这样的欧洲的一员，因为如果土耳其被排除在外，它就很可能变得更像一个中东国家，这反而会把中东带入欧洲。

欧洲应当在政治上更明确地自我定义，因为如果欧洲是我们的伙伴，我

们就想要它具备在一系列领域中作出决策的自主能力，从社会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到军事领域。

另外，我更喜欢一个在军事上更有能力的欧洲，因为大量欧美共同的问题与安全有关。很可悲，跨大西洋对话至今都只涉及美国的要求，美国要求欧洲人分担我们的负担，而他们却没有能力这样做。反过来，欧洲人要求让他们分享决策过程，但又声称他们没有能力分担负担。一个军事上更强的欧洲将能够更好地成为我们的盟友，并有所行动。萨科齐最近提出建立一支大约 6 万人的常规军，由欧洲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各出 1 万人。

最后一点也是最明显的，我认为，尽管有伊拉克的代价，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我们确实需要欧洲作为我们的盟友，因为这能使我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但同时，在许多我们关注的问题上，欧洲的看法往往会显现历史的深度，也许在某些方面更明智一点。我认为，我们会从与欧洲的真正的伙伴关系中获益。这样的伙伴关系，要求我们分享决策，也分担压力。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如何定义新欧洲？你认为它有多新？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我同意兹比格的观点，欧洲之新在于超越国家主权。这是新的，在许多方面也是独特的。欧盟在其组织形式上与美国有根本的不同。尽管美国常常被视作模板，但欧盟突破了新的疆界。它大体上仍是一项进行中的工程。在欧洲和美国，关于欧盟往何处去，以及甚至欧盟是否利大于弊的问题上，都有许多模糊。

美国在欧盟问题上长时期态度暧昧。一方面，我们声称，就像基辛格所说："如果你想给欧洲打电话，电话号码是多少？"另一方面，我们对统一后的欧洲不怀好意。在许多方面，我们宁愿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单独打交道。

在欧洲，人们就许多问题争论不休，包括他们是否想要将 1948 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成一个联盟，就像美国这样，或者更松散一些，更像一个邦联？这个问题又衍化出是否要深化或扩大欧盟的争论。你是想专注于纳

入更多国家，还是要强化现有成员之间的纽带？法国人，曾经两者都要。不过，很难两个目标都达到，因为你扩张得越大，你的利益、态度和观点就越分散，而要想成为一个联盟，你就必须将这些多元分散的利益、态度和观点集合起来。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认为这个更大的欧洲能够维持过去更紧密的欧洲的那种凝聚力吗？我有时听见欧洲人问，我们究竟与斯洛伐克人，与塞浦路斯人，与我们纳入新欧洲的所有这些不同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是不是在本质上弱化了我们的联盟？

斯考克罗夫特：那是个两难困境。正如兹比格所说，许多人期待着欧洲扩大。土耳其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因为土耳其在地理上横跨欧亚大陆。但是你扩得越大，你的内部结构可能就越缺乏凝聚力。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认为，让土耳其加入欧洲是极其重要的。

我还要谈一谈另一件事，关于军事方面。兹比格谈到建立一支欧洲军队。但欧美之间有关欧盟发展问题的真正冲突之一，正是关于军队地位以及北约地位的问题。那场冲突现在多少有些减弱了，部分是因为欧洲国家并没有准备向他们的军队大笔投入经费。但长期来看，法国特别想说服欧盟建立一个独立于北约，在某些方面还和北约竞争的军事组织。与北约的联合行动将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

这些特殊的走向目前并不那么突出。有一种惰性，因为欧洲毕竟已经在扩张和消化新成员中消耗了太多精力。而军事方面则是相对停滞。但这些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些是独特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面对一种通过有效的人为行动创立出来的巨大力量。

布热津斯基：矛盾之处在于，欧洲共同体在扩张的时候，将自己改名叫欧洲联盟。但目前真正发生的事，却是欧盟在扩大之后却变成了欧洲共同体。

欧洲共同体在 10 个成员以下时，其凝聚力较强。事实上，如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盟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创立，那我们很可能有一个单一的

欧洲国家，包括法、德和其他几个国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大的欧洲，却称自己为联盟。而且它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非常成功。但它至今还没能在政治上自我定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它在政治上有所定义，那对欧洲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它今后可能会有清晰的定义，因为它正在朝这样的方向运作。

安全防卫领域的问题最突出。欧洲人不想在防卫上花太多钱。他们想支持北约并成为北约的一部分，这能够给他们一种安全感。但它越来越清楚，面对我们在这些章节中谈论的各类全球问题，如果仍然只有一方作出决策并承接主要责任，那么大西洋联盟就很难有行动能力。欧洲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决定性的，但并不能垄断一切。在美国和一个有更加清晰定义、军事上更加自主的欧洲之间结成更紧密的关系，正开始被双方视为共同利益之所在。

当然，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欧洲会走向何处？我则认为，乌克兰应当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几乎所有欧盟的成员都是北约的成员。因此，如果乌克兰真的成为欧盟成员，它也会要求成为北约成员。

到某个时间，在欧俄关系的本质上就会产生一些复杂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详细探讨过。但我认为，这个历史进程，如今是被大西洋两岸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所认可并期待的。而且我认为，除非西方作出自杀式举动，否则这个过程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伊格纳休斯：但如果欧洲有了自己的强大独立的国防军，这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我们不断呼吁欧洲在这方面多做一点。但如果他们真的拥有北约以外的独立的国防能力，那会成为美国的问题吗？

布热津斯基：人们必须去问："独立是为了什么？"我认为，欧洲将拥有独立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会有一场真正全新的大型战争。我认为，即使欧洲拥有独立的能力，它也不会将成千上万的士兵派驻国外。但欧洲人当然能够拥有比快速部队更多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在他们有选择地派往非洲部分地区的兵力规模上。目前，这些军事行动，甚至在兵力运送等方面都还需要我们

的帮助。欧洲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在不需要变得过分独立导致美欧安全纽带减弱甚至断裂的范围之内，能做很多事情。

斯考克罗夫特：我的感觉是，欧洲人有一种战略疲劳。20 世纪他们打了两场难解难分的漫长战争，这两场战争总是影响着他们的民众、他们的政治和他们的整体面貌，这犹如警钟长鸣。他们没办法认同强大军事力量的需求，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所以，如果他们在军事上做得更多，那会非常有用，但我觉得，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他们恢复活力之前，我们应当接受一种分工，也就是我们在军事上多做一些，而欧洲人在他们拿手的事情上多做一些，包括用他们将各个国家纳入欧盟的那种方式进行国家重建和政府重组。我们应当与他们紧密合作，但要认识到，如果用更多军队的需求去威吓他们，那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布热津斯基：没错，但我有一点保留意见。我的保留意见，布兰特，不是关于你所说的欧洲人的状况，而是更多的关于这种劳动分工的政治后果。比如说，阿富汗。欧洲人将会在阿富汗做好事，修路、建学校，等等——可能他们做得比我们做得更好。而我们则在那儿打仗和流血。

我认为，长期来看，美国公众不会把这样的分工视为一种联盟。我们会憎恨它。我认为我们有权对欧洲人有所期待，尽管正如你所说，他们有一种战略疲劳。我们也仍然有权期待他们对世界现状负更多的责任。他们现在比我们落后很多。但巧合的是，我也看出，英国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法国也越来越愿意，还有一些小的盟友，包括波兰和荷兰。真正的问题是德国，可能还有意大利。我认为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斯考克罗夫特：我并不是说劳动分工。我说的是，所有成员都在所有方面参与，不过也许参与的程度不一样。

布热津斯基：好吧，我同意这一点。

斯考克罗夫特：但我说的是，他们能够做，而且愿意在某一方面做得更多。而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要强行要求相同。因为如果我们去要求，最终的结果就是分裂。

布热津斯基：有道理。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从阿富汗的实践来看，那有什么含义？

斯考克罗夫特：嗯，比如说，帕迪·阿什顿（Paddy Ashdown，1988—1999年任英国自由民主党党首，2002—2006年担任国际社会的高级代表兼欧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特别代表。——译者注）这样的人可能会过来，并能够扮演类似阿什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将波斯尼亚聚合起来的那种角色。他可能比美国吸引到更多的经济资源，这样可以平衡我们的军事存在，而且，除此之外，还能真正统一我们在阿富汗的联合行动。

布热津斯基：那么，让我把你所说的讲得更清晰一点。即使美国承担了战斗和领导的大部分负担，你仍然会希望欧洲人提升他们的地位吗？或者你会免除他们的义务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会免除他们的义务，不会。我同意鲍勃·盖茨的说法，他说我们不可能有“两级北约”（Two-tiered NATO)。但我们不应当只是不停地催促欧洲人，指责他们不履行军事义务，因为事实要比那更复杂一些。我们需要理解，需要现实一些，这样联盟作为整体才能将效用最大化。

布热津斯基：所以军事负担也不必要共同承担。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

布热津斯基：但必须承担相当的比例。

斯考克罗夫特：那当然。

▶▶▶

伊格纳休斯：转向一些令欧洲人担心的事，我认为头一件就是，我们不时提及的欧洲僵化病，这个老旧的大陆，尽管它在重塑自身，扩张欧盟，但却在遭遇人口问题。在许多欧洲主要国家，人口生育的速度不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德国、意大利，出生率都很低，如果需要经济运转下去，要求引进移民的压力就会日益增长。这种状况让一些欧洲人非常沮丧。兹比格，你在欧洲大陆上出生，年轻的时候来到美国，你有那种对欧洲的人口危机的深刻忧虑吗？

布热津斯基：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且我必须承认，我对此知道的不多。但我觉得，似乎有证据证明人口计划不应当是单向的。如果你要针对正在下降的人口，就不应当假设这种下降还会延续，同时也不应当假设另一种对立的情况，认为人口增长还会延续。大部分关于世界人口的计划都在几年内大幅修改过。我认为，有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看到在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上的某种变化。

但是，这是个问题。我想，欧洲人会努力处理好这个问题，会与其他国家处理得一样好，通过社会政策鼓励家庭扩大，通过接受更多数量的移民。那些不习惯吸收外来移民的国家可能会在接受大量有宗教和文化差异的移民时表现得比较谨慎。我认为，举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从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波兰来的工人在西方更受欢迎的缘故。实际上，罗马尼亚的农民正在移入西班牙的无人村庄，那些本地的居民要么死去，要么移居城市。在爱尔兰，有大量的波兰人社区，不仅有天主教堂，还有足球比赛的电台广播等，它们都在用波兰语。

伊格纳休斯：但他们并不受欧洲劳工联合会的欢迎。

布热津斯基：那是另一个问题。当然，欧盟不喜欢这样。但欧洲国家欢迎他们。我同意那种观点，欧洲被两次大战的惨痛经历深深地伤害了，现在异常清醒，战争只能是最后万不得已的政策，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去考虑离欧洲很遥远的安全问题。但是，今天，布兰特和我讨论的大部分问题都不仅是美国的挑战，也是欧洲的挑战。如果美国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欧洲以及欧洲的生活方式就会遭难。而且那就意味着西方的终结。在那些对未来有所思考的人中间，都有一种清醒的共识，除非美国和欧洲精诚合作，否则，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和新生的全球问题，全都无法有效解决。

斯考克罗夫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对人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持有共同观点的国家能够精诚合作，这非常重要。这样的国家合作就是大西洋共同体。这样的观念对于这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来讲，并不能算是普及。如果我们共同合作，我们就能够推进我们所认为的如何组织社会的基本理念。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这样做的机会就要少得多。

伊格纳休斯：你说的共同观点，我想你的意思是关于个人自由的观念，与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些集体主义者的关于生活和社会如何运转的观念正相反。我说的对吗？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不过，我想我未必会用你这样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不仅仅是个人与集体之争，还有保护少数派，还包括很多事情。

伊格纳休斯：法治？

斯考克罗夫特：法治。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这并不是必然就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但我们深信，世界是由个人组织的，政府应当为最大多数人寻求最大限度的好处。我认为，欧美在一起，各有所长，我们就能更好地推广这些理念，把我们这几年争论的方

式推广得更好。

布热津斯基：底线就是，如果美国和欧洲不能用一种系统的方式相互磋商、共同行动，那很快就不会有西方存在了，因为单独的美国或单独的欧洲都无法在一个新的动荡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自我延续。所以，美欧拥有一套真实可行的决策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要求两件事。首先，它要求欧洲自身发展出一套决策体系，这个体系必须连贯、可持续、可运作。这并不容易，但最近的宪法修改开始将欧洲移向那个方向。不久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位欧洲总统。事实上，谁会当这样一位总统已经是一个有趣的政治讨论话题了。

我们会有一位欧洲外交部部长。如果有一些关于欧洲军事能力的计划也在酝酿，那就真的会有一种接近欧洲军队的安排了。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这支军队将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军事行动。

其次，我们必须拥有一套跨大西洋的决策体系，既有合法性，又能彼此尊重，还必须被实践证明可运作。比如，我认为，八国集团，或者过去的七国集团，已经出于多种原因难以相互信任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错误地使用"民主"一词来定义成员的身份。但我们应当努力建成一个类似的跨大西洋组织，包括美国和欧盟，可能还有加拿大。我认为它不可能一夜建成。但如果我们愿意采取主动，我认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此作出回应。它甚至可能推动欧洲人建立一套自己的更精密成熟的决策体系。这是一块儿肥沃的土壤，我认为我们的下一位总统将能够作出历史性的创新。

《大西洋宪章》恰好打下了基础。《大西洋宪章》多少受到1945年将世界划分成势力范围的影响，所以这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它可能是一个及时的提议。

斯考克罗夫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年中，欧洲强烈反对这样的思路，特别是法国，有一段时间想要将美国赶出欧洲，因为他们感到这是欧洲能够统一的唯一方法。只要我们还在，我们就是个大块头，而欧洲就永远没法走上法国设想的道路。

那正是我讲欧洲的统一仍然是一项未竟工程的原因。有许许多多的潮流和反潮流。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但我们至少应当提高我们的集体决策能力。北约过去要比现在更加集权。在冷战时期，北约理事会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决策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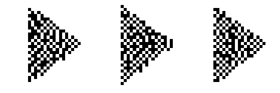
布热津斯基：因为我们在决策上处于支配地位。

伊格纳休斯：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斯考克罗夫特：还有共同的目标。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共同敌人和目标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与欧洲人的讨论，他们提出一些特别事项。如果我们反对这些观点，他们就会声称我们是因为不想让他们团结一体成为共同体才会这样反对的。

我们也不能忘记欧洲内部发生的事情。两年前我与一个波兰团体对话，他们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刚刚重新获得独立，又要把主权交给布鲁塞尔。欧洲正在结束一个时期，也许也正在开启另一个时期。正在结束的，是法国人想要通过法德和解来统治欧洲的概念。我们正在看到的则是萨科齐统治下的法国与英国的对话，担心欧洲内部德国人的强大力量。而现在德国国内的发展趋势，并不完全指向一个充满活力的令人鼓舞的欧洲。

短期来看，总会有这些开始和停滞。美国的最佳路线，是欢迎欧洲走向统一的进展，但同时要非常耐心、时刻准备着，无论当前的状态和潮流如何，都要将跨大西洋联盟最大化。



伊格纳休斯：欧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欧洲的民主体系是不是比美国的更易接受呢？我们通常在推广民主的时候有一点像传教。我们对民主如何进行有特定的看法。欧洲人推广民主要少一点传教色彩，这会不会更有效呢？欧洲是不是为向民主政府过渡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本呢？

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趋势。第一个趋势我称之为华盛顿一约翰·昆西·亚当斯（Washington—John Quincy Adams）趋势。我们将自己视为山顶的闪亮之城。我们相信民主是应该走的路。我们正是榜样，证明人能够与其他人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如果其他人想要采用我们的体系，好啊。但是，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去帮人驱魔降妖。我们对所有寻求自由的人都会给予祝福。我们只保障我们自己。

第二个趋势始于伍德罗·威尔逊，他发现华盛顿一亚当斯模式束缚了美国的行动，他相信我们应当成为民主的福音传道者。自那之后就一直有种争论，我们究竟应当接受其他国家的现状并与之合作，还是应当努力将他们变成民主国家。

第三个趋势发生在“9·11”事件之后，随着伊拉克战争而出现。它是对威尔逊理念的修订。现在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播民主，在需要的时候甚至使用武力。而另外，欧洲人，很可能从他们的殖民主义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在行为处事上更加审慎一些。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可以看到，欧洲在扩张欧盟的过程中，迅速成功地吸纳了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你确实能够看出来，在灌输民主价值观以及迅速提供和鼓励民主力量和架构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我们总吹嘘自己是山巅之城，我们的外交政策，每隔一分钟就会推广一次民主。而欧洲人正在切实地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民主，我们能从欧洲人那里学到点儿什么？

布热津斯基：好的，我来总结一下你的问题中所隐含的信息。有一件事，美国对于苏联集团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支持力度，要远远大于欧洲人。欧洲人总是想去忽略不管。施密特总理甚至说，他完全理解为什么战争法必须强加于波兰。所以，那时，团结工会就被镇压了。我们支持这些运动，而欧洲人倾向于更多地接受他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其次，有些中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一样，有深厚的民主传统。波兰在英国

之后不久就有了大宪章。它还创立了政治体系历史上第二部宪法，第一部是美国，而第三部是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在被纳粹占领之前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民主国家。铁幕消失的时候，中欧的这些传统被重新激活了。西欧当然鼓励并帮助巩固这种复活。

大体上讲，欧洲人在推广民主的过程中没有热衷于传教的态度。他们倾向于认为民主是内在的特产，他们多少对于想要强行推广民主的想法抱怀疑态度。我们则是传教型的。但是，像欧洲人一样，我们也曾经是压迫者。我们倾向于忘掉我们历史的这一方面。我们占领夏威夷，赶跑当地的女王，为了农业利益而摧毁当地文化。

斯考克罗夫特：但我们称之为“天定命运”。

布热津斯基：这是“天定命运”，没错。看看我们在美西战争之后在菲律宾干的事。我们声称是解放菲律宾人，但我们向他们的游击抵抗力量开战，这场战争十分激烈和血腥。而且我们只是在40年后才给予他们自由，那是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把我们赶跑之后。当我们第二次回来时，我们对于菲律宾人渴望民主的呼声漠不关心。所以，尽管我们民主传教的记录总体来看还不算坏，但也有它的阴暗面，我们曾经利用民主化作为其他目标的借口，比如在伊拉克，我们也曾经极大地偏离一般民主的承诺，只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这样做方便。

还有一些区别。美国人更积极一些。美国人倾向于采取全球行动主义。欧洲人会更多地考虑他们所拥有的，他们比较喜欢慢慢培养和维护。也许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实现更紧密的大西洋联盟，这对欧美来说都会更好。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欧洲人的吗？除了像法国人喜欢说的那种美国超级力量，假设美国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但有没有什么欧洲人的答案让你更喜欢一点呢？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欧洲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更有条理，更有组织一些，有时也会让人厌烦。我们则会开始和停止，要么全速前进，要么什么都不做。那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应当利用欧洲的特长，去鼓励人们，演示如何去改变，如何去现代化，如何运作经济和政治体系。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领导力问题，我不知道。大西洋两边都变化得非常快，很难去概括。

伊格纳休斯：欧洲人擅长有条不紊的规则。人们很容易会去嘲笑欧盟这帮人，整天没完没了地写那些细小的规章制度。但事实是，他们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非常可靠的商业平台。

布热津斯基：绝对如此。毫无疑问，欧盟以及它对规则和程序的强调，为促成东欧和中欧转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想说，我们能从欧洲人管理内部事务的方式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我们刚才讨论的领域内学到的更多。在欧洲几个较发达的国家，确实没有像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这种极端不公平和社会差异。这样的不公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而且我认为，也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认为我们要向欧洲人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他们在社会内部管理方面，已经日益走向一个比我们更公平，实质上更民主的体系。

欧洲人在处理一些根本的基础建设问题方面，也比我们做得好。我们曾经在工业时代拥有的与美国活力相联系的许多东西，如今已经远远不够了。比如说，美国铁路不足，这是令人羞耻的。我经常乘坐高速列车去纽约。坐在上面就像坐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火车上一样，晃个不停，走得很慢，而且总是晚点。欧洲的铁路系统则完全不同。他们已经拥有我们做梦都没想过要建的火车。

我认为，有几个国家的医疗体系的某些方面也相当好，比如法国和瑞士。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东西。但这些都是内部事务。

斯考克罗夫特：欧洲和美国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欧洲已经发展到他们彼此之间必须融洽相处的程度。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

较大的城市单元中，因此必须有行为规则来规范人们彼此之间的互动。那些难以忍受这种约束性规则的人，往往会跑到美国来。

随着美国东海岸的居住区开始发展到同样需要管理人们之间互动的时候，那些抱怨规则的人又移往我们广阔无人的西部。结果是，美国就发展出一套更强大的憎恨政府的倾向。因此就有了那句话："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

伊格纳休斯：那正是我们的政府。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我们是有这样的政府。不过，关于政府是否管得太多的话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鲜活的政治议题。我们彼此之间不太会容忍，没什么耐心，我们的政治要比欧洲的政治更动荡一些。

伊格纳休斯：嗯，欧洲当然更有秩序一些。你在欧洲旅行，你会看到他们保护环境以及古老遗产的方式。兹比格，你在看这个新波兰的时候，你想到和感觉到什么了吗？这是你出生的土地。它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历过战争和战争之后的洗礼。现在你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波兰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当然，它当前的政治领导层，拥有广泛社会支持的领导层，已经非常欧洲化了。而且有些头面人物，这样说吧，出身于欧洲阶层。这就是说，人们不会感到他们在文化上或政治上低于西欧政治精英的素养。所以从这方面看，有很多的流动性。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越来越喜欢新的欧洲现实。

从外观上来看，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转变。我认为波兰和乌克兰获得 2012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举办权，将为这种演变注入更多的动力，因为它也将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建新的机场、新的体育馆、新的高速公路，还有可能随之带来大量的人员流动。

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但也有过去的阴影。波兰曾经历过一段极端主义的政治领导时期，在政治上和宗教价值观上都非常极端。尽管极大地受益于欧盟成员国地位，但这个国家还有一些非常落后的传统农耕区域，几乎是完全

的农业文化。波兰加入欧盟投票时，农民大多投反对票。他们现在却是欧洲最热情的支持者和最大受益者，这有点像法国的农民，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受益。

伊格纳休斯：在欧洲当一个农民可真好。

布热津斯基：是啊。总的来讲，我对波兰相当乐观。而且，正因如此，我也对乌克兰十分乐观。乌克兰有潜力，而且它与俄罗斯的联系越来越淡，这两点与波兰高度相似。

▶▶▶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刚好今天有一位欧洲外交官来看我，他正代表其政府作一项对美双边关系的研究。他对我说："我们担心跨大西洋关系正在瓦解。"他谈到所有我们刚才谈过的问题，美国的注意力正从欧洲身上转移，转到中东、中国和一个新的日益重要的亚洲。而且他用一种悲观的调子说："我们只担心，下一届政府的注意力必然会从欧洲、我们的传统关系以及我们其他地方的关注点上转移开来。"这种担忧现在较为普遍。我们能给这位外交官什么样的答复呢？

斯考克罗夫特：与其说那是一种注意力转移，不如说那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我认为确实是这样，我们的注意力确实集中在其他地方。部分原因在于冷战结束了，共同的强大威胁消失了，所以凝聚美欧化解分歧的胶融解了。

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这些分歧就浮上表面。于是就出现了我早先提到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欧洲领导者的观念。最后，还有我们的伊拉克战争，这也使欧洲人产生分歧。

而且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还有阿富汗战争，北约在其历史上首次动用了宪章第 5 条。实际上，欧洲人说的是："我们与你们肩并肩。"而我们却说："谢了。我们需要的时候会叫你。不需要的时候别打扰。"

我们进入伊拉克的举动，在欧洲普遍不受欢迎。法国人认为，这种不受欢迎，是法国人担当欧洲民意领袖并且将美国人赶出欧洲的一种机会。当然，英国人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分歧。兹比格和我都说着同样的事情。一个强大的大西洋联盟对美国和欧洲都非常重要。尽管有过去10年中的磕磕碰碰，但是最终我们的理念将会被众人接受。

伊格纳休斯： 兹比格，我们的注意力必然转移到太平洋和亚洲吗？难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全球经济模式的问题吗？

布热津斯基： 全球重心正在向远东转移，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大西洋国家对世界的600年统治正在弱化。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北美和欧洲的综合智力、经济和军力资源，仍然很清楚，如果两者能够被合理地整合，集中用于富有建设性的政策，那么，大西洋联盟就仍然拥有重要的、在许多方面还是突出的地位。但它取决于许多因素，大部分都是布兰特和我刚才谈到的。我们能否激发出共同的战略方向？我们能否找到在共同决策和共同承担义务之间的适当的平衡点？我们能否界定不仅适用于欧美，而且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的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西方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地区。即使我们更关注远东，至少日本需要我们不亚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可能还会更多一些。中国具备成为全球领袖的一切潜能，但在未来几十年内，它将会遭遇大量的基础建设问题和贫困问题。印度还没能证明它是否有能力维持民族团结。印度的10亿人口，都基本上没有经历政治觉醒，他们尚未被动员起来。这样大量的，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差别如此之大的人口，如果在政治上觉醒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西方仍然有许多事要做。但西方真的需要某种领导力，能够确定一个方面，能够在大西洋两岸通力合作。希望我们能做到那一点。

欧洲有同样的领导能力吗？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一些。但我对于某种美国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东西尤其重视，那就是《里斯本条约》，而且它正在运转

前进。甚至连波兰人，布兰特，刚才你谈到的，他们重新赢得主权之后，都不太愿意将过多的主权这么快就再次让渡出去，尽管有民族主义政党的反对，他们仍然在那天以压倒性优势投票赞成《里斯本条约》。如果欧洲其他国家也签署这项协议，那就是迈向真正的欧洲统一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甚至选出一位象征性的总统，恰巧又是一位颇有地位而且有历史眼光的人，那就会是一盘新棋局的开始。

斯考克罗夫特：戴维，你的问题可能是一种“旧思维”的产物。如果你看一看今天的世界潮流，也许说力量正向亚洲转移未必合适，因为全球的能量都在瓦解国家力量，改变民族国家的本质，并且将国家力量打散。结果，从现在开始的几年内，我们现在视之为力量所在的地方，可能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正在重新界定国家力量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向民众展现一种前景，吸引民众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这个世界正在用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创造财富。有了合适的机制，我们应当能够照顾好民众，给每一个人一个更好的生活。所以要问：“你担心西方正在衰落吗?”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认为，从文化和理念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事实。而国家力量的比较，可能比起较早时期来说越发不那么重要了。

布热津斯基：举例来说，中国在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但为什么奥运会如此重要？因为世界上已经有一种全新的影响力和力量的概念。中国人的民族梦和他们的荣耀，都与奥运会息息相关，他们不想自我牺牲。这又回到刚才布兰特所说的观点，我们现在有一种全球化的相互依赖，其他价值观和目标渗透到传统的力量观念中，使得力量观念复杂化。

伊格纳休斯：无疑这个时代中令世界转型的现象，正是开放性。

布热津斯基：还有互动性。

▶▶▶

伊格纳休斯：随着边界的开放，随着求知的网上路径的开放，甚至连最强大最专制的政府也没法控制。

你们二位，用不同的方式，也在我们前面的谈话中表达了这一主题：维持开放性是一种原则，维持西方的欧美意义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正如布兰特所谈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

让我提最后一个问题，美元和欧元的问题。我们开始这场谈话的时候，国际金融市场也权衡着欧洲和美国的相对价值，以我们的货币来比较的相对价值，这种方式让美国人颇为担心。欧元兑换美元是 1∶1.5。美国城市里涌来大量欧洲游客，他们前来挑选衣服和电器，他们觉得这里的东西相当便宜。但这些货币价值透露出关于欧洲和美国的十分重要的信息。

有些人说欧元将会成为美元的对头，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而世界金融之都将会转向伦敦而不是纽约，因为伦敦比纽约更加多元化，从所有方面来看，伦敦都更适合做生意。我们从这种欧元和美元的比值，以及从伦敦较之于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之都的重要性中，能感受到什么惊人的变化呢?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地相互结合。特别是在经济和金融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是自成一体的，但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

我认为我们已经犯下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欧洲人买更便宜的美国货，意味着他们会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更少的欧洲产品。这会增加我们在贸易平衡中的净利润。

现在有些新的势力正使贸易重新获得平衡。在石油生产国和购买国之间，在廉价产品的生产国和购买国之间，贸易不平衡正在加剧。这些不平衡又导致新的因素出现，比如主权财富基金。但我们的处事方式，就仿佛我们自己排除在这些发展之外一般。伦敦正成为世界金融之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设置了大量限制，使得在美国做生意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们削减利率刺激经济增长时，我们也推高了油价。我认为我们需要扩大视野，更多地与其他国家磋商，而不是自己完全独立地去做。

伊格纳休斯： 兹比格，你怎么看待这其中的经济学？

布热津斯基： 我想说，这个领域的美欧合作，与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内的美欧合作同样重要。很明显，当前美国的困境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看看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和瑞士大银行里发生的事。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中，已经过度沉迷在金融运作之中了。美国的负债比例已经相当大了。这已经给长期的社会安全、医疗和其他政府项目敲响了警钟。我们打了一场仗，而我们却不愿意作出哪怕是一点社会牺牲，不管是向富人征税，还是让穷人分担，我们都不愿意去做。相反，我们选择了举债。这并不吃惊，人们对美国失去信心，还对美元有疑问。幸运的是，目前并没有人冲动地要美国为此受罚，没有人一下子将大笔美元债券转换成欧元。但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对这种局面作出反应，压力就会必然指向这样的结局。

我们必须反躬自问，我们采取的生活方式，以及几乎完全将优质生活定义为获得物质财富的方式，是否真的是一种对相互依赖的世界现状的健康的反应呢？

举个具体的例子，每100个美国人就有88辆车。而在印度的10亿人口中，每100个印度人只有1.5辆车。只要想一想，如果印度人和中国人还有其他人认为拥有好生活的标志，就是像我们一样，那将会带来多少能源短缺、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后果啊。所以我们的实际问题部分是经济问题，部分是哲学问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全球问题。那正是我们也必须开始思考的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 你的例子可能是个危险的例子，因为，我理解，印度和中国买车的增长率高得惊人。很明显，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好生活的范本。

我们需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世界财富正在高速制造出来，这是一个历

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速度。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如何分配和利用这些财富使世界变得更好。

伊格纳休斯：我从你们二位那里听到的主题是，即使欧洲改变并扩张，欧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仍然强大而重要。那正是定义西方的纽带。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与欧洲人共事，去推进这些理念，去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进行有效的合作。

欧洲人担心，更多的跨大西洋合作意味着欧洲更多地屈服于美国意志。他们认为，特别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他们正走向不同的方向，走向一个能够更好地照顾其公民的社会，走向一种较之于美国文化更少些喧闹和暴力的文化。他们经常看着我们甩开手。他们不愿意像美国人这样生活，他们想要像欧洲人那样生活。所以这种欧美间的紧张，以及联系大西洋联盟的强大纽带，不仅仅与硬实力、北约部署决策或独立的欧洲安全部队有关，同样也与软实力和那些难以定义的共同文化价值观有关。总而言之，我们想到欧洲，我们想的是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兹比格，我说的对吗？

布热津斯基：两者都是。我有时会用这样一句双关语："要想使美欧关系真正可持续，我们需要美国来一场政权改变，而我们需要欧洲有一个政权。"我们需要美国的政权改变，因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重新定义美国的角色，远离那些自说自话的新现实主义者们的时髦呓语。而欧洲，说白了，需要一个政权。欧洲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

我们需要前面谈到的军事和政治架构，这样我们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才得以导向积极的方向，才能得到捍卫。无论如何，美国和欧洲，彼此不可或缺。

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和欧洲，对世界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

>>> 第七章

文化尊严的政治

戴维·伊格纳休斯：你们二位都是外交政策的实践大师，你们都同意参与这项对话，因为你们都相信世界正在改变，你们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所熟知的规则也正在改变，这些改变迫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今天，我想请你们二位谈一谈这个世界新在何处。我们面临的挑战与你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其他挑战有何不同？布兰特，请你先开始。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我相信，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比近期历史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大。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笼统地说，就是全球化。这是一种人们交流和互动方式的变化，它正在改变着全世界的面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政治上越来越活跃。比如，移民一直都有，但现在流量巨大，因为广播和电视使得人们将他们的现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状作比较，看到他们的机会所在。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有些结果是良性的，有些是不好的。关键在于，这正在改变民族国家的地位，改变国家照顾公民的方式，改变其管理公民的责任的方式。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角色，虽然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正在稳步下降。

我认为那正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整个世界一下子都在改变，这种所谓信息时代实际上正在改变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和机制。在更加发达并且能够接触到现代科技的国家里，这种变化越发明显。而在拉丁美洲，则不那么明显，在非洲则最不明显。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有时似乎网络扮演了舆论

加速器的作用。比如说，对于丹麦卡通片的愤怒，能够一下子传到伊斯兰世界的每个国家，街上会一下子聚起抗议人群。我们到处都看到这样的政治现象。这种加速的愤怒对于外交政策的运行意味着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它使那些过去从来没有关心过村庄以外事务的人们，变得活跃起来。大部分信息的流动，都不需要报纸、电台或电视台的编辑们的参与。比如，在博客中，你可以说这就是世界的方式，没有其他人会编辑它，也没有其他人会说它不对。所以，海量信息直接抵达那些并不习惯于对信息的准确性加以质询或分类的人群。这对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

伊格纳休斯：影响之一就是，网络成了恐怖分子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斯考克罗夫特：那绝对是另一个方面。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这个世界新在何处？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力量和地缘政治等传统问题仍然存在。但超越这些传统问题，而且正在转化传统力量性质的，有两种全新的基本现实。一是人性的主观方面的转化，我称之为全球政治觉醒。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被激活。这是一种始于法国大革命，传播于欧洲，然后在19世纪晚期来到亚洲，在20世纪四处传播的力量，现在则已经是全球化。

其次，是每次真正全球意义上的生存问题的浮现。以前，最大的生存问题，无论是像人为的亚美尼亚大屠杀或是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是干旱这样的天然灾害，都是国家的问题。现在，我们则有全球性质的生存问题。让我们再详细谈一谈这两个方面。

在主观层面上，由于生活水平的差异，这种全球政治觉醒正在制造大量的不宽容与不耐烦。它正在制造妒忌、憎恨、更快速的移民，正像刚才布兰特所说的那样。与此相联的，还有尊重不同文化和个人尊严的一种渴望。大

多数人感觉到富人缺乏这种尊重。在客观层面上，新的全球问题包括环境危机，与天气变化有关的人类环境威胁，某些人强加于另一些人的蓄意造成大规模死亡的极大可能性。我们现在能够非常迅速和容易地杀死许多人。

我曾经写过一些东西，意思是，直到最近，统治 100 万人都要比杀死 100 万人容易。而今天，杀死 100 万人要比统治 100 万躁动、激愤、烦躁的人容易得多。危险摆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正因如此，核不扩散的问题才显得如此重要。

这两个全新的状况，使得我们应对的更加传统的问题复杂化。除了应对传统问题的挑战，我们还有必要理解并应对这种 21 世纪的独特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人类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层面上，都正在经历全新的转化。

伊格纳休斯：但是我们用具有非常传统体制的民族国家，来面对这些全球状况并解决问题。

我以前在哈佛的教授丹尼尔·贝尔，在 30 多年前曾经说，民族国家对于生活中的小问题来讲太大了，对于生活中的大问题来讲太小了。我在想，我们是否需要建立新的架构，用新的方式去处理这些跨越国家的问题。布兰特，你怎么想？那是一个可以追溯到 1945 年的梦想。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确实有这个梦想。我认为我们已经描述了这个梦想的动力所在，这个新世界完全不同，却叠加在由旧世界创造并为旧世界服务的国际结构上。但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可能要比几十年前更负面一些。美国的态度一向很模糊，而现在则更加负面。我觉得，我们幸亏早就有了一个联合国，如果要是像现在这样的世界，我们根本无法坐下来，一起对一个非常有用的联合国宪章达成一致意见。

伊格纳休斯：这样是很可怕的。

斯考克罗夫特：那正是难点所在。这些世界正在互相撞击，政治上负责任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布热津斯基：我补充一点。这场讨论开始的时候，布兰特对有些人正在宣传的民主国家的集合或联盟表达过怀疑。我忘了这些人使用的确切词语，但无论如何，布兰特怀疑这种结合的有效性。而我也同样表示怀疑。有一个原因，我们如何定义民主？谁能进入联盟，谁应该出局？我们的许多友邦都会出局，而有些并非我们真正朋友的国家却在联盟之内，这个联盟没法运转。但从实践上考虑，我们确实要自问一个问题：我们能和谁一起合作，共同应对我们上面谈到的问题，从而达到最佳效果？

我想要强调两个方面：首先，我们知道某些国家大体上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与这些国家合作得更紧密一些。我首先会把欧洲放在这一类中。这就是我为什么极力强调，我们要努力创造对欧真正合作性伙伴关系的原因。工作量很大。这可不仅仅是口号。

其次，我会说，有些欧洲之外的国家也在这一类中，因此我们必须想一想如何使他们加入进来。那会包括澳大利亚，还有日本，这里面有更复杂的挑战。逐步地，将韩国纳入进来，韩国正在将更多的国际责任融入其政策之中。可能还有其他国家。

简而言之，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我们应当对建立国家联盟表示兴趣，这些国家应当能够分担责任解决上述问题，而不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我们应当从与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开始，但然后还要有选择地纳入那些确实想要在这些问题上与我们进行负责任的合作的国家。这会很难，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联盟，这个联盟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世界财富、力量和责任的主体。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可能想要俄罗斯加入联盟，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想要中国、印度、巴西等加入联盟。

伊格纳休斯：有一个问题，这些思维相似的发达国家的集团，怎么才能将法律、秩序和安全播撒到全球呢？政治理论家托马斯·巴内特（Thomas Barnett）写过一本书叫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书中他区分了两类国家，一类是他所说的核心相互联系的国家，秩序井然，也正像布兰特所说的全球化

的国家；还有一类是松散的边缘国家，处于这套秩序之外，而且越来越无序，通常还是专制国家。他认为，挑战在于我们如何将紧密联系的有序规则和条理延伸到整个世界，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一块块的无序地区了。布兰特，你会怎么做？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沿用美国在过去所做的典型方式。我同意兹比格的意见，但我并不想从民主国家开始谈，这没有必要。

布热津斯基：我也不想。

斯考克罗夫特：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从领导力开始谈。不是统治也不是最后通牒，而是领导力。美国有一种领导力传统。比如，国联和联合国，都是美国的创意。这些创意很吸引人，美国有一种声誉，它能够将全人类的利益放在心上，如果美国处在领导地位，它就能将人们召集在一起，劝说他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在最近几年，这种领导力丧失了，部分是因为冷战结束，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了，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内事务中去了。外部世界很好，没什么真正的威胁了。

我们现在正在发现，外部世界并不怎么好，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动员起美国的领导力，并且说，“这是一个全球问题，我们真的需要前进了”，那么世界会响应的。我们已经拥有这种实力或者说是道德权威，我们拥有的程度无人可及。欧洲最终可能会拥有，但它现在还没有，当然没有其他力量中心拥有这种实力。那就是我们能够做的，而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做得不是很多。

布热津斯基：让我也补充几句。要想这样做，总统不仅要担起全球领导的责任，他还必须在国内领导力方面作出切实的努力，因为，最终，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最终，除非获得总统、国会和公众共同作出的国家承诺，否则美国不可能真正在国际上做出什么。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确实要求美国人

重新思考当今世界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以及美国的主要责任在什么地方。

在现在的形势下，人们很容易滑入偏执的情绪中，因为反恐战争定义了一切，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斗争是压倒一切的策略。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将永远不能触及我们正在讨论的任何问题。但仅仅抛弃这些宣传标语还不够，我们真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公众教育。下一任总统要比从前任何一任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必须在这些问题上成为一位国民教师，作出高度集中和智慧的持久努力，使得美国人民认真思考 21 世纪新在何处，我们面临的挑战有何独特性，以及美国要想维持一整套不同层次的联盟体系以整合集体行动的话就必须去正面应对的原因。

伊格纳休斯： 兹比格，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挖得更深一点。你写过关于全球觉醒的文章。我们在对话中也谈过，而且你也描述了全球对尊严的渴望。不仅是渴望一种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更高水平的生活，而且是渴望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尊重。美国怎样才能用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去把握这种对尊严的渴望呢？

布热津斯基： 首先，避免羞辱其他人。我害怕我们大量关于“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有关”的谈话，很不幸，这已经在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聚集地区引发了太多的反美仇恨。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在谈论爱尔兰共和军时使用同样的词汇，比如不断谈论他们如何企图在西欧建立教区，谈论这是一种天主教的密谋，谈论这是反美天主教侵占军，那我们当然会令大多数天主教徒反感，同时也包括美国国内的 6 500 万到 7 000 万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必须在措词上非常小心。

其次，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对尊严的渴求与社会差异的觉醒有关。感到被剥夺尊严的人群，以及那些现在能够通过电视看到自己相对于其他人多么贫穷的人群，只要他们感觉到富人正在加剧这种现状，他们就会憎恨富人。

所以，我们必须投身于某些特定的事业中，比如消除全球饥饿。在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仍在挨饿，我们需要主观的努力为贫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我们必须在卫生医药方面做更多的事情，为世界上最穷困地区的人创造更好的学校。这都是明显需要美国介入的事情，一种开创性的角色，这对我们很有帮助。最后，而且十分重要的是，那需要我们反躬自问，无限地攫取财富是否是生活的最终目标。这个问题不仅是向那些仅仅想拥有物质财富的人们提出的，也是向我们的政治精英们提出的。那些公司高管们，他们从事着的行业通常采取毁灭性的只看眼前利益的短视政策，在他们的金融机构破产的时候，他们自己却领着成百万上千万美元的薪酬。这个世界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明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所以，大量的问题已经溢出政治领域，进入文化和哲学领域，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加以思考。

▶▶▶

伊格纳休斯：我们正在谈论更好的生活价值观。布兰特，领导力之所以神秘莫测，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总统如何用让世界接受而不是反感的方式来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小布什当然自视为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但世界对他的反应，却是拒绝。

斯考克罗夫特：问题之一在于词汇的使用。我们到处在讲自由之类的词，但自由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自由从何而来呢？拥有自由去做什么呢？自由的限制又是什么呢？这都令人费解。相反，我们应当谈谈尊严，个人的尊严。尊严比较容易理解。如果你把这个观念融会于心，它就会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比如，我们目前的移民问题，已经形成的压力，导致政府将非法移民集中遣返。但他们不是爬过美国边境的动物，他们是人。他们来到美国，大多数人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寻求更有尊严的生存。

如果我们聚焦于人类尊严，它就能帮助我们处理兹比格所提到的问题。我认为，致富并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想一想人们的尊严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福利，这正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做的。

伊格纳休斯：那么一位总统如何表达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呢？在实践中总

统应当做哪些具体的事情?

布热津斯基：好，我在此愿意作一点儿个人表白，到这本书出版之际，奥巴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美国总统。但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奥巴马，除了他与生俱来的那种智慧，我还感到，他的当选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是对其他人尊严的一种尊重。我说这话，并不是要为他作什么政治宣传，而是说，根据他的自传和他的身份，他自己就已经创造了一种对于多元化的集体尊重。这也是一种对尊严的尊重，因为有了尊严，才能使对多元化的尊重成为可能。

尊严对于每个人而言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个概念全球化，不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世界划分成有高等文化的高等国家和有低等文化的低等国家。那种观念不可能在21世纪存活。它会导致混乱、暴力和憎恨。仅仅奥巴马这个人，以及他的经历，就代表着一种方式，一种总统可以用来回应世界的方式。

另一种方式就是去面对问题。麦凯恩的个性非常吸引人。你在这个家伙的身上能够感觉到一种英雄般的优雅气质。如果他把这个问题当作他的智力挑战，我认为那会帮助他提高人气。我非常希望他不要去搞那种反对侵占军，也不要将这种侵占军当作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因为我认为那对美国来说是自我毁灭，对他个人也是如此。我认为他的个性、智慧以及辉煌的历史，都体现出他投射出另外一种信息的能力。

斯考克罗夫特：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在建国之初就说过，人生而平等。但是这些话写下来的时候，美国还有1/3的人做奴隶。我出生5年之前，女性才在全美范围内获得选举权。

仅仅谈论尊严，仅仅宣称一个人应当视为与另一个人具有同等价值，这很重要，但同时也要体现在他的行动上。我认为巴拉克·奥巴马代表了这些价值观，希拉里·克林顿也能代表，约翰·麦凯恩也能代表，他对移民的态度，对关塔那摩的态度，以及他反对虐囚的立场，都能体现出来。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关于尊严，关于你如何对待其他人。

伊格纳休斯：当然，这种人类身体和灵魂的尊严感，麦凯恩，一个经历过对个人尊严最恶毒的羞辱的人，一个曾经在越南北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被折磨过的人，下定决心不要让他所经历的事情在其他人身上重演。他甚至通过违抗小布什总统来这样表达自己。

布热津斯基：那会增加他的声誉。

伊格纳休斯：是的，这会增加他的声誉。所以我们有三位全都能回应人类尊严问题的可能的总统。

斯考克罗夫特：用他们不同的方式。三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解读着人类尊严。

伊格纳休斯：“尊严”一词用阿拉伯语来说，是 karameh。对于阿拉伯人来讲，这是个非常强有力的词。我 30 年来走遍中东，我认识到这正是人们不会放弃的东西。你可能打击他们的尊严，你可能奴役他们，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也触及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很担心的话题，现在，我想直面这个话题：在过去 7 年的错误和困难之后，我们是否正陷于文明的冲突之中？

我们并不希望这种冲突到来，也并不认为这种冲突必然到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对美国感到愤怒。对于穆斯林来讲，阿布格里布（Abu Ghraib）监狱里的受虐囚犯的形象永远无法抹去。对此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除了我们关于尊严的动听言辞之外，我们如何避免许多人担心的那种横在我们面前的裂痕呢？

布热津斯基：这不仅仅是新总统的问题，也不是他的个性或他的言辞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美国人应如何被鼓励重新思考我们在世界上应该做的事的问题。这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问题，尤其是总统就职后不久，我们做些什么来处理中东问题，这些问题导致长期存在的对美国的仇恨。我们需要做

很多事情，但这一系列事情再也不能拖延了。据我看来，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应当有一种紧迫感。当然，布兰特和我可能在处理的速度上有些不同意见。

人们当然会有种感觉，认为我们在推进以巴和平问题上既懒惰又无能。巴以人民都想要和平，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想要和平，我们必须是缔造和平的人。

还有更宏观的问题，我们如何与伊朗打交道。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处理伊斯兰传统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简单地归结为基地组织。如果我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不那么小心的话，我们就可能被缠绕在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的仇恨中无法自拔。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在自己身边制造恐惧氛围，这于事无补。这种氛围是致命的。我们在反恐战争中形容穆斯林的方式，与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容德国人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把他们非人类化，将他们变成某种仇恨和恐惧的目标，变成敌人。但基地组织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敌人。这是一小撮有着明确目标的团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正在过海关的人名叫穆罕默德，你就把他拉到一边剥光衣服搜索他。但我们在遭受恐惧的环境中确实会这样做，这种恐惧已经弥漫全国。这种恐惧才是我们要对付的敌人。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恐惧对我们这个民族做了什么？

布热津斯基：它让我们更易受宣传蛊惑。宣传让你更容易作出仓促的决策。它歪曲了你的现实感。它也将你的资源导向可能并非最重要的领域。看看现在美国的生活环境，电视上、电台里、报纸上到处都是强调安全、国防和武器的广告，简直是无处不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这让我感到震惊。我们的国防预算，实际上比整个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总和加起来还多。

斯考克罗夫特：而且现在这样大的国防预算，在国内遇到的争论，却比

我一生中任何时期都要少。

布热津斯基：就是这样。人们默默地接受它，因为我们全都吓坏了。我们在华盛顿的这座大楼内会面，我们必须经过这种白痴一样的安检程序才能进来。这种安保措施潜藏的意思就是，本·拉登正坐在巴基斯坦的某个山洞里，计划去炸这座容纳了几家发展银行和几家法律公司的大楼。我们的恐惧已经达到了一种偏执的境地，似乎美国以外的世界正在联合起来，用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军队来摧毁我们。那难道是一幅真实的世界图景吗？抑或只是官方煽风点火弄得四处蔓延的典型偏执妄想呢？如果要我因为什么事指责我们的高级官员的话，那一定是故意煽风点火制造恐惧。

布兰特在白宫任职时，以及我在白宫任职时，我们都生活在压力的环境中。6 个小时之内，一半的美国人口可能被毁灭。我们竭尽全力制定理性的外交政策，使得遏制政策变得可能，使美国人民安全而自信。而我们在过去 7 年中却没有这样做。

斯考克罗夫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美国何曾像今天这样故步自封过？没有。确实，今天的威胁不一样。但我们处在危险之中，那种一向以来的美国理想，那种我们相信生活会更好，相信世界会更好的理念，有逐步沦丧的危险。

布热津斯基：我们已经丧失了自信。

斯考克罗夫特：还有闯出去做好事的乐观主义精神。那才是美国的象征，是我们能够有现在成就的原因所在，也是为什么整个世界过去一直偏爱我们的原因所在。即使在我们犯下如此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时，大多数国家仍然说："不过，他们的意图是好的。"现在，全世界都起了疑心，怀疑我们的意图究竟是否是好的。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形象。下一位总统需要开始这一修复工程，使我们再次成为人类的希望，这才符合我们自己的定义，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传统上对我们的定义。

▶▶▶

伊格纳休斯：你们二位经常被人称为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你们二位总是将美国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制定出能够推进和保护美国利益的政策，而我发现，在这次的谈话以及在所有我们其他的讨论中，你们都在谈论价值观，这让我感到吃惊。未来的美国领导人如何结合这两种方向，将捍卫利益的现实主义与为民众和国家导航的价值结合起来呢？兹比格，这可不容易做到。你曾与卡特总统共事，他有时把握得很好，有时也会搞错。

布热津斯基：我们一向如此，有时把握得很好，有时也会搞错，因为你说得很对，这可不容易做到。我将自己在白宫期间的回忆录取名为《实力和原则》。而且我并不知道自己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会这样来界定自己。

在我看来，如果你投身于治国之术，你就必须面对力量现实。力量是一种威胁，但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如果你足够聪明，而你又有必需的力量，你就会用推进本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方式来使用它，但那还不够。力量必须被原则所驱动，于是理想主义的元素就包容渗透进来。你必须自问，生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国家生存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人类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作为人类有何共通之处？

而你在利用力量以推进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努力提高全人类水平两者之间，尽力取得平衡。要想两者齐头并进，并不容易。但你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你绝不能愤世嫉俗或过度挑剔，因为那样只会令道德沦丧，在道德上不可能持久。你必须保持历史自信感。你必须拥有一种气概，相信你正在做的事情，多少会是正在铺展开来的神秘历史画卷的一小部分，而你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今天我们热烈谈论的话题，正是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舞台上，表演刚刚开始，我们如何为美国处理现实问题确定一条路线，而这条路线又将导向这个更大的目标？小布什总统在他最新的国情咨文中说，21世纪的决定性特

征将会是反恐斗争。这是一个荒谬的论述，首先因为现在是 2008 年，所以我们还有未来的 92 年。这样早就定义一个世纪的特征，未免不太成熟。布兰特和我今天所做的，正是努力摸索出 21 世纪挑战的更复杂、更成熟的定义，并在这一定义的大背景下，如何让美国国家政策结合力量与原则，走上正轨。

斯考克罗夫特：给一个人贴上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标签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我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人们写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在冷战时期，经常有"左派"批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我更专注于苏联的军事危险，而不是其核武器库的存在。现在我则被"右派"批评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这些事情变来变去。我仍然是同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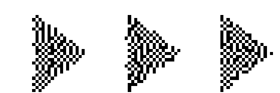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是每一个学习国际政治专业学生的圣经。它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之一。最核心的内容，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是一场权力斗争，而权力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国家努力扩大自身的权力，或者是集团权力，以对抗其他集团。

不过，那是现实主义的极端体现。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对成功界限的承认。它不是你的目标所在，但却指出你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做的事。理想主义者则从另一端开始，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成就什么？但它却可能忽略了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以及在努力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你是否做了一些摧毁你达到能力而且牺牲你最终理想的事情。区别在于你从哪一头开始，而正如兹比格所说，你如何平衡目标和手段。你会想要跳起来摘星星吗？或者你会陷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之中，甚至都没有提升目标的心情？我们需要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极端之间获得平衡。美国应当努力去实现比它能够达到的目标更远大一些的目标。

但不要好高骛远。在我们自夸要让整个世界都民主时，这个目标太大了。而在努力达到这样的目标时，正如我们现在目睹的，我们冒着弊大于利的风险。

布热津斯基：最终，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全都会犯错。两者之间的

平衡是一个梦想中的目标，但我们通常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偏向这边，或倒向那边。这是人类生活的内在常态。因此，总会有关于我们是否过于现实主义或过于理想主义的争论。



伊格纳休斯：我们美国人常会被人指责什么都想要，那些相互冲突的东西也全都想要。我们想要税收更少一点，服务更多一点。我们想要自由，也想要保护来抵抗对手。这种想要一切的习惯在我们想要现实地处理21世纪的问题时，成了一种障碍。

举个很明显的例子，你们二位都同意，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是这个世界上的现实而且日益增长的问题。要应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接受碳排放限制，要么通过税收，要么通过其他体系来调节，那将会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总统如何领导民众做这样一件对每个人来讲都很困难的事情呢？不仅是每个人都很难去做，而且我还认为，对于美国人来讲，要为我们和全世界的长远福利而放弃美妙的财富和机会，这才是最难的部分。兹比格，总统如何教导民众去做这件事呢？

布热津斯基：这里面没有魔术，但必须从你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开始，也就是必须有总统的行动。总统的位置独一无二，他可以教导全国，定义长期的公众利益，并将这些利益融入更广阔的全球框架中。只有总统能这样做。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定义优质生活。无休止地攫取物质财富，更大量地消耗能源，难道这是优质生活的终极目标吗？这样的生活方式怎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持续？

我认为，人们不会很快就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当然不会在一任总统的任期内就清醒地找出这个答案。这是一场始于国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能为物质目标界定全球标准的大争论，在当今的全球时代中，这场争论将会就该标准是否与可持续的全球生存相适应进行探讨。我们不会很快地主动在生活方式上作出重大改变，但这个问题必须放入国家日程中来。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首先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在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中，我们基本上都在自我蒙蔽，以为我们制造出来的污染物会自动消失于大气中，以为大自然或许仍然很慷慨。污染物倒入海洋，排入空气，我们以为污染物就不见了。现在，我们则开始意识到这些污染物根本就没有消失。而大量污染物的制造，人口和文明的增长，正在击溃大自然吸收污染的能力。这正是美国人需要理解的基本事实。

伊格纳休斯：在我们描述的这个世界上，美国是否需要考虑一种不同类型的主权？我们有独特、优良的地理位置，国土东西两边都是海洋。我们不仅是建在山上的城市，我们还是建在一座高山上的城市，很难被人攻击，所以我们习惯于一种极端主权的概念。但我们是否应当在 21 世纪思考一下某种更加相互依赖的主权？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的生存依赖于与其他行为体共同处理全球疾病、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问题的能力吗？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必须这样。环境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美国能够动用我们所有的规则，但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愿跟从，这样做就没什么好处。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会说："你提出限制很好，因为整个工业时代，你都在排放污染，你并没有作出赔偿。现在你却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发展付出代价。不，我们不同意。"

我们必须谈判。我们必须跨越国家疆界。这类问题，无论是世界如何处理日益增长的石油供应引发的电力短缺问题，还是气候变化问题，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解决。这些都是必须合作解决的问题，这就又带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什么样的合作机制？国际组织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也涉足一些贸易领域，而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国际组织很少涉足。但今后国际组织应当参与，我们越早这样做，我们在危机中被迫这样做的可能性就越小。

布热津斯基：你问及国家主权，这又将问题拉回到我们关于单个的个人或决策群体身上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复杂关系的大讨论中。

我认为，对国家主权重新定义的要求，是贯穿在这些讨论之中的。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非常小心，即使一直想着国家主权的问题，也不要过早地谈论它的重新定义，因为主权是可能在民主的美国社会中引发反响的国际关系的导火索之一。美国公众已经在独一无二的环境中稳定而封闭地生存了数百年，他们把主权视同于他们的身份。处理这类国际问题需要首先对主权的组成部分加以调整或重新定义。但如果我们过早地谈论，为了处理这些问题而牺牲主权，我们可能就会一手制造出阻碍问题解决的民族主义情绪。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为什么美国人不懂得绕个弯子解决问题，难道这不正是原因吗？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增加税收，需要改变社会安全计划和应得权益计划的结构，但我们知道公众会反对。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碳排放税以减少它的排放，但公众也会反对。所以甚至没人想过绕着弯子去做。要把不可说的东西说出来，这不正是领导者的责任吗？

布热津斯基：不过，这正是那些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想要为难那些既有理想又希望行之有效的现实主义者时的典型反应。那正是困境所在。

斯考克罗夫特：但作为一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认为，正确的方式不是在一开始就大谈我们必须放弃主权。相反，我们应当谈论问题本身。

布热津斯基：正是如此。

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让这个事实逐渐到来。千万别让这个问题冲在最前头。

布热津斯基：完全正确。

斯考克罗夫特：因为这样的话，它就成了一个障碍。

▶▶▶

伊格纳休斯：我认为你已经用“理想的现实主义”一词很好地概括了这场讨论。或者用兹比格的话讲，“狡猾的现实主义”，表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做完所有的事。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编辑威廉·弗鲁赫特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美国的优越感有关。有时，似乎美国人将世界划分成两类：已经是美国人的人，或者可能成为美国人的人。我们假设所有人都想要像我们一样生活。

布热津斯基：那正是问题所在。

伊格纳休斯：所以问题就来了：说所有人都想要像我们这样生活，是否贬低了，或者说无视人们的尊严？可是，如果反过来说，我们有这些自由，而其他人不需要这些自由，那会不会更加贬低了其他人？你怎样去尊重人们之间的差异，而又不会说出类似我们有权享受而他们不必拥有之类的话，比如说女性的平等或民主？

斯考克罗夫特：美国人的优越感确实来自人类尊严的理念。人们想要提高生活水平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想成为美国人。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我们认为我们设计的生活就是通往更好生活的最佳道路。但那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必须跟从同样的道路。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那种所有人都必须像美国人一样的想法，实际上歪曲了美国人的优越感。也许我们只是略有领先。这正是我认为解决困境的办法。我们与其他人一样，共同为全世界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布热津斯基：但美国人这种更好的生活，是在相对较少的人拥有极大量资源的环境下形成的。这些人的数量逐步增长，发展成一个社会，然后这个社会崛起、提升，逐步走向富裕。比如，我在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来到

美国，那时美国的人口是1.2亿，而今天是3亿。我们通向财富的道路不可能在印度、中国或非洲复制。那些地方有上百万甚至上亿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所以我们社会的成功，正常来讲，可以被其他行为体视作相关参照物，但我们创造这个社会的方式却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复制。其他人必须走其他的道路。那就意味着与我们运作的方式和构建的体系有重大差异。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你是对的。但我认为我们的体系与社会进程，在全世界创造了价值。比如，看一看中国。如果你比较今天的中国与50年前的中国，就会发现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

布热津斯基：是，但走的是不同的道路。那正是我的观点。

斯考克罗夫特：那正是为什么我说，必须采用不同的措施的原因。

布热津斯基：正是如此。而且我们必须宽容。

斯考克罗夫特：去开发印度。而且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它们有多种方式去做，但它们不可能采用我们的方式。

布热津斯基：正是如此。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经验教条化。

伊格纳休斯：美国人这种认为自己特殊而独享天赐的优越感与企图将我们的价值观播撒到全世界的倾向，组合在一起是否有问题？我们是特殊的，是否每个人都必须像我们一样？我周游世界看到的一件事，就是人们即使会写错，也总想要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这又回到尊严感的话题。这是我的历史，不是你的。即使你是对的，我也不想用你的方式来做。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做。

而接受人们书写自己历史的愿望，有时意味着接受他们可以写得很糟的可能性。

布热津斯基：是写得不同，不是很糟。

伊格纳休斯：不同于我们的方式。

斯考克罗夫特：这正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历程。100多年前，当匈牙利人被奥地利人征服时，自由意味着摆脱帝国的控制。那正是伍德罗·威尔逊面临的世界。今天，自由的含义则有所不同。

布热津斯基：威尔逊主义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在于它与欧洲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相吻合，它给予渴望自由的人自由，非常及时地关注了人们的身份认同。独立的欧洲国家的崛起以及帝国的解体几乎与威尔逊所谈论的进程完全一致，因此美国成了这种自由的象征。

我在《第二次机会》一书中就高度关注主权的概念，其中的原因在于，今天，在这个政治上觉醒，意识到全球差异的世界上，人们真正寻求的是一种尊严，而不是自由。人们想要他们生存中的尊严，想要他们有尊严地给予孩子有意义地生活的机会，想要其他人给予他们尊重，包括对他们文化和宗教的尊重。

我在写那本书的时候，这种想法就盘踞脑海。刚刚想到这个念头的方式很奇怪。我当时正在听一场足球运动员之间的赛后讨论，尽管他们都声称上过大学，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有教养。而他们无论庆贺胜利的一方，还是哀叹失败的一方，都频繁地说着这句话："他们不尊重我们。"我对此深感震惊。由此我想到，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类感情。

伊格纳休斯：人们需要尊重？

布热津斯基：是的。而世界上许多人恰恰感到，美国没有尊重他们。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但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如此之快。回到1848

年的匈牙利革命。匈牙利人树起了类似于自由女神像之类的纪念碑。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我们的理念，并且请求我们帮助。我们的反应，则是只给出口头祝福。我们希望他们成功，但这不是我们的战斗。

伊格纳休斯：但威尔逊使之成为我们的战斗。

布热津斯基：是的。那正是为什么威尔逊在欧洲受到欢迎的缘故。而恰恰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正相反，比如在伊拉克，很悲哀地说，我们被人憎恨。

斯考克罗夫特：而世界也不一样了。威尔逊也创造了南斯拉夫，为此南斯拉夫人向他欢呼。而现在他们还是分裂了。

伊格纳休斯：在这个新世界上，我们需要接受我们不但不优越，而且我们仅仅是世界公民的想法吗？

斯考克罗夫特：不，我不这么认为。

布热津斯基：我们是优越的。

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有优越感，我们给予希望，我们告诉人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得更好。

布热津斯基：我们有优越感，还在于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复制我们的经验，复制我们这种资源和人口的不对称。但是，在我们承认自身优越的同时，我认为，我们也应当承认，某些渴求是全球共有的，特别是对尊严的渴求。

斯考克罗夫特：还应当承认，渴求要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但不可以不实现。

第八章

最初的一百天

戴维·伊格纳休斯：我们谈论到许多新政府将要面对的外交问题。现在，让我们转向更加实用的细节，如何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去应对世界以及你们二位所描述的挑战。我想请你们二位站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角度上，用高度实用的语言，谈一谈新总统在上任最初的一百天之内如何对我们谈到的这个世界作出反应。布兰特？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但我们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的结构，特别是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以及相关机构，却是为冷战而设置的。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创立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建立了空军、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所有这些都是为冷战，并且基于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教训而设置的。这个结构没有改变。我们已经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扩大：克林顿增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小布什增加了国土安全委员会。

所以我们开始扩散此类结构以应对不同的课题。但我们缺少一个能够应对跨越传统疆界问题的体系，比如，既有军事功能，又有战斗功能，既有重建功能，又有公民社会构建功能的体系。我们的政府内部没法处理这类事务。那将是新总统的首要需求。

伊格纳休斯：你会创造一个新的委员会吗？

斯考克罗夫特：不会。但我们会用新的眼光回顾《国家安全法》并加以

修改。我们在情报部门作了一些改动，但是这些改动是否足够，还不能过早地判断。比如，《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外情报属于中央情报局管辖，国内情报属于联邦调查局管辖。在冷战期间，这一体制运作得很好，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情报搜集都在国外。但恐怖主义使得这种分工变得毫无意义。通过“9·11”事件，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机构，两套不同的行事逻辑，我们想要跨越官僚障碍传递信息。

伊拉克是另一个例子。一旦萨达姆政府被摧毁，我们就为伊拉克派去美国行政长官。那么他为谁服务？好吧，他首先为国防部工作。其次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再次，他为——这确实让人困惑。还有在阿富汗，没有一个总体的管理。

伊格纳休斯：当然，在伊拉克，问题的一部分在于真正的政策制定，真正的战略，有点被机构间的扯皮消耗掉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的。

斯考克罗夫特：还有人员问题。一个要去重建政府的机构应当由什么人组成？在伊拉克，我们寻求志愿者，因为没有一套系统的方法。你需要法官，你需要警察，你需要所有的一切，而我们都没有组织好一个体系去提供。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你会在最初的一百天内做些什么，从而让体系运转以修补问题呢？

布热津斯基：好的。假设下一任总统想要在界定外交政策方面有所作为，假设他或她不会为国内政治问题忧心忡忡——有时确实会是这样——那么我将首先，劝说下一任总统选择他相当熟悉并感到能够舒服地与之共事的人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而且，他需要与此人有一种思想上的沟通。这一点相当重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总统非常近，通常会看到总统。他必须愿意代替总统行使权威，

必须有能够代表总统观点的自信。所以他必须是一位让新总统感到舒服的人，但也是一位有其自身分量的人。举个例子，我认为，赖斯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所遇到的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确实在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的面前资历不够。她没法在政策制定中起到协调和贯彻总统领导力的作用。

其次，我会告诉总统，总体上美国政府缺乏某种有效的集权化的战略规划体制。国务院自说自话，以为对外事务就只有外交。国防部有一大堆规划机构。但总体而言，我们却缺乏一套有效的规划机制，就像艾森豪威尔治下的那种特殊的规划委员会，我忘了它当时的名字，是在鲍威（Bob Bowie，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译者注）领导下的那个。我认为必须有步骤地在白宫重建此类机制，这是非常及时的。此类委员会还能为规划机构和国会领导层提供非正式商讨的机会，从而维持一种涉及长远规划的政府高层间的持续对话。

当然，这个规划委员会应当从属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今天这类机制的某些方面已经存在——布兰特，你当年可能也有类似的安排。亨廷顿当时负责我的安全规划小组。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深思熟虑的安排，使得美国政府的核心层，而不是边缘，能够把握战略规划，这一点很重要。

再次，与布兰特所说的有关，而我认为他的判断绝对是正确的。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功能界定方面有一种内在的桎梏。部分原因在于各部分结构的复杂性，还有，正如布兰特所说，当前的行政安排是冷战政策的延续。但这些安排同时也反映了150年来的传统。有一个外交部。有一个战争部，过去是这个称呼，现在叫国防部。还有其他具体部门。我认为，这些部门划分中的隔阂已经超出了它们的效用。

现在，我认为，一位新总统可以立即着手进行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改造。但如果他只想改造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考虑到有些重大事项需要在他头几个月内占据更多的注意力，那么他也许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紧急着手发起某种完全不同的机制倡议。

我想到的倡议内容如下：它应主要涉及建立一支执行总统任务的团队，这种团队不是像国务院或国防部那样按功能组合，而是按任务组合的。每个

部门都由一位总统代表率领，他必须是一位资深人士，至少要与内阁成员一样资深，甚至更加资深，他们被派来处理团队面对的问题：全球气候、环境，或者其他任何问题。如果民主党获胜，很明显，戈尔就是率领环境任务团队的理想人选。它能够吸收不同部门的资源，但它能在总统代表的率领下单独行事。

还有两个要求立即着手并且需要更多主动性的问题需要任务团队。这两个问题所需的关注度与主动性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架构所能提供的范围。其中一个是中东问题。尽管这里的问题会更多，而且也许布兰特会表示反对，但我希望同样派一位总统代表，我想要一位由总统代表率领的团队处理布兰特和我讨论过的涉及中东的各类复杂问题。因为那非常紧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伊格纳休斯：集中精力处理巴以纠纷？或者让这个人同时处理伊朗和伊拉克问题？

布热津斯基：也许三个问题可以一起处理，因为它们相互关联。我想立即任命第三位总统代表，去率领一个处理联盟关系的任务团队。我们怎样与欧洲打交道？我们怎样在一些大西洋联盟行动中纳入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不要将它们纳入北约，但要与它们达成伙伴关系，从而增强北约对全球稳定的贡献。一个任务团队在需要关注度的问题上，将有助于克服束缚并迅速聚合行动。

伊格纳休斯：难道不会出现削弱国务卿权力的危险吗？名义上应当是国务卿负责这些事务。

布热津斯基：是的，国务卿名义上负责这个世界。但实践中，却很难处理。结果是，即使再紧急的事务也只能得到三心二意的关注。看一看中东。赖斯是想集中注意力。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我确实要部分地委过于她，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她确实负担过重。有许多其他问题，并不那么十万火急

的问题，并不迫切需要破除官僚束缚的事情，可以用更传统的方式来处理。

伊格纳休斯：当然，每项政策都需要有个着落，希尔负责朝鲜和六方会谈，伯恩斯负责欧盟以及在伊朗问题上形成共同政策，这才有更多的成功和效率。所以，这也证明了你的立场。

布兰特，严格地说，机构间的体系，使得白宫得以在需要的时候组成临时任务团队，以处理紧急的政策问题。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中，你会有来自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相关机构的代表济济一堂共商政策。可在小布什政府内，这个机制似乎运行得并不怎么好。坦白地讲，我也不确定，在克林顿时期它是否运行得好。但在老布什时期，你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这种机构间的进程怎样才能更好地运作，使之更有活力更灵活呢？

斯考克罗夫特：机构间的进程基本上按照总统所期待的方式来运行。每一届政府都基本上在做同一件事，但是是以不同的方式，这取决于总统希望它如何运作。我可不认为这种机制会有什么魔力。在这个层面上，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性。正如兹比格提到的，在小布什第一个任期内，赖斯的资历比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要浅。事实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是在级别上比所有委员会的固定成员都低。

伊格纳休斯：级别上，但不是实际上。

斯考克罗夫特：级别上。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需要以总统的权威来说话的能力，那才是关键。在主持这类临时会议时，我并不想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过度操劳。但假设你让所有的内阁部长们都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员，但他们却只参加相关议题的会议。每一位内阁部长在其所辖部门内都有一个联络办公室，它被称作国家安全事务办公室。你主要做着兹比格刚才谈到的同样的事情，但你不会在这里有一个团队，在那里又有一个团队，相互独立地运作。它们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你有足够的分工与责任使之运行。

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架构。兹比格，你说问题很严重，这绝

对是正确的。你我所供职过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已经无法应对今日庞大而复杂的问题。

伊格纳休斯：我对数字很好奇。你手下有多少人，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我努力控制主要成员的数目，真正的人数不到50。

伊格纳休斯：你手下呢，兹比格？

布热津斯基：差不多。我想，我们一开始是35人，最后大约是50人。加上辅助人员、军事人员、中情局人员。整个团队加起来有125人到150人，是吗？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现在更庞大了。我有一位副手。

布热津斯基：我也一样。

斯考克罗夫特：现在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则有7位副手。过于庞大了。对于总统而言，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无数优点之一，就是它的灵活性。如果一位总统找一个部门去做点事，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则能迅速行动。保持对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非常重要。但它的权威范围扩大得太厉害了，这个机构不可能一方面覆盖每一个领域，另一方面仍然保持其快速反应的能力。

布热津斯基：我要提出新总统需要的事务的另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很难表达出来。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最独立、最清醒、最具自我批判精神的总统，也会非常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内头脑发热。白宫的氛围是溜须拍马的温床，人们相互争斗以得到总统的青睐，总统很容易丧失自我的真实感，以及在更大的范围上，丧失对世界的真实感。

总统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两个领域内，都有不从事任何一项职责的亲信。这样的人必须是麦凯恩、希拉里或奥巴马身边长期熟知的朋友，他能在私下里对总统说："你说的那些，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说这话，用不着担心失去他们的影响力或失去他们的友谊。这一点太重要了，特别是在一个我们所谈论的高度复杂的世界中，尤其重要。

斯考克罗夫特：兹比格，那被称作"厨房内阁"。

布热津斯基：是的，也许算是吧。但意义不一样，这些人不是用来提供替换性政策建议或作决策的。而是仅仅冷眼旁观，坦率、无畏地提醒总统他们所看到的问题、不足或缺陷。我不知道如何去定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的人。

在我观察小布什两任总统任期的种种举措时，以及我思考自己和约翰逊总统的种种举措时，我真正觉得需要警醒的，正是这种谄言的毁灭性力量。

伊格纳休斯：你觉得你能对卡特总统保持诚实吗？

布热津斯基：是的。但我此前就熟知他。一开始，我对他保持诚实非常容易，而此后，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对他保持诚实。在白宫的那种氛围之下，保持诚实不容易。我必须对自己说："我的职责就是要告诉他。"但我们只会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对他说。而且我能说很多，我真的曾经在某些问题上不断地烦他。我真的这样做。我会走回去，我会反复地与他争论。在整个 4 年任期中，他只有一次反对过我。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他的秘书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面，非常程式化地将一只信封放在我面前。信封是绿色的总统信封，上面写着"兹比格"的抬头。她就站在那里。她显然知道信封里面是什么。于是我打开来。

里面写着："兹比格，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吗？吉米·卡特。"现在，让我告诉你，我非常赞赏这封信。他没有发脾气。他没有冲我吼叫。他没有恐吓我。他只是说："来吧。把它放下一会儿。"我真的很赞赏这种方式。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与老布什的关系很特殊。你俩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斯考克罗夫特：这正是我前面所说的。在这个层面上，绝大多数的事情取决于个性。我与老布什总统的关系非常亲密。我服务过三位不同的总统，每一位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获取信息、建议并作出他自己的决策。而你必须在履行职责时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被服务的方式，他们就会建立另一套他们更喜欢的体系。然后就会出现与你对抗的声音和组织，那就无法运转了。一个新的架构可能是需要的，但它必须有适应总统的灵活性。

伊格纳休斯：如果你认为他做得离谱，你会告诉老布什吗？他真是一位绅士，我想有时冲撞他确实比较困难。

斯考克罗夫特：那要取决于你怎样去做。这仍然是关于个性。我试过几种不同的方式。但底线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必须告诉总统你认为他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布热津斯基：绝对如此。

斯考克罗夫特：而不是他想听到的事情。这样可能是很难的。

布热津斯基：而且你可以采用比较好的方式。或者你可以用一种比较自信的方式，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但你能够做到。

斯考克罗夫特：不过，你得找到适合不同个性的方式。

布热津斯基：因为你必须是你。总统选择了你。因此他喜欢你自己的方式。

伊格纳休斯：赖斯和哈德利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强有力的副总统，有时担当他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副总统的手下有时也如同另一个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我估计，你们二位也会同意，下一位副总统，无论是哪一个党派，都应当十分小心，不要在事实上建立起一个对立的机构。

布热津斯基：哦，是的。我估计副总统的外交团队也几乎与布兰特和我曾经率领过的最少时期的人数一样多。

斯考克罗夫特：不过，是几乎。

布热津斯基：几乎一样多。我认为大约有30人。那对我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当年蒙代尔副总统有这样庞大的一支团队，我认为我就没法开展我的工作了。而当年他只有一个人。我聘请了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请他担任我的副手，因为我喜欢他，而且我也认为这对于我与副总统的关系有好处。但是，要是有这样一帮对着干的人员，提供政策建议，准备文件，插手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进程，我认为，这简直就是混乱。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当老布什总统担任副总统时，他在外交政策上非常活跃。但好像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这又一次说明，这是个性的问题。

伊格纳休斯：当时你在他身边吗?

斯考克罗夫特：不，我不在。我觉得，副总统的团队有多庞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如何处理，并以什么样的权威到达总统。总统能够任命任何他想要的人担任顾问。如果总统喜欢，他还可以让副总统担任他的主要顾问。

但出于许多原因，大多数总统没有这样做。

但必须有某个集权式的机构来使整个系统运作起来。如果你有几套分散重叠的系统，你就会出现混乱。那是主要问题。这个机构必须足够灵活，这样总统就能以他认为舒服的方式来处理事件。但你也必须保持体系的完整，使之能够迅速运作起来，有效地提供总统需要的东西。如果总统说他想要所有的事情都经过副总统，那当然是总统的特权。但如果是这样，他就需要一个不同的体系。

如果不断地玩弄体系，那就会毁了体系。

布热津斯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值得一提。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从国务卿、国防部部长、中央情报局那里送达总统的文件量有多大，还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从他的手下那里拿到的文件量有多大。这个量是惊人的。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最终不可能只是一个邮差。国务卿在呈来的文件上写上一句话，"呈总统"。那毫无帮助。你必须能够在总统的允许下，区分哪些应当送达总统，哪些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能够代表总统处理的，你必须多多少少有那种了解总统思维的自信，然后再把它或者送回呈上来的那个部门，或者在事情需要协调的情况下送至其他部门。这是一桩非常不容易的事，也会占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大量私人时间。

伊格纳休斯：一想到如何重塑官僚机器使之适应21世纪，我就想起一位记者同事弗里德曼的名言，"世界是平的"。我们的世界已经不那么等级化了。它是水平的，你能跨界将其联系起来。你不必竖起烽火台来相互沟通。这是巨大的进步，但它也给外交政策带来了很有意思的挑战。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正在用你无法预测或无法控制的方式进行联络。你们所谈论的这种等级式的官僚机器，是否能够适应并拥抱这个扁平的世界而不与之发生冲突呢？

斯考克罗夫特：尼克松总统试过。他试过指定一名内阁成员超越其他成员，压在其他内阁成员头上，但这不管用，这主要是因为，内阁成员们不会为他们中的某一位工作。你不可能将一位内阁成员置于管理其他人的位置上。

一个扁平的体系不太有效。

伊格纳休斯：但需要这样做吗？在情报界，我们谈论着不同的机构，自说自话，我们则坚持要将它们连接起来，要求它们合作。而且我们正在创造技术，现在有维基百科，人们通过它能够立即互动、建立数据库，并加以分享。这都是情报界的人本来认为根本无法做到的信息分享，而我们现在每天都能使用它。但是，这些在政府层面总体上还没有发生。我想，你们是否认为，现在是在某些问题上，比如说在天气变化问题上试验一下新技术的时候呢？

斯考克罗夫特：但是，戴维，这样的目标不会因为一个扁平的组织结构而在情报部门实现。因为领袖发话了，"你们必须开始分享信息"，然后这个目标才能实现。他们开始制定和贯彻相关政策。那种程序上的改变仍然没有完成。我不知道扁平的方式是否也能运作。但我认为，我们能够同意，如果新总统在竞选期间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的首要关注领域，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组织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应当成为他的首要关注点。

布热津斯基：让我补充一点。我认为总统必须非常清楚，他上任后的日程中有一些严肃重大的问题要处理。但他的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他需要利用他的初来乍到和竞选的成果来动员国会和公众的政治支持。

因此，新总统应当作出一项清晰的决策，哪些事情需要他的迅速关注。我前面提过，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就与这个有关。在我们讨论的地缘政治问题中，当然布兰特可能有不同的列表，我会说，中东的复杂问题是放在优先位置的。其他事务，也许可以以某种更富延续性以及更传统的方式来处理。

斯考克罗夫特：我的划分有一些不同。在中东问题上，我更愿意分割开来看。巴勒斯坦和平进程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如果不在这一届政府解决，它可能会迅速恶化。伊拉克和伊朗是当前的重大问题。阿富汗是另一个问题。

巴基斯坦可能是第四个问题。无论他愿意与否，所有这些都需要得到总统的关注。即使他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国内事务，他也必须开始处理这些事务，因为他别无选择。

布热津斯基：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我曾经为总统准备了全球优先处理的事务列表，每一条都有说明。我记得当时写了10条，我还记得哪些是在最前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卡特总统想要立即着手处理这10件事。那也正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有用之处，帮助新总统理出优先次序。

▶▶▶

伊格纳休斯：新总统就职时，世界正对美国表示愤慨。我觉得，在我一生中，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时候的世界，像现在这样敌视美国。

布热津斯基：历史上，这从未发生过。

伊格纳休斯：我们周游世界，看到并感受到这一点。可能我们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受欢迎。新总统能够在上任之际，在最初的一百天内，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形象，并对世界说："这不再是你们惯常打交道的那个美国了。"

布热津斯基：嗯，比如，他可以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他可以宣布虐待囚犯非法。他可以更加强调公民权利。他可以说："让我们埋葬这种恐惧的文化，恢复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本来面目。"而如果美国足够自信，并且坚持原则的话，我认为这些事情是能够发生的。当然，更大的政策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怎么想？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他首先要做的事之一，就是要说："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能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世界上每一个坦率的政府的帮助。而且我们也会去寻求这种帮助。我想主动示好，与任何想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人一起努力。"然后，我们就去实施这一号召。老布什总统的优点之一，就是他对电话的使用。最初，我表示反对。我认为国家元首通电话是非常冒险的事情。但他在全球都用得非常好，他建立起了一种友好的氛围。他并不是只是打电话寻求在某些问题上的对方元首的支持。他打电话时会说："你怎么样？还好吗？"所以当他真的在某些特定事件中打电话时，对方就会比较友好，气氛也会比较融洽。我认为那非常重要。美国是唯一能够动员世界来应对这些巨大的全球问题的国家。但如果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们，我们就没法完成这一任务。

伊格纳休斯：我们提到战略交流，经常想到的，就是如何用有效的方式，让我们的声音更响亮、更清晰。但战略交流有时候其实是战略倾听。我想这是老布什的伟大特长。我认为，卡特也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

布热津斯基：而且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更谦和地说话。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译者注）在1937年写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意思是说，一个文明越是要走下坡路，它就越会狂热地吹嘘其不可超越性。这是一项警告。近几年，我们已经倾向于用一种传教心态去界定世界事务。我们总是自以为就是正义的缩影。那些不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被定义成邪恶。我认为我们应当就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更谦和的认知。

▶▶▶

伊格纳休斯：在这种自我批评的气氛中，让我来请你们二位回顾一下你们在政府任职的时期，回忆一下你们所犯的或是你们的总统所犯的错误。因

为在我们思考如何使世界回归的问题时，记住从经验中学习那些有潜在危险的事物，是非常有用的。兹比格，你思考过这些吗？

布热津斯基：当然。你不可能一次做太多的事。那是一个问题。其次，你不能忽略一个事实，要想有效率，你就必须有持久的政治支持。因此，你必须多少在你的优先程序上有些灵活性。我认为，在不去争论政府内谁对谁错的前提下，我们处理伊朗危机的政策的清晰度不够。

伊格纳休斯：你需要一种政策，无论这种政策哪一种。

布热津斯基：是的。实施得过于自信，而且过早。这表明，要么是万斯（Cyrus Vance，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译者注），要么是我本应该完全靠边站。相反，事实上尽管不是有意地，我们却努力同时追求两种策略。我还可以给你举出另外一个例子，之后，如果你需要，我还可以给你一份成功清单，列出我认为我们做得好的事情，那个单子一定会更长。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在老布什总统上任的初期，巴拿马有一次政变企图。我们不知道政变的策划者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代表的势力。我对于其动机或支持力量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与巴拿马沟通得很好，但是，是通过平行的信息管道。国务院有他们的沟通，中央情报局有它自己的沟通，国防部也另有一套。

于是我们召开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会议，分析形势，而参加者各有不同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在盲目中决策，因为我们没有一幅完整的形势图。这件事告诉我政府内部紧密合作的必要性，所以我就设立了一个能够定期开会的代表委员会，一个星期或类似时段在必要时开一次会，确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人，所有重要成员，都得到同样的信息。这个机制运作得非常好。它在送达文件的问题上也运作得很好。我们让代表委员会先看文件。对我而

言，这个机制运作得非常好。这仍然取决于参与的人。

但你如何协调，以及如何使人们得到信息，则是重大任务之一。比如，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可能一个星期或更短时间内见一次总统。而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则可能一天见 12 次总统。所以，部长们必须确信他们在你与总统的讨论中能够被公平地谈及。而且你必须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总统告诉你的话。如果国防部部长和国务卿对于你是否诚实准确地传达他们的观点没有信心，他们就会坚持在每件事上都要单独与总统讨论。总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你就必须让自己确实成为一名诚实的中间人。这项工作不可能做得完美无缺。但如果没有这个中间人，整个体系，至少是我的体系，就会崩溃。

伊格纳休斯：我认为大多数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们会说，你们二位在现代历史上比任何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做对的比率都更高。你们都有强有力的个性，但你们都设法隐藏修改，这样你们就不会被内阁部长们看成是总统注意力的竞争对手。

斯考克罗夫特：哦，我不知道。

布热津斯基：我会说，是的。

▶▶▶

伊格纳休斯：对我而言，这个新世界的悖论之一，就是在经济上，全球化是一个无缝的高度有效的决策过程。跨国公司正以惊人的速度对世界的发展作出反应。他们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如果你去高盛或在硅谷的管理良好的科技公司，你会发现中国人、印度人、非洲国家的人、巴基斯坦人和美国人全都在一起工作的高度多元化的团队，他们克服了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携手合作。而公司对于它们面临的挑战反应十分迅速。

但是在政府的世界里，我们却看到僵硬的架构，它通常是基于 19 世纪或更早以前的模式。全都不具有灵活性。在我思考新政府如何能够与这个新世

界正确对接时，我只是在想，是否有一种方式，能够模仿公司的成功之处？这个思路毫无出路吗？一个像公司一样行动的政府机构，是否真的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梦？

斯考克罗夫特：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商业世界的奖罚秩序要简单得多。政府则要面对如此多的目标与利益，效率的标准要更难制定一些。

布热津斯基：我们的公民每两年拥有一次决定政治进程的投票杠杆，而股东们对于公司决策却没有同样的杠杆。

伊格纳休斯：确实是这样，很难把CEO赶下台。

布热津斯基：那是一个重大的差异。

▶▶▶

伊格纳休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过去7年内，华盛顿关于任何事务的争论，都有一种日益极端化的倾向，包括国家安全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曾经共有的外交政策立场一天天缩小，几乎要消失了。我想请你们二位谈一谈新总统如何重新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识，以及你们如何去做。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确实很重要，下一位总统，无论他是谁，都要主动去做这件事，去创造两党共识的基础，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努力。这就需要通过任命来体现。如果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一位共和党人担任国务卿，我现在就能想到一些人。比如说，哈吉尔参议员。当然，还有其他人。

或者某些其他重要的职位。共和党总统也是一样，他应当任命一位民主党人。我认为过去几年内我们产生的分歧，正是因为确实存在着观点的不同。我们在世界观上越来越分道扬镳。这些分歧正在损害美国，因为它们导致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我们感到不确定，而其他国家的不确定感则会加剧我们自身

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则会演化成恐惧。这些分歧削弱了共同的方向感，削弱了处理当今重大问题的自信心。所以我认为，下一任总统的任务之一，就是做几件简单可行、明显而不那么困难的事情，利用其任命内阁的权力，来提升两党的共识。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还有什么方式来重建两党共识的基础？

斯考克罗夫特：我同意兹比格刚才所说的话。我认为这正是华盛顿的态度，也被世界上近期的变化所强化。过去几年，当我们面临威胁时，我们都会减少党派分歧。

最近我们则脱离了这一轨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对我们的共同感有毁灭性的打击。那种苦涩至今犹存，而且不断生长。我认为，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分歧也加剧了这种苦涩感。我们的总统们过去会在晚上把国会领袖叫来，就是为了谈谈话。他们过去会将反对意见纳入内阁中来讨论。这类习惯对于建立合作感非常重要。党派利益是一种狭隘的技术上的事情。它不是战略性的，它也会干扰政府运作。我认为国会与行政部门的分歧正在扩大。同时国会本身也陷入了更大的分歧之中。

那就涉及国家治理，这种分歧会腐蚀国家的治理能力。总统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无论是任命人选或是其他看得见的措施，总统都必须主动出击。而且不断强调，他是在作国家决策，而不是党派决策。

伊格纳休斯：我们都在为国家服务。是的，我必须说，与一位著名的共和党人和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坐在一起进行这些对话的乐趣之一就是——

布热津斯基：谁是共和党，谁是民主党？

伊格纳休斯：我经常搞不清。这真是一件好事。你们二位，外交斗争中的老兵，真的能够跨越狭隘的党派界限和束缚，一起谈论应对难题的新思路。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做到，我希望新总统和国会也能做到。